

《英魂谱·圣地祭》编辑部

主 编 张立新

副 主 编 柳云飞 沈梅芳 曹建国 徐锦堂

编 辑 施国俊 胡卓然 章庆根 吕晓红 李唐海

特约编审 经盛鸿 张 衡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前言

打开《英魂谱·圣地祭》，翻看目录与全书，我很快就被它稀见而极其重要的史料、精彩而深刻的内容，尤其是它通篇洋溢的爱国精神和凛然正气，深深地吸引和深深地感动了。

《英魂谱·圣地祭》展现的是，中国人民八年抗战期间，南京军民在英勇悲壮、前赴后继的抗日图存、保家卫国斗争中，所涌现出的抗战爱国英烈的生平史实，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正面战场》，是在国民政府军队的正面战场上，在 1937 年 12 月南京保卫战中，英勇作战、壮烈牺牲的重要英烈的生平传记。研究抗战史与南京保卫战史、南京大屠杀史的学者都知道，南京保卫战是中国抗战史上一次重要的战役，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迅速占领北平、天津后，又于 1937 年 11 月 12 日攻占上海。日本侵略军立即兵分三路，向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发动疯狂的进攻。中国军民为保卫首都、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不顾敌强我弱，拒绝屈服和投降，英勇抗击强大的日本侵略军的进攻，从 1937 年 11 月 12 日上海沦陷到 12 月 13 日南京失守期间，打死打伤日军 26 000 多人；其中南京保卫战从 1937 年 12 月初开始，中国军队以疲惫之师与血肉之躯，血战十余日，毙伤日军 8 000 多人，较之此后的台儿庄大捷、万家岭大捷等战役消灭的日军，不相上下，不仅继淞沪抗战后，再次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迟缓了日军的进攻步伐，掩护从淞沪战场撤退下来的中国军队后撤到皖浙赣地区，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精神和不屈斗志；同时，它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持久抗战战略

的实施,进一步将日军的进攻方向引向长江流域,引进持久战。南京抗日爱国将士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无畏战斗、浴血沙场的事迹,将永垂不朽!

第二部分《敌后战场》,是在南京等地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四军在敌后南京地区,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牺牲的、有代表性的革命烈士的生平。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侵华日军对中国手无寸铁的平民和放下武器的战俘实施了40多天的血腥大屠杀。此后,南京被日伪当局控制长达八年之久,成为日伪统治中国沦陷区的中心,白色恐怖严重。但在南京等地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四军,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英勇挺进敌后南京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发动民众、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英勇作战、打击日伪,在历时八年的艰苦斗争中,牺牲了无数的仁人志士,建立了丰功伟绩,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抗战的历史证明,南京是一座不屈之城、一座英雄之城、一座胜利之城!没有成千上万抗日爱国将士的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就不可能唤起全中国人民投入神圣的抗日救亡斗争中去,就不可能有效抵抗和沉重打击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成千上万抗日爱国将士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最优秀的子孙、最卓越的代表。即便在多年以后,我们后人每一念及那许多知名和更多不知名的抗日英烈们,仍禁不住潸然泪下、肃然起敬。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战争条件的残酷与战时社会的纷乱,也由于南京保卫战的失败、南京大屠杀的血腥和南京沦陷长达八年之久的破坏,那些在南京保卫战和八年抗战中牺牲的无数抗日爱国将士的事迹多被湮没在战争的硝烟和历史的尘埃中,至于他们的家庭和身世更是鲜为人知。这不仅影响学术界对抗战史和南京保卫战史研究的深入,更为严重的是影响了对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影响了对国际上的宣传和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斗争。

感谢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的领导、专家和学者,他们抱着神圣的使命

感,克服重重困难,千方百计搜罗史料,走访社会各界人士,终于编写成这一部《英魂谱·圣地祭》,比较全面、广泛、深入地展现了在八年抗战期间,南京军民中所涌现出的抗战英烈的生平史实,许多史料极为稀见又极其重要,全书内容精彩、感人至深、令人深思、催人奋进,是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宣传和教育的教材,更是对日本右翼势力进行斗争的好武器。

更为令人赞誉的是,在本书的第三部分《圣地祭》,搜集了全南京地区安葬有抗日英烈陵园和一些重要烈士墓地以及有关纪念馆、纪念堂、纪念碑的珍贵照片。它不仅是对抗日爱国英烈的尊崇和缅怀,而且它和前面两部分的有关抗日爱国英烈的文字记述相印证,更为真实,更为强烈,更为感人!这些纪念抗日英烈的圣地仿佛把我们读者重新带回到那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艰苦岁月中,仿佛又听到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被迫发出的最后的吼声,听到了无数抗日爱国英烈们浴血奋战、宁死不屈的呐喊,看到了中国人民经历千难万险,终于取得的伟大胜利!

这正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思想财富,是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雄伟精神力量!

这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是我向广大读者热烈推荐本书的原因所在。
是为序。

南京市地方志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经盛鸿

2015年10月30日

dfz.nanjing.gov.cn

目 录

前 言

英 魂 谱

正面战场	(2)
萧山令	(2)
司徒非	(7)
罗策群	(12)
李兰池	(17)
姚中英	(21)
谢彩轩	(24)
李绍嘉	(27)
蔡如柏	(29)
高致嵩	(32)
黄纪福	(37)
雷 震	(39)
易安华	(42)
朱 赤	(46)
华品章	(50)
刘国用	(53)
韩宪元	(56)
乐以琴	(59)



目
录



涅日丹诺夫·尼古拉·尼基福罗维奇 (61)

敌后战场 (64)

成庆镛 (64)

王齐贤 (66)

许维新 (69)

郑行郊 (73)

邓仲铭 (73)

郑维发 (82)

邰贤聚 (83)

漆承宏 (85)

徐润芝 (86)

程一惠 (90)

陈宗胜 (92)

夏定才 (93)

杨 希 (95)

高颂章 (97)

谭雨文 (101)

周志远 (104)

戴国光 (108)

强 博 (112)

周建平 (115)

庄子中 (116)

李秉初 (117)

周 喆 (118)

李贯一 (120)

圣 地 祭

安葬有敌后抗日烈士的综合烈士陵园	(125)
雨花台烈士陵园	(126)
竹镇革命烈士陵园	(130)
桂子山烈士陵园	(134)
东沟烈士陵园	(140)
龙都烈士陵园	(142)
周岗革命烈士墓	(144)
中山烈士陵园	(146)
游子山烈士陵园	(150)
敌后抗日烈士陵园	(153)
方山烈士公墓	(154)
土桥烈士陵园	(156)
后阳烈士墓	(160)
云台山抗日烈士陵园	(162)
群力烈士墓	(166)
明觉鸡冠山烈士墓	(168)
仙坛烈士墓	(170)
后 记	(172)



目
录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英魂谱

YING HUN PU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正面战场



2

英魂谱·圣地祭

萧山令 字铁依,清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十一日(1892年8月3日)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四方山(现属益阳市大泉乡方山村)的一户书香门第。萧父名昆香,清末秀才,母高氏。萧山令是家中第三子,他幼承父训,以读书做官为人生目标,在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时,能熟读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被先生认为必成大器。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萧山令以优异的成绩从龙州师范学校毕业。对于今后要从事的教育工作,萧山令并不满意。当时清廷腐败、内忧外患,他认为只有振兴军队,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于是在宣统元年(1909年)9月成婚仅3个月时,就毅然离开家乡,前往长沙投考湖南陆军小学堂第四期就读。

湖南陆军小学堂(总办张鸿年)原定学制3年,教授军事学科和普通学科两大类,每月定期考试,并根据成绩分为优、上、中、下、劣5等。萧山令学习刻苦钻研,每逢考试必位列优、上等。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致使萧山令学习中断。湖南新军的进步军官们与陆小学生密切联系,准备起义。萧山令参与其中,他和众多同学的任务是在长沙光复时,武装入城,配合新军巡查市区。1912年1月,湖南陆军小学堂改名为湖南陆军小学校,刘鸿逵任校长(旋由戴凤翔接任),萧山令于此时返校继续学业。但开办不到3个月,湖南陆小就根据



南京留守黄兴的命令予以停办,萧山令等陆小学生则由校长戴凤翔带往南京,考试合格后编入入伍生队(队长沈靖)接受入伍训练。

黄兴原本打算在南京成立军官学校,却因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取消而在无形中流产。经过协商,黄兴提议将入伍生队的学生送入由北京政府开办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但遭到保定校方反对,理由是这些学生大都没有经过陆军中学的教育,不符合招生标准。经过参谋总长兼湖北都督黎元洪调解,黄兴最终同意将学生送入黎氏开办的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学习,考试合格后再入保定军校。就这样,萧山令于1912年11月进入第二预校第一期继续接受军事教育。

根据陆军部的安排,萧山令从预校毕业后进入驻防在北京南苑的陆军第7师(师长张敬尧)当入伍生。1914年8月正式升入保定军校(校长曲同丰)第三期步兵科(科长程其祥)学习。萧山令编在步兵第3连,全连学生101人,其中不少都在毕业后的军事生涯里成为将军,如沈逊斋、朱传经、蒙志、陈器、汤敏时、郭凤岗、张元祐、曾广国、毛侃、张国威、姚纯、郭觐、王邦述等。

萧山令于1916年8月从保定军校毕业。他本想前往边防部队服务,为国家的边防事业做贡献,但因新任总统黎元洪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就学生分配闹出矛盾,而被负责分配工作的训练总监部统一送回原籍寻找出路。

对于进入什么部队服务,萧山令是经过一番考量的,他选择了曾经在护国战争中出过力的湖南第5守备区(由护国军先锋第1支队改编)作为自己戎马生涯的第一步。第5守备区司令周则范,对萧山令这样的保定军校生前来投效十分重视,考虑到部队正在扩编,即任命他为少尉排长。

萧山令在职期间以身作则,关心士兵疾苦,得到参谋长蔡钜猷的赏识。1920年6月,当蔡钜猷出任第8守备区司令时,即调萧山令到该部担任中尉排长。一年后随部编入湖南陆军步兵第10旅(旅长田镇藩),仍任中尉排长,受沅陵镇守使蔡钜猷指挥。

1923年4月,蔡钜猷接受孙中山委任,就任讨贼军湘西第1军军长,萧山令也随之升任上尉连长。同年8月,蔡钜猷被赵恒惕击败,遂率领残部退往贵州。萧山令所部负责断后,被湖南陆军第1师第1旅包围,被迫向该旅旅长贺耀祖投降。战后,贺耀祖升任第1师师长,见萧部完整且颇



具战斗力,便收编为己用,任命萧山令为上尉连长。

1926年6月,贺耀祖响应北伐,率部参加国民革命军,所部被编为独立第2师,萧山令升任中校团附,并随部参加了武宁、九江、南京诸役。同年12月调任第1旅(旅长谷正伦)上校主任参谋。1927年3月,独立第2师扩编为第40军,军长贺耀祖为培养所部基层军官,在南京扩建军官讲习所,调萧山令为上校教官。1928年8月,第40军缩编为第8师,军官讲习所同时奉命裁撤,萧山令被编余,调参谋本部(总参谋长李济深)任上校校官,空领薪饷,却终日无所事事。

1929年1月,在南京赋闲数月的萧山令得老旅长、时任首都卫戍司令部司令谷正伦的邀请,前往该部效力。但由于卫戍司令部已无上校职可供萧山令担任,他不愿谷氏为难,便主动要求降级担任中校参谋一职。谷正伦当时正奉命组建政治警察训练班,便又任命萧山令兼任该班教务主任,负责实际教育事宜。1931年6月,政警班改组为军官讲习所,萧山令仍兼任教务主任,他为了加强宪兵基层干部的训育,引进日本宪兵的教授制度,并与国内实际环境相结合。这个讲习所为谷正伦之后建设宪兵部队,提供了一批骨干。

1931年11月,军事委员会重组宪兵司令部,任命谷正伦为司令。谷氏到职之初,即从原卫戍司令部里抽调大量军官前往效力,萧山令被任命为总务处上校处长,主要负责宪兵队伍的编训、调配、人事、文书、印信。在之后的5年中,萧山令尽心辅佐谷正伦建设“新宪兵”,他不仅大力提倡成立宪兵旅,支持在各团下设与日本宪兵体制相同的特高组(初称特警队),还尽量维护“旧宪兵”的团体利益,做好宪兵部队中既能有蒋介石的嫡系黄埔生,也能兼顾非嫡系军校毕业生,甚至是行伍军官。萧山令的部属曾回忆道,“他虽然学习军事,但言谈举止中溢出儒者的气质,从不盛气凌人,思考事物则条理分明,缜密周到”。也正因为萧山令的这些努力和付出,使南京保卫战开始后的各路参战宪兵部队都能真心接受他这个“非嫡系”将领的指挥。

1935年5月4日,萧山令任官陆军步兵上校。1936年2月,萧山令因“运筹匡赞、任劳任怨”被谷正伦举荐为宪兵司令部少将参谋长;26日,又转任陆军宪兵上校。

1937年5月7日,萧山令晋任为陆军少将。从1916年保定军校毕业算起,他用了20多年的时间,终于正式踏入了将官行列。同年12月他殉



职于南京时,也是南京保卫战殉难将士之中唯一一名有少将军衔的军人。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淞沪会战爆发,战至11月,位于上海的中国军队全线西撤,而日军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尾随追击,并有续攻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之势。在此危机时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将军委会警卫执行部和首都卫戍军参谋处合并组成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任命训练总监部总监兼执行部主任唐生智担任司令长官,统辖留驻南京各部保卫首都。

根据计划,宪兵第2团、第10团和宪兵教导团全部,以及宪兵第5团、特务团、练习团、特务营各一部编入卫戍部队。这些留守部队原本应该由宪兵司令谷正伦亲自指挥,但此时谷氏正在生病,并已经决定前往武汉治疗,那么这些部队由谁来接手指挥呢?宪兵司令部的高级军官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烫手山芋,谁要在这个时候站出来,那无异于在南京“守死”了。这个时候,正在督率宪兵部队及万余民工赶筑雨花台地区野战工事的萧山令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表示愿意留守南京承担指挥之责。谷正伦赞其忠义,并请准予战时提拔萧山令为宪兵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兼参谋长,享受中将待遇。当时的报纸曾赞扬他为“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与此同时,宪兵司令部各机构和部队主力在另外一位副司令张镇的率领下向长沙转移。

萧山令接手的不仅仅是宪兵部队的指挥权,他还奉命兼任首都防空司令、首都警察厅长和南京市市长等多项军政要职。但对萧山令来说,他对这些临时增加的殊荣并无一丝喜悦,此刻的他正在考虑如何有效地组织起位于南京的宪警部队来抵挡日军的侵略。

12月7日,根据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的防区划分,萧山令正式下达了宪兵的具体防御分配。命令宪兵第2团、宪兵教导团、宪兵特务营以及宪兵第5团1个营担负清凉山的守备任务,宪兵第2团团长沙友胜为守备队长;宪兵第10团担负明故宫的守备任务,宪兵第10团团长沙烈林为守备队长。以上是对于宪兵的安排,而对于警察,萧山令的部署则是命保安警察第1大队第3中队协防太平门,第2中队和第4中队协防中山门、紫金山,保安警察第2大队第6中队协防金川门,第7中队协防中央门,保安警察第3大队第8中队协防飞机场、光华门,第9中队协防通济门,其余各部分守水西门、汉中门、三汊河和燕子矶;至于各警察局所属的警察大队,除第7局守下关、第8局守浦口外,其余各局大队分布在清凉山



及各城关内线,水上警察则在长江游弋。

从12月9日开始,日军各师团分别近抵南京城东和城南,并陆续对城防部队发起猛烈进攻,萧山令于此时坐镇宪兵司令部调配所属宪兵和警察配合陆军作战。如当天光华门告急,萧山令即抽调位于清凉山的宪兵1个营前往增援。10日又抽调明故宫的1个营前往中山门增援。为鼓舞所部士气,萧山令不顾日军炮火的猛烈轰炸,屡次登上城头视察,并不断要求各守备地区的部队长坚守岗位、与城共存亡。

宪警各部苦战至12日,伤亡巨大,仅校级军官就有宪兵第2团中校团附刘作民、第2营少校营长成朝盛、第3营中校营长封靖海、第10团少校团附黄冠亚、教导团中校团附萧炳芳、练习团第1营少校营长冯英等人先后阵亡。

就在萧山令再次鼓励各部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并开始在城内构筑防御工事准备巷战时,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在当天下午16时向宪兵司令部下达了“向花旗营集结待命”的命令。萧山令判断,唐生智此举可能是准备命令守城部队开始突围,考虑到宪兵组织严密,且具备军事素养,而警察在撤退时未必能像军队一样稳定,于是他决定将宪兵部队统一交由宪兵第2团团长罗友胜指挥,执行卫戍总部的命令先行转移,并嘱咐罗氏在撤退时抽调2个营的兵力占领蛇山、龙蟠山、五台山一带,为主力的撤退提供掩护。萧山令则与警察厅副厅长长方超等人将位于南京各处的警察收拢起来后再向下关转移,准备在那里坐船渡江。

由于当时的陆军部队以及平民百姓也都在不断地向下关集中,因此各路部队交杂在一起,场面十分混乱,致使原计划定于12日晚23时抵达下关的萧山令直到13日凌晨才赶到。当时江边情况已经无法控制,各路溃兵争先恐后抢夺船只和可漂浮于水面的木板渡江。有的船因超载而沉没,更多的士兵则由于不习水性而溺毙于江中。萧山令见此情况痛心疾首,又心急万分,他一方面稳定警察的军心,一方面寻找一切可利用渡江的船只和木材,但最后仅有副厅长长方超率领的300余人成功抵达对岸。

13日下午13时30分,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第30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第33联队(联队长野田谦吾)已经通过南京城攻至下关,这些日军见中国军队正在抢渡过江,根本没有继续组织反击的意图,便肆无忌惮地展开攻击,不断射击江中的中国士兵。此时,萧山令急忙组织身边可以听命的军队展开反击,以争取更多的中国官兵渡过江面。

在萧山令的指挥下,一些原本盲目寻找渡江工具的士兵逐渐加入到反击的队伍中。但这些官兵的反击十分有限,而日军第33联队的主力正源源不断地抵达,并将反击的中国军队逐渐压制。与此同时,下关对岸的浦口也遭到了日军国崎支队(由第9旅团主力组成)的进攻,使位于下关的中国军队更加难以抵达对岸。萧山令已经多处负伤,眼见求生无望,弹药也即将用完,为了不被日军俘虏后受到凌辱,他在愤恨之余举起手枪自杀殉职(注:亦有回忆称萧山令撤退出城后在长江上沉船殉难),时年46岁。南京一役,在萧山令指挥下的宪兵伤亡失踪3034人,警察伤亡失踪4000余人。

萧山令殉职后,由于信息通讯不畅,国民政府对他的下落起初以“失踪”处理。直到确定萧山令阵亡后,才按晋升后的中将进行抚恤。

1984年7月6日,湖南省人民政府追认萧山令为革命烈士。2014年9月1日,萧山令被列入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司徒非 原名司徒荣曾,字严克,清光绪十九年九月初六日(1893年10月15日)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赤水镇塘美乡塘美村(现属开平市赤水镇)的一户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司徒非从小就在当地名儒司徒熙佑开办的私塾当伙头。他聪明好学,获得司徒熙佑的赏识,便被准许免费学习3年。之后司徒非只身前往广州寻亲,寻亲未成被迫流落街头。为求生计,他在印刷厂当工人。司徒非将所得的工钱来支撑自己继续读书,但时间一长,工钱抵不了高昂的学费,他只得辞去工作改考不需学费的军校,以求继续学习。

经过广东陆军小学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的学习后,司徒非于1917年2月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民国初年的军事教育体系,是按照陆军小学、陆军预备学校、陆军军官学校共三阶段的教育模式培养军队的初级军官。但司徒非倾向革命,终因发表革命言论、思想“激进”而被校方开除。

1917年12月,司徒非离校返回广东。由于他未能在军校学成毕业,只能暂时在广东省土敏土厂总务科当名一等科员。1920年3月,经保定军校第六期同学介绍,入广东督军公署(督军莫荣新)担任上尉科员。不料同年10月督军莫荣新被陈炯明驱逐,督军公署也随之解散,这使司徒



非成了失业军官。

1921年2月,司徒非在友人的介绍下出任广东军政府内政部土地局一等科员。对司徒非来说,孙中山成立的军政府是革命政权,能在此地效力是他毕生所愿,但他不想长期从事文职工作,在不断申请调动之后,被派到广东陆军第3师(师长魏邦平)任上尉营副官。同年9月,他又被调到大本营担任少校参军。

1922年4月,司徒非调升粮食管理处运输科担任中校科长,他深知大军出征粮草必先行,只有保证后勤补给的稳定,才能稳定在前线作战的军心,为打胜仗奠定基础。对此,他刻苦耐劳、勤奋工作,其表现很快就得到了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许崇智的注意。同年10月,司徒非被调到许崇智身边任中校副官,并随部征闽。

1923年5月,许崇智率部回粤,突然遭到陈炯明叛军的截击,被迫退守博罗。值此危难之机,司徒非被任命为广州市公安局警察游击总队总队长,配合讨贼军作战。同年11月,陈炯明在河源大败,许崇智得胜回师广州,司徒非因功升任广东盐务缉私处上校统领。

1924年6月,司徒非所部被改编为桂军第5师(师长林树巍)第9旅,他因此升任该旅少将旅长。司徒非所部虽名为旅,但其实际兵力仅1500余人。同年10月,广州商团发动叛乱,司徒非奉命参与平叛,他率领所部对盘踞西关西瓜园的商团发起进攻,与谭启秀第10旅和李福林福军相互配合,一战即攻占目标,将商团全部缴械。事后,司徒非曾风趣地对同僚说:“这次的玩耍,并不爽快,疾风扫落叶,一瞬就完了”。

1925年1月,陈炯明纠集所部再起战端,此时司徒非正率所部驻防虎门厚街,他严命所部对东莞方向的敌军实施密切监视,并做好战斗准备。1月27日夜,第9旅对东莞发起猛烈进攻,但由于叛军死守,并彻夜实施炮击,致该旅激战一夜无果,被迫在天亮后撤回厚街采取守势。2月3日,司徒非率部参加东江战役,他指挥的第9旅作为右路军的右翼攻击部队猛攻新桥。东莞之败后,司徒非发誓要一雪前耻。为此,他亲自到一线督战,经过4小时激战,终于在当天中午突破敌军防线,攻占云霖。陈炯明于3月兵败下野后,司徒非率部移驻石龙休整。

1925年7月,第9旅改编为建国军第1师(师长林树巍)第1旅,他仍然担任该旅少将旅长。1个月后,广东驻军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这次整编中,广州当局认为林树巍的部队不稳,遂于8月26日派兵前往



缴械。对此,司徒非极表愤慨,他当即组织还击,坚决抗拒缴械。但此时所部士兵因被认为是“叛军”而军心涣散,众人皆无心抵抗,在坚持了1个小时后即告溃败。司徒非幸得老长官许崇智的庇护,而被调任广东省政府军事厅(兼厅长许崇智)团务科上校科长。不料1个月后,许崇智又被蒋介石软禁,许系势力瞬间瓦解,司徒非则被调到佛山市公安局担任局长。1926年5月又被调到广州市公安局(局长李章达)担任总务课课长。

1928年3月,司徒非在徐景唐的举荐下出任江门市政厅市长兼民政局局长,但履职不到3个月就因江门时局混乱,尤其是江门总工会的解散而被迫辞职返回广州,改任广州市公安局保安总队总队长。

1929年5月8日,徐景唐在河源率领所部广东编遣区第2师宣布反蒋,但很快遭到广东驻军的围攻而败退潮汕。因感徐景唐曾介绍自己担任市长和保安总队长的恩情,他毅然随同徐氏共患难,出任前敌总指挥一职。然而不及1个月,部队就被李济深的第8路军击溃,司徒非被迫随同徐景唐下野。

1929年9月,张发奎在宜昌率领第4师宣布反蒋。司徒非闻讯,当即北上投靠这位第二预备学校的老同学,随即被张氏任命为少将高级参谋。1930年1月,张发奎所部改编为护党救国军第4军(军长张发奎),司徒非仍任少将高级参谋。同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后,司徒非被张发奎派到广州秘密从事策反工作,但由于行事不秘,很快就被陈济棠发现并予以逮捕。此后司徒非在广州军人监狱过了大半年的囚犯生活。

中原大战结束后,阎锡山、冯玉祥联军完结,但李宗仁却退守广西继续抵抗。陈济棠为联合广西军队共同反对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派遣使者前往广西分别联络李宗仁和张发奎。为了示好,陈济棠于1931年3月将司徒非释放,委任他为上校参议。司徒非假意受委,不久之后就悄悄地潜回南宁向张发奎报到。同年6月,两广合作正式形成,司徒非出任第15军(军长黄旭初)教导团少将团长。

1932年3月,张发奎率部离开广西重新与南京当局合作,司徒非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加上他又对两广局势不再看好,便辞职前往上海,投奔同样出自粤军的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在旧日同僚、时任第19路军补充旅旅长谭启秀的保荐下,司徒非被蒋光鼐任命为特务第2团少将团长。

1933年2月长城抗战爆发。为了投入到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卫国战



争中,第19路军官兵纷纷请愿组织义勇军北上参战,司徒非也是积极申请者之一,他被任命为援热先遣军第1纵队指挥官。遗憾的是,当部队乘坐火车抵达湖南耒阳时,中日两国已签订停战协定,司徒非只能无奈率部返回。

1933年7月,特务第2团被扩编为第19路军补充师(师长谭启秀)第2旅,司徒非升任少将旅长。在此期间,第19路军的高级将领已经开始与红军寻求合作,并于同年11月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司徒非的第2旅被扩编为第5师,他升任中将师长。

“闽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立即调集重兵实施军事镇压。福建当局根据既定的防御计划实施反击,其中司徒非第5师的任务是固守延平。第5师名为1师,实际兵力仅有4个营,附山炮2门,全师的机关枪也只有50余挺。司徒非根据地形和部队的实际情况,决定亲率3个营坚守撑持,2个连守九峰山,1个连守玉屏山,1个连守校场坊。

1934年1月3日,延平遭到南京方面第36师和第56师的两面夹击。在兵力不足又无外援的情况下,司徒非督率所部顽强抗击2昼夜,终因外围阵地尽失无力再战。为保残部和城内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司徒非派遣参谋长李海寰于5日下午18时出城接洽投降事宜。6日下午14时,司徒非指挥残部400余人出城接受改编,随后他本人离开部队避居香港,用自己的积蓄开办礼香酒庄,以此谋生。

1936年6月,广东、广西两省联合自治,并宣布反蒋抗日。司徒非在抗日旗帜的号召下捐弃前嫌,主动前往广州参与其事,被陈济棠任命为少将高级参谋。此后广东政权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但司徒非为圆抗日之志,决定仍然留在部队,被第4路军总指挥余汉谋任命为少将高级参谋。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8月,第66军奉命开赴上海参战。司徒非见有上阵杀敌的机会,强烈请求余汉谋批准其随军北上,并表示“头可断,血可流,寸土不让倭奴手;七尺微躯,誓将热血献轩辕”。余汉谋深为感动,遂批准了司徒非的要求,命他在第66军军部服务,辅佐军长叶肇。第66军于9月14日抵达前线后,叶肇命司徒非前往第160师行使督战之责。司徒非受命后不顾危险,亲往一线参战,在与日军血战近2个月并于11月26日奉命向句容转移。3天后,又根据军部命令,留2个团在丹阳、句容,主力撤往南京外围的麒麟门、白家场地区整理。

12月4日,第66军根据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的命令在汤山至句容

一线布防,构筑起保卫首都的第一道防线。军长叶肇随即召开军事会议,命令第159师担负汤山、汤山镇的守备任务,第160师除留第958团在麒麟门外,其余部队担负句容、方珠山、青龙山一线的守备任务,位置在第159师之前。司徒非在会中申请前往第478旅旅部所在的句容参战,但叶肇却命他留在白家场的师部,配合师参谋长华振中工作。从5日开始,第66军在以汤山为核心的阵地内与日军激战近5天,付出了较大的伤亡。7日,第478旅旅长邓志才率领第955团和第959团残部经过血战突围而出,随后抵达白水场休整。司徒非得知情况后,立即赶到部队慰劳,并安抚伤员,稳定士气。次日,该旅又被派到汤山参与反攻,但因部队疲惫,反被日军击退,第956团负责防守的孟塘阵地也被日军攻占。在此情况下,第160师已经无法再战,在司徒非和华振中不断请求下,叶肇终于在8日下午16时30分命令该师残部退到大水关、燕子矶整理待命。

12月10日,随着战况的不断恶化,司徒非随部队退入南京城内。此时日军4个师团的先头部队已经开始对南京城发动进攻。为指挥方便,第160师所属2个旅4个团于11日缩编为1个2团制的战斗旅,由第956团团长喻英奇代理旅长。同时第160师调整师部人事,鉴于兼任师长的第66军军长叶肇在军部主持指挥事宜,无暇分身,遂由师参谋长华振中升任副师长负责师部事务,参谋长一职调司徒非接任,参谋处长蔡如柏调任并编后的第956团团长,中校参谋钟汉柏接任参谋处长。

部队整编就绪后,于12日上午7时许奉命开赴城内玄武门至水西门一线构筑防御工事,以备日军突破南京城防后继续展开巷战。司徒非接到命令后,遂与副师长华振中商定任务分配,并开始赶筑防御工事。但由于缺乏构筑材料,工事的进度十分缓慢。

当天下午18时,司徒非见到了由军部参加完会议后返回的华振中,经由华传达军部命令,这才知道1个小时前,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已经下达了突围命令。司徒非急忙命令部队停止构筑工事,随后根据军部突围计划命令辎重连将所有辎重予以毁弃,命传令兵分途通知各部队向太平门集结,只待友军第159师扒开被封死的城门后,作为先头部队率先突击。12日晚上19时许,第160师所剩的2000余人全部在太平门内集结完毕,随后由华振中召集连长以上军官开会,由司徒非口述突围方案,撤退路线为经紫金山北麓、句容东南、溧水东南至宁国集结。经过讨论,由第956团为突击部队,第955团和第480旅的军官队随师部跟随行动。





晚上 21 时许,第 160 师按照计划陆续通过由第 159 师打开的狭小城门,随后以隐蔽前进的方式成功绕过紫金山北麓。由于遭到了溃兵的冲击,经叶肇与华振中商定,决定由华带第 956 团在前,叶带军部及第 955 团在后,部队以营为单位依次前进,司徒非随第 956 团行动。

当第 956 团经过岔路口时,被日军第 16 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第 30 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第 38 联队(联队长助川静三)发现,日军随即以猛烈的机关枪火力阻挡去路。第 956 团团长蔡如柏随即组织部队开始突击,但却不幸中弹身亡。副师长华振中与参谋长司徒非当即决定分头督率 1 个营展开队形再次实施突击。混战中,司徒非不幸身中数弹而亡,时年 44 岁。另一路由华振中率领的部队经过苦战后,终于在晚上 22 时左右突破日军防线,此后又经过仙鹤门、汤山等恶战,成功突围而出,此时全师仅剩 1000 余人。

司徒非阵亡后被晋级中将抚恤。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保卫战”的展览里,陈列着司徒非的照片和事迹介绍。2015 年 8 月 24 日,司徒非被列入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罗策群 字宇澄,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宁新镇大圳乡四角楼村(现属兴宁市宁新街道大圳村)的一户农民家庭。罗策群幼入私塾,后升入小学,但因家境窘迫而无法继续求学。渴望学习的罗策群为了能够继续求业,便决定投考不需学费的军校。罗策群首先进入的是广东陆军小学堂,这是他从军之始。在那里,他接受了初级军事队列、军事技术的学习训练,并结识了一同就学的叶挺、张发奎、黄琪翔、余汉谋、吴奇伟等人。1915 年 3 月,罗策群又和叶挺、张发奎等人一起升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继续接受军事教育。罗策群在预校学习时对文科和术科都十分努力,他化学、几何成绩良好,在战术、筑城学、射击等学科中也表现出色。

1917 年 2 月,罗策群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这是全国唯一一所被北京中央政府所认可的正规军校。经过为期半年的入伍生生活后,根据见习兵种被编入工兵连,学籍列为军校第六期工兵科。就学期间,罗策群注重战术学、工事建筑学、地形学、通讯学、战术训练等科目的学习,并与同在工兵连的叶挺、李振球、邓演达等人交好,尤其是李振球,对他今后的

仕途归属起到重要作用。在全连的 88 名学生中,有不少人在今后的戎马生涯中成长为将军,如林逸圣、李振球、邓演达、唐继麟、樊崧甫、甘芳、叶挺、赵锦文、杨宏光、卢佐、张修敬等人,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1919 年 3 月,罗策群学成毕业,他和大部分粤籍同学一样,都选择了返回广东效力。不过广东政权当时由桂系军阀把持,罗策群在考虑再三后决定前往福建漳州,投效陈炯明的援闽粤军。罗策群因在保定军校学习时术科成绩优秀,被任命为基层部队的见习教官,此后又调到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任见习参谋。1920 年 10 月,到军中任职仅 1 年多的罗策群已经当上了总部的少校副官。1922 年 6 月又被提拔为总部的中校参谋。1923 年 5 月,陈炯明在将所部扩编为 7 个军,又将罗策群调到粤军第 3 军(军长尹骥)参谋处任上校处长。

1925 年 10 月,陈炯明部在东征军的攻击下遭到重创,被迫下野,罗策群将残余一部收容改编为独立第 1 旅,自任少将旅长。1926 年 2 月下旬,陈炯明残部溃败。罗策群决定解散部队,只身返回广州,希望能够参加革命军队,谋求新的出路。1926 年 3 月,在保定军校同学、时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教官的陈勉吾(第六期骑兵科毕业)介绍下,罗策群得到了他戎马生涯中的第二次参军机会,即在潮州分校担任中校教育副官。

潮州分校成立于 1925 年 12 月,由何应钦兼代校长和教育长,教官多为保定军校毕业生,彼此之间大都十分熟悉,这使罗策群在分校任职期间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罗策群也因在潮州分校任职的缘故,而成了许多黄埔学生的“老师”,如毕业于潮州分校的毛人凤、蒋志英、方靖、戴之奇、竺鸣涛等以后成为军队中高级将领的人都和他有着这层关系。1926 年 12 月,潮州分校在第二期学生毕业后宣告解散,罗策群于 1927 年 1 月受到陆小同学张发奎的邀请,前往同样出自粤军的部队——第 4 军效力,任工兵营中校营长。

第 4 军在国民政府发起北伐战争之初就已经获得“铁军”的响亮名号,是国民革命军中较有战斗力的部队之一。通过第一次北伐,第 4 军逐渐发展壮大为第 8 路军,由李济深任总指挥。该军所属第 12 师于 1927 年 1 月在湖北武汉扩编为新的第 4 军,由原师长张发奎担任军长,罗策群效力的第 4 军即张氏第 4 军。第 4 军除张发奎之外,还有不少罗策群的旧日同学,如副军长兼第 12 师师长黄琪翔、第 12 师参谋长吴奇伟等人。罗策群在保定军校学的是工兵科,此次担任工兵营长可谓是他戎马生涯





中第一次能充分发挥他在军校所学的好时机。

1927年4月18日,武汉国民政府调兵进入河南开始第二次北伐。罗策群随部参战,于5月17日拂晓突破奉军的大炮和机关枪的火力封锁,指挥工兵营在东洪桥搭设浮桥。在架设浮桥时,罗策群不幸被炮弹击伤,但他坚持在指挥岗位上,完成浮桥的搭建任务,为第10师的步兵渡河打下基础,随即又拒绝了部下要求他撤下火线治疗的要求,继续指挥部队在步兵掩护下实施爆破,为步兵攻占上蔡提供有利条件。上蔡一战,奉军第12旅兵败,旅长富双英被迫率领残部向第4军投降,奉军第46旅旅长陈深因救援不利,被张学良撤职枪毙。此战极大地打击了奉军的士气,使奉军官兵闻“铁军”丧胆,但第4军也在这次战役中伤亡2600余人(工兵营伤亡60余人),其中校官就阵亡5名,罗策群则是2名负伤校官之一。此后,第4军又接连攻占临颖、开封,并在郑州与冯玉祥的第2集团军胜利会师,罗策群因伤没能继续参加战斗。在接下来的半年里,罗策群随第4军展转于湖北、江西、广东,继续担任工兵营中校营长。

1928年4月,罗策群随部开赴山东参加第三期北伐,先后经历了枣庄、泰安、济南诸役,于同年7月23日进驻德州。8月20日,第4军根据国民政府的编遣计划缩编为第4师,原军长缪培南改任师长。罗策群的工兵营在这次缩编中保留建制,他仍然担任该营中校营长。

1929年11月22日,第4师在怀集改称护党救国军第4师(师长张发奎),罗策群依然担任工兵营中校营长。1930年1月,第4师扩编为护党救国军第4军(军长张发奎),罗策群调升第4军所属第12师(师长邓龙光)的上校参谋长。1930年9月中原大战结束后,因为粤系军阀战败,罗策群在领取了一笔钱款后随师长邓龙光避居香港。

1931年9月,第4师的老师长、时任第1集团军参谋长的缪培南在陈济棠的扶持下成立教导第1师。已赋闲达半年之久罗策群在缪培南的举荐和陈济棠的批准下,出任教导第1师第1团上校团长。罗策群所部驻广东省中山县(此前该县直属南京中央政府)。在此期间,他于1934年10月率部平息地方民团的兵变,解救被扣押的县长唐绍仪,之后临时代理中山县县长10天。今天,在广东省档案馆中,还可以查询到1934年10月20日罗策群以“教导第1团团团长兼理县政”的身份管理地方事务的一份文件。1935年1月,罗策群调升第3师(师长邓龙光)少将参谋长。半年后,罗策群奉命在中山县带领部队采取行动,抓捕了刺杀著名民

主革命家廖仲恺的主谋嫌疑人之一朱卓文。

1936年3月13日,罗策群任陆军工兵上校。他虽已离开工兵部队有6年之久,仍因军校教育背景和早期任职经历被授予工兵兵科的官位。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时,罗策群被任命为第5军(军长缪培南)少将参谋长。事变之后,接管部队的余汉谋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改编。9月3日,罗策群出任粤军改编后的第159师(师长谭邃)第475旅少将旅长(辖谢彩轩第949团、何全标第950团)。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广东驻军纷纷请求开赴前线抗击日寇。9月初,罗策群所在的第159师奉命开赴上海参战。第475旅于9月16日开抵南翔,并在1天后推进到刘行阻击日军第3师团的进攻。罗策群率领所部顽强作战,其位于杨木桥的阵地几度易手,但都被他督率所部夺回。经9昼夜的激战,第475旅于25日奉命撤出战场开赴嘉定县的方泰镇整理待命。此后随着淞沪战局的逐渐失利,第475旅又奉命退守吴福线、锡澄线阻击日军。11月11日,第159师奉命退守吴福线,掩护第3战区主力部队撤离上海。11月26日,第159师奉命撤守南京。此时第159师调整人事,罗策群升任第159师副师长,第475旅旅长由林伟俦接任。

12月4日,第159师退抵南京后就接到了新的任务——担负南京外围汤山镇的守备。由于师长谭邃病重留在城内,部队实际上由罗策群负责指挥。当罗策群带着部队抵达汤山时,迅速命令所部进入既设国防工事,他希望能够依靠这些早就铸成的钢筋水泥掩体将日军挡住。当天下午,蒋介石带着首都要员前来视察,罗策群随同第66军军长叶肇等团以上军官进入镇内接受训话,并提出部队从上海撤下来损失较大,希望能够立即补充弹药。蒋介石表示,只要“守稳南京,就可空运补给”,意思就是先守再补。第159师就是在这种缺兵少弹的情况下,迎来了又一场恶战。

12月7日上午8时许,日军野战重炮兵第12联队(联队长富田富藏)一部对汤山发起了半个多小时的猛烈轰炸,这使进入前沿简易工事的第159师官兵伤亡惨重。罗策群为避免继续无意义的伤亡,决定命令前沿部队收缩入汤山的坚固核心工事和汤山镇内防守。此外,他还集中部队里的迫击炮往日军方向轰击还以颜色。据日军战地记者报道,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当时正巧在视察前线,突然被1发迫击炮弹的弹片击中皮带。7日下午13时许,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第19旅团(旅团长草场辰己)第9联队(联队长片桐保郎)在第30旅团(旅





团长佐佐木到一)第33联队(联队长野田谦吾)第1大队、第38联队(联队长助川静二)第3大队的配合下对汤山发起猛烈进攻。罗策群不顾危险亲往一线督战,经过数个小时激烈战斗,终将日军击退。

当天晚上,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准备在汤山实施一次反攻,由第66军、第41师、第72军补充旅第2团以及1个战车连协同作战。第66军军长叶肇接到命令后,连夜召开军事会议布置任务。罗策群接受任务,即返回部队准备在第二天凌晨发起攻击。不料日军第38联队第3大队先第159师一步于8日凌晨发起夜袭,所幸第159师防守严密,利用一些暗堡挫败了日军的偷袭。日军偷袭不成,又对汤山阵地发起猛烈炮击,事毕,继以步兵发起进攻,并乘势攻入汤山镇。罗策群不得不抽调兵力在汤山镇内与日军展开巷战,经此折腾,该师已经无力执行反攻任务了。经过一个上午的厮杀,第159师终于将日军赶出了汤山镇,但第477旅几乎伤亡殆尽,已经无力再次抵御日军的进攻。此外,投入反攻的第41师、第160师和第72军补充旅第2团都被日军击败,其中第41师的丁家山主阵连带丢失,第160师负责的孟塘和孔山阵地也接连失守,该师不得不向汤山的第159师靠拢。就在第66军形势岌岌可危之际,军长叶肇入夜后接到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的命令,要该军撤往南京城外的大水关收容整理。罗策群随即率领残部2000余人边打边退,汤山失守。

12月10日,第159师移驻明故宫附近作为南京卫戍军的预备队。当天,日军4个师团的主力逼近南京主城,与守军在光华门发生激战。11日,战况日益激烈,城外守军的阵地已有数处被日军突破,城门及城墙的争夺也几近白热化。在此情况下,罗策群几次请命参战,但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考虑到该师由上海撤出后连经恶战且未得休整,只命该师在城内的中山门至玄武门一线紧急构筑防御工事,准备城破后与日军展开巷战。为指挥方便,罗策群根据第66军军长叶肇的命令将第159师缩编为1个战斗旅,由第475旅旅长林伟俦负责指挥。为了表示死守南京之志,罗策群还对参谋长许让玄说:“城在我们在,城亡我们亡,我们再打一次硬仗吧!”

12月12日下午17时,就在罗策群督率所部赶筑防御工事的时候,接到了第66军军部转达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要守军突围的命令。根据计划,第159师应跟随第66军由太平门出击,在完成掩护友军中央军委教导总队、第103师、第112师等部出城后,经紫金山、麒麟门、土桥镇、



天王寺至休宁集结。命令下达后,第66军军长叶肇及与第83军军长邓龙光便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第66军军部召开军事会议,会中决定放弃掩护友军突围的任务,第66军和第83军由叶肇统一指挥,以第66军作为突击部队,第83军后续跟进,两军互相配合先行突围。

罗策群接到命令时,生病的师长谭邃已经随唐生智一起乘船转移,他便正式承担起指挥全师的责任。对于不掩护友军就先行突围,罗策群存有疑虑,但仍然决定执行命令,他跟随叶肇一同前往太平门指挥部撤除堵塞在城门内的沙包。经过3个多小时努力,终于在晚上19时30分打开了城门一角,随后两军部队按照第160师、2个军部、第159师、第154师的顺序于21时许陆续出城突围。

第159师出城时,突遇城外部分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官兵涌入,致使队伍被打乱。出城后,又因为沿途地雷密布,又造成不少伤亡。为了在混乱的战场上不让部队走散,罗策群命令工兵连用石灰标记突围方向,但石灰一时寻找不到,他急中生智,让兵站站长黄敬一将所带大米全部交给工兵铺撒,以替代石灰。此举成功地使突围部队前后衔接起来,并继续沿着指定路线行动。

罗策群率领第159师的先头部队成功绕过日军第33联队的防区,但在13日凌晨0时左右进至尧化门、仙鹤门时,遭到日军第38联队(联队长助川静三)的阻击。担负主攻任务的第949团连攻数次都告失败,团长黄纪福以下多名军官阵亡。罗策群随即亲自督队突击,但也没能成功,特务营营长李锡章、营附曾北行和第1连连长陈觉非先后阵亡。他眼见战斗越来越激烈,而部队却始终停滞不前,如再这样下去,只要日军大部队一到,全军突围必定失败。情急之下,罗策群举起马鞭大声呼叫道:“都跟我来,几大就几大,唔好做衰仔呀?(意指死就死,不要丢脸)”,随后,他提着一把轻机枪带着身边的特务营再次发起冲锋,不幸在突击时身中数弹,倒地而亡,时年43岁。罗策群阵亡后,部队由第475旅旅长林伟传继续指挥,这些残部几经磨难,终于脱险而出。

罗策群阵亡后被晋级中将抚恤。

2014年9月1日,罗策群被列入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李兰池 字奎墀,清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初五日(1896年10月11日)出



生于奉天省昌图县金家屯柳条沟(现辽宁省昌图县金家镇柳条沟)的一户农民家庭。为求生计,李兰池出生后不久就随父亲举家迁居至吉林长岭县太平川,并在那里读私塾,后升入县立高小。他勤奋好学,饱读诗书,高小毕业时,就已经练得一手好书法。

随着时局变化,李兰池开始对国事多有主张,他愤于国弱战多,民不聊生,于是产生了从军革弊、富国强兵的想法,只可惜东北地区的军校只招收现役军官,这使他失去了投考军校的机会。

1922年9月,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改革体制,开始公开招募部分社会人员入校学习。李兰池准备前往一试,但由于消息的延迟,当他抵达沈阳时,校方已经招考完毕。李兰池无奈之下只得继续等待,终于在1923年10月成功考入讲武堂第五期骑兵团(科长周孝培),被编在第3队(队长何柱国)骑兵分队(分队长章鸿春)。

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师资力量十分雄厚,不仅有国内名校——保定军校的毕业生,还有来自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法国炮工学校和奥地利炮工学校的毕业生。军校的监督张学良、教育长萧叔萱等人十分重视讲武堂建设,这使第五期学生受到了自讲武堂建校以来最好的军事教育。

李兰池刻苦学习,好学不倦,在历次考试中都名列前茅。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讲武堂因此中断教学,原本由部队保送入堂学习的军官全部返回原部队服务,像李兰池这样直接从社会入堂学习的学生则量材分配。李兰池被分配到骑兵第2游击队(统领程海峰)当少尉排长。

1925年3月,李兰池重新回校续学。由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有部分学生阵亡,重新开学时又有部分学生被部队留下,这使返校学生的数量大幅度减少。为此,校方裁撤了原本的3个队,将所属12个分队并编为9个分队,李兰池仍然编在骑兵分队(分队长曹鹏)继续学业,并于同年10月顺利毕业。

李兰池毕业后返回骑兵第2游击队效力,被提拔为第1帮统部中尉执事官,后又提拔为统领部上尉副官。由于李兰池严以律己,正直豪爽,又能将自己在军校所学有机地结合部队的实际情况,因此颇得上级赏识和士兵拥护。此后李兰池因“韬略过人、作战勇敢、治军严格”而被外调为带兵官,任上尉连长。1928年3月又被调升为陆军第52旅(旅长董英斌)第179团(团长吴景春)第1营少校营长。



1928年12月,子承父业的张学良率领东三省军政机构宣布易帜,国民政府在名义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大业。与此同时,张学良锐意整顿奉军,裁汰老弱、缩编部队。李兰池营于此时改编为东北陆军(旅长董英斌)第15团(团长陈树楷)第1营,他仍然担任少校营长,驻防锦州。

1929年7月中东路战争爆发,李兰池随部北开,担负哈尔滨至满洲里一线铁路的护路任务。战争结束后,李兰池又随部返回原防。中原大战爆发后,张学良于1930年9月通电拥护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李兰池所在的第5旅又作为先头部队率先入关,在南口接替了晋军的防区。接着,他又随部进驻宣化。1931年5月,张学良所部东北边防军各部根据国民政府的军队统一番号进行变更。李兰池营因此改称独立第11旅(旅长董英斌)第631团(团长陈树楷)第1营,他仍任该营少校营长。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李兰池痛心疾首,他激励士兵要保家卫国,并向上级递交了请愿书,希望张学良能率部打回东北。然而事与愿违,国民政府所寄予希望的国联完全没能解决东北问题,反使日本扶持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面对丧失的东北土地,李兰池只能遥望北方,提笔写下《满江红》《示儿》等爱国诗词,以激励斗志,提醒自己不忘国耻,期待着有朝一日收复失地。

1933年1月,日军侵略热河,省主席兼第55军军长汤玉麟不战而逃。2月,长城抗战爆发,时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的张学良终于下达了抵抗的命令,并将即将参战的各独立旅升格番号为师,李兰池营于此时改称第111师(师长董英斌)第631团(团长李景亨)第1营,他继续担任该营少校营长。李兰池接到参战命令,欢欣鼓舞,他不断激励所部官兵的士气,期待能够在即将开始的战争中将日军击败。不想第111师的任务是进驻天津,保障前线作战部队的后方安全,这使他又一次失去了与日军作战雪耻的机会。战后不久,李兰池虽然升任第631团(团长刘启文)中校团附,但他仍在等待为国杀敌的机会。

1935年5月29日李兰池任官陆军骑兵中校。虽然李兰池在骑兵部队里任职很短,但仍因军校教育背景和早期任职经历而被授予骑兵兵科的官位。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促使蒋介石停止“围剿”红军,并达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然而参与并领导事变的张学良却被免职软禁,东北军因此四分五裂,被迫接受重新改编。1937年6月,第111



师在河南周口缩编为第 112 师(师长霍守义)第 336 旅(旅长李德明),李兰池改任该旅所属第 672 团上校团长。

1937 年 7 月抗战全面爆发。8 月,淞沪会战开始。李兰池所在的第 112 师于 8 月下旬接到了开赴江苏淮阴布防、掩护淞沪战场后方的任务。全师官兵听闻此事后欢呼雀跃,纷纷议论“只要打鬼子、救中国,再苦再累也没有说的,流血牺牲算不了什么,这样才对得起白山黑水间盼望多年的亲人”,李兰池也终于有机会与日军在战场上较一较高下了。9 月 1 日,李兰池率部抵达淮阴,随后根据师部的命令进驻新安镇。1 个月后,第 112 师调整人事,李兰池升任第 336 旅上校副旅长,遗第 672 团团长缺由万毅接替。此时的淞沪战场上,国军已显败迹。为了掩护淞沪国军主力的撤退,第 112 师于 11 月 3 日奉命开赴靖江。3 天后,又奉命改开江阴,承担起保卫首都南京的重任。

江阴是长江下游的咽喉要地,清朝末年曾修筑炮台,国民政府时期又予以加固,有着坚固的防御工事。当淞沪地区的国军开始大撤退后,江阴不可避免地成为日军的下一个重要攻击目标。根据师长霍守义的部署,第 112 师所属第 334 旅担负青阳至澄江一线的守备任务,第 336 旅主力担负江阴西郊的守备任务,该旅所属第 672 团驻城东,作为师预备队使用。此外,协防江阴的还有要塞炮兵部队,左翼有第 103 师策应。

11 月 28 日起,日军第 13 师团对江阴发起猛烈进攻。李兰池亲临前线督率第 671 团在西郊奋战 3 天,数次击退日军的进攻。30 日,日军突破了第 334 旅的防线,第 112 师除第 672 团外皆伤亡惨重。师长霍守义见情况危及,决定留第 672 团殿后,自率主力突围。12 月 1 日,李兰池随部撤离江阴,开赴镇江休整。

第 112 师抵达镇江还没有得到喘息之机,就又接到了开赴南京保卫首都的命令。霍守义考虑到部队损失近半,决定将第 334 旅缩编为第 668 团、第 336 旅缩编为第 672 团,由第 334 旅旅长马万珍以代理师长的名义率领前往南京。第 336 旅旅长李德明因负伤离部,暂由李兰池负责全旅事宜,霍守义原打算留他在镇江接收新兵重整部队,但李兰池却主动请命前往南京,继续到前线抗击日寇。

12 月 7 日,第 112 师抵达南京太平门,接受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长桂永清的指挥,根据桂氏命令,第 112 师担负紫金山南麓至长江一线的守备任务。此时的第 112 师只有第 334 旅第 668 团和第 336 旅第 672 团总计

4000 余人,马万珍在同师参谋长李寓春、李兰池等人商量后决定,由马氏指挥第 668 团负责防线的右翼、李兰池指挥第 672 团负责左翼。

为鼓舞士气,李兰池不断视察阵地,他用“抗战必胜、誓死保家”的道理去激励部属奋勇杀敌。10 日中午,日军第 16 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第 30 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第 38 联队(联队长助川静二)一部在炮兵的火力掩护下对第 672 团阵地发起进攻,李兰池与团长万毅各率一部在蒋庙和洋冈港分头拒敌。在日军的猛烈炮火中,他奋不顾身,多次亲上一线督战,并数次拿着冲锋枪突入敌阵,抢夺丢失的阵地。战至 12 日下午 18 时许,第 672 团伤亡惨重,第 2 营营长孙显庭、第 3 营营长程义贵及连、排长多人阵亡。尽管如此,第 672 团仍在苦苦支持。就在这个时候,马万珍派遣的联络参谋找到了李兰池,告知教导总队在没有通知第 112 师的情况下突然撤退,经过了解才知道是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已经在 1 个小时前下达了突围的命令。由于马万珍无法用电话联系上李兰池,这才派遣联络参谋前往通知李兰池,而万毅已经通过电话告之经狮子山炮台朝着芜湖公路突围。李兰池接到命令后,于入夜后带领残部 200 余人向下关方向撤退。但沿途溃兵不断,李兰池等人的行军速度十分缓慢。

12 月 13 日上午 10 时许,当李兰池带着部队撤抵太平门时,与正在进攻的日军第 30 旅团第 33 联队(联队长野田谦吾)突然遭遇。为突破日军的阻击,李兰池又一次奋不顾身地带头向日军阵地发起冲锋,但这一次,他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 41 岁。同他一起阵亡的还有第 366 旅中校参谋阎绍光、上尉军需官钱乃钧、中尉迫炮排长董国恩等人。

2014 年 9 月 1 日,李兰池被列入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姚中英 原名若珠。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出生于广东省平远县大柘镇墩背村的一户农民家庭。姚家世代务农,家境清贫。姚中英 10 岁时,父母双亡,由他的四叔姚加士抚养长大。此后又在亲友的资助下,考入平远中学初中部。姚中英生活朴素,热爱劳动,勤奋好学,喜好交际,待人热情。他素怀大志,初中毕业后,便决定离开家乡投军当兵。

姚中英于 1924 年入广州大本营警卫军当兵,由于他具备初中文化,很快就被提拔为文书,旋在姚雨平的举荐下于同年 8 月考入黄埔军校第





二期步兵科接受军官速成教育。姚中英被编在步兵第2队(队长郜子举),学习期间曾随军校教导团参加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的战斗。此后他又随部追击林虎,并缴获了林氏的马鞭和皮靴,得到校方的嘉奖。

1925年9月,姚中英学成毕业,他被任命为“平南”运输舰代理党代表。2个月后,他奉命督率平南舰和同学张炎元督率的安北舰,配合第4军参加平定军阀邓本殷的战斗。

1926年2月,姚中英被调回军校,任军官第1补习班上尉教官。半年后派往粤军服务,任第11师(师长陈济棠)补充第1团(团长张瑞贵)少校营长。1928年1月又被调升为新成立的补充第2团(团长张达)中校团附。2个月后,陈济棠将所部扩编为3个师,姚中英所在部队改称第11师(师长余汉谋)第32团(团长张达),他仍任中校团附。

1928年12月,经陈济棠选送,姚中英成功考入陆军大学深造。经过3年的刻苦学习,他于1931年10月学成毕业。此后姚中英返回粤军效力,任独立第3旅(旅长严应鱼)第9团(团长伍汉屏)中校团附。1932年2月,所部改称独立第1师(师长黄任寰)第2旅(旅长严应鱼)第6团(团长伍汉屏),他仍任中校团附。

考虑到姚中英是陆军大学的高材生,第1集团军总司令兼燕塘军校校长陈济棠于1933年10月将他调入军校担任上校战术教官,以便让姚为粤军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基层军官。此时正值长城抗战结束不久,姚中英知道中日两国虽然签订了停战协议,但日本对中国的觊觎,终究会爆发全面战争。因此他借担任教官的机会,一方面将自己所学倾囊相授,另一方面则不断宣传抗日爱国,使军校学员都能以日本为假想敌,做好抗战准备。

1936年8月陈济棠联合李宗仁反蒋失败后,粤军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改编,姚中英于此时调任第4路军(总指挥余汉谋)教导旅(旅长罗梓材)上校参谋长。1937年1月20日,姚中英任陆军步兵中校。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姚中英立即上书第4路军总指挥部,表明自己誓死救国、杀敌立功的决心。

1937年10月,姚中英所在的教导旅被编入第83军(军长邓龙光)战斗序列,随后开赴上海参战,他为免除后顾之忧,决定让家属返乡居住。姚中英的叔父知道这件事后,好心劝他留在家乡陪伴家属,但被姚中英拒绝。他说:“古语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是军人,在这国家民族存亡



的紧要关头,我怎能躲在家里过日子呢?我一定要赶往抗日前线,把日本侵略军赶出去。只要四万万同胞不至于做亡国奴,我个人的安危就无所谓了”。

当教导旅开抵苏州时,上海守军已开始奉命西撤,于是第 83 军又奉命转开无锡布防。与此同时,第 83 军所属各部调整人事,姚中英被提拔为第 156 师(师长李江)少将参谋长。12 月 3 日,第 156 师奉命撤守丹阳至镇江一线,并就地构筑防御工事配合第 87 师阻击日军。姚中英随部抵达目的地后,即亲带参谋人员视察阵地,并指导所部设置合适的重火力点。

12 月 6 日,第 156 师奉命撤往南京外围的麒麟门休整。4 天后,第 66 军、第 41 师等部在汤山遭到日军重创,为使这些部队能够顺利撤离,第 156 师奉命前往接替该军位于方珠山至青龙山一线的阵地。姚中英随部赶到前线时,日军第 16 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第 30 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第 33 联队(联队长野田谦吾)进攻正酣,他随即与部队投入反击,成功迫使日军暂停攻势,使友军顺利撤出战斗。此后第 156 师又接到驰援光华门的命令,该师边打边退,并于当天下午接替了光华门至通济门一线城墙的守备任务。

当时日军进攻光华门的主力虽然暂时停止了进攻,但有一部却占领了光华门城门洞。为解除这个威胁,姚中英提议入夜后组织突击队坠城突袭,师长李江认为可行,即挑选敢死队员。10 日深夜,敢死队开始行动,但日军却依托被炮弹轰塌的沙袋、石块和木材形成的斜坡构筑起 3 道掩体死战不退。敢死队虽然歼灭了一部分日军,但却始终没能夺回城门。

11 日上午,日军第 9 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第 18 旅团(旅团长井出宣时)第 36 联队(联队长胁坂次郎)对光华门发起进攻,姚中英在城头协助师长李江指挥反击,屡次击退日军进攻。如此几次三番的激战,终于勉强支撑到 12 日下午 18 时许。此时,第 83 军军长邓龙光通过电话命令李江率领第 156 师向太平门集中,并准备突围。由于日军仍然在持续进攻,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全身而退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友军各部依然在城墙上坚持抵抗,第 156 师的突然后撤必将动摇军心。姚中英于此时主动承担指挥第 932 团断后任务,使第 156 师主力能够陆续退出战斗,向目的地集中。

当姚中英完成任务,并率领第 932 团余部在晚上 21 时逐次退到太平



门时,发现城门处一片混乱,第156师主力已经离城东去。在此情况下,姚中英极力维持第932团的建制,出城后向紫金山北麓追赶部队,途中遭到日军第33联队的阻击。为迅速赶上主力,姚中英当即纵马率领士兵发起突击,却不幸在激战时中弹身亡,时年39岁。

1957年9月,姚中英的名字被列在广东省平远县人民政府建设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上。2014年9月1日,姚中英被列入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谢彩轩 原名谢必宾,字以行,清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三日(1898年6月21日)出生于广东省合浦县南康镇黄梢村(现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铁山港区南康镇)的一户书香门第。谢父邦馨以开办私塾为生,谢彩轩即在父亲的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以优异的成绩从廉州中学毕业后返乡从事教育工作。

谢彩轩从小就胸怀救国救民之志,他目睹时艰,决定投笔从戎。于1921年入广东陆军第1师(师长邓铿)当兵。因他具有中学文化,很快就被调到连部担任上士文书,后升任准尉司书。1923年8月,谢彩轩考入设在肇庆的西江讲武堂步兵科,接受军官速成教育。

1924年7月,谢彩轩学成毕业,他被分配到建国粤军第1师(即原粤军第1师,师长李济深)第1旅(旅长陈铭枢)第1团(团长张发奎)担任少尉排长。1925年1月,谢彩轩随部参加了广东革命政府组织的第一次东征。在安流战斗中,他率领所部截击正在撤退的陈炯明叛军,俘获百余人。

第1团于1925年8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旅(旅长张发奎),谢彩轩升任中尉排长。3个月后,独立旅扩编为第12师(师长张发奎),谢彩轩被调到新成立的第34团(团长叶挺)担任中尉排长。1926年1月,第34团改编为第4军独立团(团长叶挺),他仍任中尉排长,此后随部队参加了北伐战争。

1926年8月下旬,在北伐军攻打湖北省汀泗桥的战斗中,谢彩轩不幸负伤,但他没有撤出战斗,而是裹伤再战。他和战友们英勇作战,终于占领了战略要地汀泗桥,为攻取武昌打开了南大门,使革命的势力迅速发展 to 长江流域。随后,在北伐军攻打武昌城的战斗中,谢彩轩于攻城时胸部中弹,却又因子弹击中袋内银元而幸免于难。他随叶挺独立团参加两

次作战,都化险为夷,被军中称为“传奇人物”。

1927年1月,独立团在武汉扩编为第25师(师长朱晖日),谢彩轩被提拔为该师所属第74团(团长黄世途)上尉连长。同年8月,第25师主力参加南昌起义,但第74团团团长黄世途约束所部不得参与。此后第25师残部由新任师长李汉魂重新整补,并逐渐恢复建制,谢彩轩仍任原职。1个月后,他随部返回广东,却因广东政权的权利斗争而被卷入内斗。1928年1月,第25师在河源被陈济棠的第4军打败,其残部被迫退往江西。谢彩轩指挥的部队因负责断后而被截断退路,不得已向陈济棠投降。谢彩轩投降后部队并没有被缴械,而是整建制被编入新成立的第11师(师长陈济棠)补充第2团(团长张达),他继续担任上尉连长。2个月后,补2团改称第11师(师长余汉谋)第32团(团长张达),他仍任原职。1929年3月,第32团改编为广东编遣区第1师(师长陈济棠)教导团(团长张达),谢彩轩仍任连长。半年后,教导团改称第62师(师长香翰屏)第124旅(旅长张达)第248团(兼团长张达),谢彩轩升任第3营少校营长。

1931年6月,陈济棠与李宗仁重新修好,并将所部改编为第1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谢彩轩营此时被改编为新成立的第1教导团第3营,他仍任少校营长。3个月后,谢营改称第1教导师(师长缪培南)第1团第3营,他随之升任中校营长。谢彩轩的主要任务是率部驻防广州城郊三元里,卫戍广州。由于他治军严明,并在第1集团军总部组织的广州驻军校阅中名列第一,被授予“模范营”的光荣称号。在此期间,他还曾率部参加过两次保境安民的军事行动。

1932年6月,位于连县的军寮排瑶因屡次犯案并抗拒法院传讯。经省府民政厅与第1集团军总部联络要求派兵解决该部,这个任务则由谢彩轩来执行。6月16日夜,谢彩轩亲率1个连在地方民兵的配合下冲进瑶营,但遭到瑶兵的反击。谢彩轩原想和平缴械,不想竟遭到抗拒,便下令武力解决。经过3个小时战斗,将瑶兵击溃,并逮捕28名涉案嫌犯,缴获长枪18支。至此,瑶案得到解决。

1934年3月,龙山匪势日益猖獗,地方民团屡次围剿无效只得请省府与军方协调,调正规军来解决问题。谢彩轩营奉命执行围剿任务,他派遣侦察人员了解匪情,以突然包围袭击的方式将土匪位于潞江口的匪巢剿灭,并俘获土匪20余人,在将他们押解到龙山市区后,选匪首10人予





以公开枪决,余犯则押送省府处理。

1935年7月15日,谢彩轩任陆军步兵少校。1936年6月,陈济棠联合李宗仁发动“两广事变”,他们打出抗日口号,并积极扩军备战,谢彩轩因部队扩编,被提拔为第8师(师长黄质文)第24团上校团长。但未及2个月,陈济棠的反蒋政权就宣告瓦解,粤军重新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收编。在这次改编中,谢彩轩的第24团被裁撤,他调任第4路军(总指挥余汉谋)上校参议。

谢彩轩不愿空挂虚职无所事事,他申请兼任合浦县三合口军垦区主任,使编余下来的老弱士兵都能有个归宿,并通过开垦解决部分军费。在谢彩轩的努力下,三合口不到一年就种植起大量的园林树木,但他却不幸身患疟疾。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谢彩轩不顾病体屡次申请参加抗战,终于在11月得到第4路军总指挥余汉谋的批准。此时正值开赴上海参战的第159师(师长谭邃)调整人事,其中第475旅(旅长林伟俦)第949团团长黄纪福调升第477旅副旅长,空出的团长缺由谢彩轩接替。他得此任命极为振奋,当即连夜北上寻找部队。由于第159师正从吴福县撤往南京,谢彩轩便在南京与部队会合,随后前往汤山接管部队。

12月7日下午13时,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第19旅团(旅团长草场辰巳)第9联队(联队长片桐保郎)在第30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第33联队(联队长野田谦吾)第1大队的配合下对汤山发起猛烈进攻。谢彩轩初到部队,即以带病之躯在一线督战。2天后,谢彩轩奉命带着部队撤往大水关整理,旋又转移到明故宫附近整理。

12月11日,第159师奉命撤入城内,并在中山门至玄武门一线构筑防御工事,准备与日军进行巷战。为使部队能够集中有生力量,第159师根据第66军军部的命令将部队缩编为2个战斗团,由第475旅旅长林伟俦统一指挥,第477旅旅长陈骥指挥2个只有军官和士官的空架子团。在整编中,第949团作为战斗团保留建制。由于谢彩轩新任团长对部队不太熟悉,他奉命与第477旅副旅长黄纪福互换职务。

12月12日下午17时许,第159师接到放弃南京的突围命令。晚上19时30分,谢彩轩所在的第477旅因是非战斗单位,奉命随师部从太平门出城。13日凌晨0时,谢彩轩在随部抵达尧化门、仙鹤门时,遭到日军第30旅团第38联队(联队长助川静三)的阻击。

第159师曾组织数次突击都告失败。为使部队迅速脱险,指挥全师的副师长罗策群重新组织敢死队进攻。谢彩轩响应号召投入作战,在机枪和手榴弹的火力掩护下,他带着数名士兵成功突入日军阵地,为后续部队杀开一条血路,但自己却在激战中不幸中弹伤重而亡,时年39岁。

谢彩轩阵亡后被晋级少将抚恤。

2014年9月1日,谢彩轩被列入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李绍嘉 字少霞,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出生于广西省贵县石龙镇(现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东龙镇)的一户农民家庭。李父早逝,由母亲刘氏抚养长大。为了能够出人头地,李绍嘉在19岁的时候投入粤军当兵,靠自己吃苦耐劳作战勇敢,升至上尉连长。

1926年8月,李绍嘉调升第11师(师长陈济棠)补充第1团(团长张瑞贵)第2营少校营长。补充第1团由军阀邓本殷的残部收编而来,军纪涣散且无斗志,李绍嘉到职后积极整顿严肃军纪,使该营的风气大为改观,得到了当地民众的赞许。

1928年3月,陈济棠以第11师为基础扩编成第4军,李绍嘉调升为第12师(师长香翰屏)第35团(团长巫剑雄)中校团附。1929年3月,第35团改称广东编遣区第1师(师长陈济棠)第2旅(旅长香翰屏)第4团(团长巫剑雄)。同年9月部队又改称第62师(师长香翰屏)第123旅(旅长张瑞贵)第246团(团长巫剑雄)。李绍嘉仍任该团中校团附。

1931年6月,陈济棠将所部第8路军改编为第1集团军,并扩编军队,李绍嘉被调升到第1独立旅(旅长范德星)任第2团上校团长。1932年8月,所部又改称独立第3师(师长李汉魂)第2团,他仍任上校团长。其后,他考入第3军军官教导团深造。

1934年12月,李绍嘉调升第9师(师长邓龙光)第25团少将团长。1936年6月,陈济棠联合李宗仁发动“两广事变”,但未及2个月即被南京国民政府瓦解。粤军被迫接受改编,李绍嘉团被改编为第156师(师长李汉魂)第466旅(旅长王德全)第932团,他仍任少将团长。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李绍嘉随部驻防广东,但心里却记挂着于8月出征上海的第66军,他也想投入战场抗击日寇,但所部却迟迟没有接到参战命令。10月下旬,第156师终于接到了参战命令,李绍嘉部





在广州集结完毕后即于11月初由火车运送北上,再经汉口船运苏州。经过半个多月的颠簸,李绍嘉率领的第932团终于在月底抵达无锡。此时第156师调整部队人事,李绍嘉被调到第468旅(旅长黄世途)担任少将副旅长,团长遗缺由邓军凯接替。

12月6日,李绍嘉随第468旅撤往南京麒麟门休整。4天后,为让在汤山与日军激战的第66军等部撤回南京,李绍嘉随部出击,接替了友军方珠山至青龙山一线的防务。此时,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第30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第33联队(联队长野田谦吾)对青龙山发起进攻,李绍嘉在一线督战。在日军炮兵和航空兵的猛烈轰炸下,许多阵地都被摧毁,日军甚至一度利用部队不稳的机会突破防线。李绍嘉和旅长黄世途见状各带一部实施反击,在经过激烈的白刃战后日军击退。当天下午,第468旅奉命撤入南京,随后奉命支援正在光华门与日军激战的教导总队第2团和保安警察等部。

11日上午,日军第9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第18旅团(旅团长井出宣时)第36联队(联队长胁坂次郎)继续对光华门发起进攻。面对日军的不断压迫,李绍嘉时而操纵轻机枪扫射,时而带着士兵投掷手榴弹堵缺。此情此景,无不让他身边的士兵受到鼓舞,他们个个都使出了全力坚守在城头之上。

12月12日下午18时许,正在激战中的第156师接到第83军的新命令,军长邓龙光要求该师向太平门集中随同主力突围。由于日军进攻正盛,部队无法顺利脱离,师参谋长姚中英见状表示愿意带第932团断后,使师主力能够顺利向太平门转移,李绍嘉闻讯后也主动申请留下,愿与他从广东带到南京的老部队共生死。

12日晚上20时左右,第156师主力陆续撤离完毕,李绍嘉又自愿带1个连守在城头,以掩护师参谋长姚中英等人撤离。乘着日军第36联队的休整间隙,姚中英等人通过绳索坠城的方式沿着城墙线向太平门成功转移。李绍嘉见任务完成,也随即准备撤离,但他却发现此时的城墙线上,仍然有友军士兵在坚守岗位。李绍嘉环顾四周,触景伤情。他最终决定留在城墙上继续战斗,跟随他的一个连士兵见状,也不愿离开长官而去。而那些留在城墙上的教导总队第2团士兵及保安警察见有高级军官愿意留下作战,也都表示愿意接受他的指挥。

深夜时刻,日军第36联队又一次对光华门及周边城墙发起进攻。猛

烈的炮火和工兵的爆破,终使城墙出现坍塌,李绍嘉左右奔走指挥防御,终见大势已去而命令部属突围。众士兵仍不愿离他而去,便簇拥着他一同用绳索坠城而下。不料绳索突然断裂,致他坠城后腿骨摔断。部属见状愿背着他离开,但李绍嘉见日军进攻急迫,他不愿拖累部属,用手枪逼着他们立即突围,众人不得不含泪离去。李绍嘉则在1名坚持留的士兵帮助下缓慢地移动到路旁。日军第36联队的士兵很快就发现了李绍嘉,他们端着步枪冲了过来。李绍嘉举起手枪不断地对着日军士兵射击。面对源源不断的日军,手枪子弹很快就用完了,留在身旁的士兵也在与日军肉搏时阵亡。为了不使自己被俘受辱,李绍嘉毅然拉响手榴弹,与冲到他面前的日军士兵同殉,时年39岁。

李绍嘉阵亡后被晋级中将抚恤。194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准许李绍嘉入祀首都忠烈祠。

1974年3月获台湾当局批准入祀台北圆山忠烈祠。2015年8月24日,李绍嘉被列入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蔡如柏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出生于广西省邕宁县长塘乡(现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长塘镇)的一户农民家庭。蔡父德开为培养蔡如柏成才,曾送他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后又接受过新学教育。对于素怀大志的蔡如柏来说,他不想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便于1923年离家投入黄绍竑的广西讨贼军当兵。

在统一广西的战争中,蔡如柏追随黄绍竑先后与陆荣廷和沈鸿英的军阀部队作战,并以战功升任少尉排长。1925年9月,考入位于梧州的广西陆军干部养成所接受军官速成教育。

1926年3月,广西陆军响应国民革命,被广州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军长李宗仁)。此时正值蔡如柏学成毕业,便被派到该军所属第5旅(旅长伍廷飏)担任中尉排长。北伐战争开始后,蔡如柏随部留守广西。

1927年3月,蔡如柏在友人的介绍下转入粤军,出任第11师(师长余汉谋)第33团(团长叶肇)中尉排长。1928年1月,他随部与张发奎的第4军作战,因在五华战役中立功而被提拔为上尉连长。蔡如柏在军中“慷慨好义,不拘小节,奉上以礼,待下以和”,因此深得叶肇的器重和部



属的爱戴。

1929年3月,蔡如柏所在的第33团改编为广东编遣区第1师(兼师长陈济棠)第1旅(旅长余汉谋)第2团(团长叶肇),他在这次改编中仍然担任上尉连长。1个月后,蒋桂战争爆发,位于广西的第15军为配合在湖北的桂系主力而攻入广东。5月,粤、桂两军主力在白泥展开激战。在战局陷入僵持阶段时,蔡如柏率领所部实施夜袭,很快就在桂军阵地上打开一个缺口。此后桂军大败,蔡如柏也因立此功而被提拔为第8路军(总指挥陈济棠)护士营少校营长,负责总部的保卫任务。

1931年6月,陈济棠将所部第8路军扩编为第1集团军,自任总司令。在部队扩编时,蔡如柏所部改编为第8师(师长黄质文)第22团(团长叶寿尧)第1营,他仍任该营少校营长。4个月后,蔡如柏被调升到新成立的独立第3旅(旅长严应鱼),担任参谋处中校处长。1932年2月,独立第3旅改编为独立第1师(师长黄任寰)第2旅(旅长严应鱼),根据部队编制,蔡如柏改任该旅中校主任参谋。

1936年6月,广东、广西两省联合自治,并宣布反蒋抗日。为防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调军进攻,陈济棠扩军备战。蔡如柏被调升为新成立的第11师(师长曾友仁)任上校参谋长。然而这次两广反蒋行动仅维持了1个月,就被蒋介石采取政治和金钱攻势瓦解,陈济棠被迫下野,粤军也随之接受改编。第11师被裁撤,蔡如柏成为无业军官,幸得老长官、改编后出任第160师师长叶肇的邀请,前往该师参谋处担任中校参谋。此时参谋处处长空缺,蔡如柏奉命代理处长。

第160师驻防河源,由于部队新成,内部还需调整,加上地方匪患再起。蔡如柏以代理参谋处长的身份为部队的整合和剿匪制订计划,事毕,他又承担起为第160师补充兵源的责任,深得叶肇的信任和嘉许提升为参谋处上校处长。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8月,蔡如柏随部开赴上海参战。由于叶肇升兼第66军军长,无暇兼顾第160师。该师又没有副师长,主要由参谋长华振中负责指挥,而作为参谋处长的蔡如柏则担负起参谋长职责,但凡作战、补给等计划全由他一人主持。

11月26日,第160师奉命撤往南京,随后被编入保卫首都的战斗序列,新任务是在句容至青龙山一线布置新的防线。考虑到部队连日作战伤亡较大而又无法得到补充,蔡如柏建议由第478旅旅长邓志才指挥第

955 团和第 958 团合力担负句容的守备任务,实力相对完整的第 956 团守备方珠山、多子山、青龙山、孟塘等地,第 480 旅旅长利树宗率领第 959 团转移到麒麟门休整。12 月 5 日,日军第 16 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第 19 旅团(旅团长草场巳辰)对句容发起猛烈进攻。负责师部指挥事宜的华振中亲往一线督战,留蔡如柏坐镇师部,接受军长叶肇的指挥。经过 2 天激战,日军见句容久攻不下便改用侧翼包抄战术,试图在切断句容和汤山镇的联系后将守军围而歼之。蔡如柏侦悉日军意图后,立即建议叶肇将在句容苦战两日的部队撤回整理。叶肇同意其建议,并让撤回的 2 个团休息一夜后投入到汤山方向的反攻中。战至 8 日下午,蔡如柏奉命随部撤往大水关、燕子矶整理待命,2 天后又退入南京城内。

由于第 160 师在上海和句容作战期间伤亡较大,军长叶肇在 11 日决定将该师残部精简缩编为一个战斗旅。与此同时,第 160 师人事也作出新的调整,师参谋长华振中升任副师长,缩编后的战斗旅由第 956 团团长江奇任代理旅长,喻氏空出的上校团长缺调参谋处长蔡如柏接任,而蔡空出的处长缺,则由中校参谋钟汉柏升任。

12 日 7 时许,到职才 1 天的蔡如柏奉命率部进驻玄武门构筑防御工事,准备等日军突破城防后展开巷战。但在当天下午 18 时许,第 66 军军部又根据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的命令下令突围。根据计划,第 160 师作为第 66 军和第 83 军的突击部队,保障后续跟进的军部及友军顺利突围,而第 160 师选择的主力突击部队,为蔡如柏率领的第 956 团。

12 日晚上 21 时许,蔡如柏指挥部队从太平门率先出发,他们利用夜色隐蔽前行,并成功绕过紫金山北麓的日军阵地,在抵达岔路口时,被日军第 16 师团第 30 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第 38 联队(联队长助川静三)发现,日军随即以猛烈的机关枪火力封锁突围道路。

为使部队能够尽早突出重围,副师长华振中和参谋长司徒非都赶到前方督战,蔡如柏随即命令部队展开队形,并组织敢死队实施突击。在部队接连 2 次攻击失利后,他亲自带着 1 个排向日军阵地冲去。激战中,蔡如柏不幸中弹身亡,年仅 39 岁。

蔡如柏阵亡后被晋级少将抚恤。

2015 年 8 月 24 日,蔡如柏被列入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高致嵩 字子晋,清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初九日(1899年8月14日)出生于广西省岑溪县归义镇谢村(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市归义镇谢村)的一户地主家庭。因家境殷实,高致嵩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上私塾时,高致嵩熟读经史,“下笔为文,清顺可诵”。升入县立高中后,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毕业后,在县立高等小学担任教员,由于他“教学认真,诲人不倦,独出心裁,诱导启迪”,加之他积极倡导改进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志向,受到县教育局嘉奖。

高致嵩身处战乱年代,本有教育救国之志,但随着时局动荡,他认为只有从军才能真正达到救国的目的。当他得知革命圣地广州正在开办军校招募学生,便毅然辞职,只身前往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1925年1月,高致嵩抵达广州,他在通过体检和考试后被录入黄埔军校,被编入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总队长王懋功)第1营(营长陈继承)第2连。根据校方规定,入伍期为半年,此后根据入伍生的表现再予合理分配。但随着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争开始,高致嵩在没有进入入伍生状态的情况下,就跟随野战部队参战了。

入伍生的任务是保障后方补给线的安全,这使高致嵩相对安全地经历了他的初战。1个月后,入伍生返校,高致嵩正式开始入伍生活。同年6月,杨希閔、刘震寰两部又联合发动叛乱,党军再次出征。在平定杨刘的战争中,高致嵩除了接受日常的入伍训练外,还需跟随部队在夜间担负广州地区的治安任务。7月1日,高致嵩结束了入伍生活,正式升入军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起初,高致嵩编在步兵第4队(队长伍树帆),9月6日军校第二期学生毕业后,第三期的队号重新调整,高致嵩所在的部队改称为步兵第1大队(大队长郭大荣)第2队(队长伍树帆)。

黄埔军校第三期的教授目的以速成为主,即要在为期半年的学习生活中掌握连、排级军官所应具备的能力。高致嵩高中毕业,这使他在大部分只接受过高小、小学教育,甚至是只读过私塾的同学中脱颖而出,他不仅能够迅速消化吸收术科教程,对政治教程也多有见解,这一度使他成为孙文主义学会和革命军人同志会的争取对象。对此,高致嵩全部予以拒绝。

1926年1月26日,高致嵩从黄埔军校学成毕业,被分配到第1师(师长钱大钧)第2团(团长金佛庄)担任少尉排长。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高致嵩随部参战,先后经历过铜鼓、南昌、龙游诸役。在

光荣的北伐之中,高致嵩经历了革命战争的洗礼,并因功升任中尉排长。

1927年5月,高致嵩接受老师长钱大钧的邀请,返回广州担任新编第1师(师长蔡熙盛)上尉连长。此后长期担负广州地区的守备任务。1928年2月,新1师改称第69师(师长蔡熙盛),他仍然担任上尉连长。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召开编遣会议裁减军队,第69师被裁撤,这使他成为了一名无职军官。为了继续完成从军救国的目标,他决定报考中央军校军官研究班。经过考试,他于12月被校方录取,1年后学成毕业。

1929年12月,高致嵩被派到驻扎无锡的第6师(师长赵观涛)第17旅(旅长樊崧甫)任少校参谋。3个月后,该旅所属第31团(团长何陞三)第1营营长何世澄因盗卖枪械事发被逮捕法办,营长遗缺调高致嵩接任。高致嵩就职后,大力整顿所部,并注重与驻地居民搞好关系。事为第31团的老团长、时任国民政府警卫师第2旅旅长俞济时得知后,对高大加赞赏,并在得知高是黄埔军校的学弟之后,萌生了调他到警卫师任职的想法。

1931年3月,警卫师扩编为国民政府警卫军,所属第2旅扩编为国民政府警卫第2师,师长俞济时新官上任,调高致嵩到师部担任中校参谋。国民政府的警卫部队,在人员和装备上堪称全国军队之最,在待遇上也要比一般部队要好。在这样一支部队中效力,是高致嵩梦寐以求的。但随着蒋介石的下野,警卫部队番号被撤销,嫡系中的嫡系身份也就随之消逝。

1932年1月,警卫第2师改称第88师(师长俞济时),高致嵩调任该师所属第262旅(旅长杨步飞)中校参谋。同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

重返政坛并当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起初命令第88师回师南京,承担卫戍首都的任务,但由于日军在上海增兵,给抗击日军的第19路军制造了新的压力。蒋介石于是命令第88师改开苏州,继而又命该师推进至南翔,做好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

2月19日,高致嵩随部进驻江湾至庙行一线的防御阵地,归左翼军指挥。次日,日军第9师团在得到进一步的增援后对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猛烈进攻。高致嵩辅佐旅长杨步飞指挥部队作战。战至22日,位于第262旅右翼的第264旅阵地被日军突破,为了将日军赶出阵地,第262旅奉命驰援,对已经占领部分阵地的日军实施反冲击。高致嵩以旅部参谋之职,主动要求参与反攻。他身先士卒,指挥士兵一鼓作气冲入日军阵





地,先后毙杀5名日军士兵,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但自己也不幸在肉搏中腿部负伤。高致嵩先是被送往野战医院治疗,医生发现伤及要害,主张将他送到汉口军医院继续治疗。但军医院技术有限,高致嵩的腿伤久治不愈,军方又将他转至杭州的仁爱医院,接受外国医生的治疗,4个多月后康复。

高致嵩返回部队时,第88师师长俞济时已前往位于宁波的浙江省保安处担任处长。根据蒋介石的意图,浙江省保安部队将要接受新的改编,使这些部队能够正规化,并承担起与野战部队相同的任务,为今后的对日作战做好准备。1933年5月,俞济时接受任务后即从第88师抽调了不少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充任浙江省保安团的各级骨干,以期顺利改编部队。高致嵩抽调之列,并因在淞沪抗战中的突出表现,被任命为浙江省保安补充第2团上校团长。

经过俞济时的大力整顿和改编,浙江省保安部队在接下来的1年中被扩编至4个分处、9个团,骨干也大都由黄埔学生所担任。在此期间,高致嵩又先后担任过浙江省保安补充第3团上校团长(1933年11月)和浙江省保安第5团上校团长(1934年3月)。1934年5月,俞济时将浙江省保安部队改编为2个纵队,保安第5团编归第1纵队(兼指挥官俞济时)第2支队(司令杜志成)。1935年6月26日,浙江省保安第1纵队撤销番号,浙江省保安部队也于此时缩编为4个团,第5团建制保留,但番号改称保安第3团,他仍然担任上校团长。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于8月14日在淞沪地区主动发起攻势,试图歼灭驻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以保障南京的安全。不料进攻当天,参战的第88师即遭到日军的负隅顽抗,进展缓慢,第264旅旅长黄梅兴不幸阵亡。代理旅长廖龄奇此后又组织过几次进攻,但都被日军打退。

为了增强上海的攻击力量,补充作战部队的损失,高致嵩奉命率领所部驰援上海。第88师师长孙元良命其将所属3个营分别补充第88师所属各部,高致嵩本人则临危受命,战地升任第264旅少将旅长,代理旅长廖龄奇则回任副旅长。高致嵩到职后,立即召集副旅长廖龄奇、第527团团长李杰、第528团团长朱赤了解战况。他认为,第264旅在前五天的激战中已经付出不少伤亡,自己虽然带了一个团补充该师缺额,但元气仍然难以恢复,在此情况下继续投入无谓的进攻,只能平白浪费所部官兵的生

命。于是他建议师长孙元良改攻为守,但第88师的任务就是要攻占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孙元良不敢违抗命令,硬着头皮要所属各部继续进攻。

8月25日,日军第3师团和第11师团由海路陆续抵达上海,中国军队不得不分兵御敌。27日,指挥第88师的第9集团军总司令部调整部署,命令第88师和独立第20旅占领北站至沙泾港一线阵地,继续对日本海军陆战队采取围攻的态势,但这两支部队已经无力完成攻占敌司令部的任务。而随着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成功,在淞沪地区作战的中国军队很可能会面临被日军迂回包抄,并进而全军覆没的可能。

淞沪会战打到10月26日,中国军队被迫开始全线退却,高致嵩接到了第88师师部传达的撤退命令。在死守四行仓库的友军第262旅第524团第1营(即由第524团中校团附谢晋元率领的“八百壮士”)的掩护下,第264旅顺利脱离了与日军的战斗,于11月20日抵达南京。

第264旅抵达南京后稍事休整,并接受了金陵师管区拨补的两个补充营补充缺额。同时,已经升任第72军军长的孙元良在增编军属补充旅时,调整了第88师的人事。其中第528团团团长朱赤调升第262旅旅长,遗缺由沈芝生接任。第264旅调整完成后被编入南京卫戍军序列,根据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的防御计划,第264旅的任务是担负雨花台和中华门的守备任务。其中第527团(配属2个炮兵连)进驻雨花台,高致嵩率第528团防守中华门,并作为第72军的预备队。

12月10日上午,日军第114师团(师团长末松茂治)野炮兵第120联队(联队长大塚升)对雨花台的中国守军阵地发起猛烈炮击,并于中午12时许,由第114师团第127旅团(旅团长秋山光三)的2个联队主力对雨花台发起凶猛进攻,守军第527团顽强反击,但在日军优势火力的压制下,部分阵地于下午15时许被日军突破。高致嵩为保阵地不失,立即从第528团抽调1个连前往增援战斗最为激烈的菊花台阵地。夜色降临后,高致嵩又向孙元良请命率第528团的2个营前往增援,并在获得批准后带领部队前往雨花台一线投入反击,成功将突入的日军击退,重新夺回阵地。深夜23时,日军第127旅团第66联队(联队长山田常太)再次发起进攻,并于11日中午12时在炮兵的火力支援下成功突入第264旅前沿阵地。由于兵力不敷使用,经过高致嵩的请求,孙元良又命第264旅副旅长廖龄奇率领第528团余部前往雨花台参战。高致嵩得到援兵后,即





命配属作战的2个炮兵连集中轰炸失守的阵地,并抽调2个连于下午14时投入反击。日军第66联队先头部队立足未稳,其防线很快被打乱,但在得到增援后随即展开反击,成功将进攻的第264旅击退。高致嵩见反攻失利,随即调整部署,并于下午16时亲率2个营再次展开反攻。经过半小时的激战,因所部伤亡过重,不得不撤回出发地。

考虑到雨花台是拱卫南京城南的重要防御阵地,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于11日夜23时重新调整部署,命令第88师其余部队也进驻雨花台增加兵力。孙元良接到命令即命第264旅全部集中到雨花台左翼的主阵地防守,其右翼阵地由朱赤率领的第262旅主力接防。当各部都进入指定位置后,高致嵩和朱赤商定利用夜色,集中两旅主力发起一次夜袭。这次反攻,虽然打乱了日军第66联队和第102联队的战线,并使日军一度陷入混乱,但却因为缺乏后援,而不得不在取得一些战果之后退回原阵地。就连时任日军第114师团127旅团66联队1大队3中队的小队长西泽弁吉都承认“面对2000名敌,在50米开外的手榴弹战是登陆以来最为激烈的战斗……本来战斗是以大队为单位,而在雨花台的攻击战中可以说是以师团为单位了……向世界夸耀指挥系统多么完善的日本军也陷入如此混乱的状态,可见战斗是多么激烈”。

12日凌晨4时许,日军在得到短暂的休整和补充之后,以野炮兵第120联队对雨花台再次发起猛烈的炮击。1个小时后,日军第66联队在第102联队的配合下发起猛烈进攻。此时的第264旅已经因11日夜的反攻而筋疲力尽,但高致嵩仍然率领所部顽强阻击。上午8时许,雨花台中部的碉堡阵地失守,中校参谋赵寒星阵亡,高致嵩不得不命令所部撤往最后的碉堡阵地拼死抵抗。但在坚持到11时许,右翼第262旅阵地尽数失守,使第264旅阵地失去依托,呈孤立态势。在这种情况下,高致嵩仍然尽其军人本分,继续坚持抵抗,他除了不断鼓励周围的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外,还嘱咐副旅长廖龄奇,如果自己战死,廖氏应立即接手指挥,带领残部突围而出,以保存第264旅的种子。

12日下午13时许,一颗子弹击中了正在指挥防御的高致嵩胸部,他终因伤势过重身亡,时年仅39岁。高致嵩阵亡后,第264旅残部由副旅长廖龄奇指挥向中华门撤退,此后又绕外城西撤,成功冲出了日军的包围。

高致嵩阵亡后晋级中将抚恤。

1986年2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高致嵩为革命烈士。2014年9月1日,高致嵩被列入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黄纪福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出生于广东省梅县城郊(现梅州市梅县区)的一户农民家庭。黄父早逝,黄纪福由母亲曾氏抚养长大。黄纪福因家境贫穷而无缘接受教育,但他自幼聪慧,自学成才。

1926年7月,黄纪福响应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号召应征入伍,成为第11师(师长陈济棠)第31团(团长余汉谋)的一名士兵。第11师当时驻防钦、廉地区,在围剿土匪徐闻山的战斗中,黄纪福机智勇敢,成功生擒土匪1名,他因此被所在部队的连长保送到第11师教导队学习。黄纪福十分珍惜这次机会,他不分昼夜苦学军事知识,得到队长的赞赏,毕业后被任命为少尉排长。

1928年1月,黄纪福随部开赴五华阻击张发奎的第4军,他身先士卒,屡次率领所部取得捷报,被提拔为中尉排长。1年后,部队缩编为广东编遣区第1师第1旅(旅长余汉谋),他仍任排长。1929年5月,黄纪福又随部队在白泥与黄绍竑的第15军作战。同年9月,第1旅扩编为第59师(师长余汉谋),黄纪福升任该师所属第118旅(旅长叶肇)第236团(团长骆凤翔)上尉连长。1930年,黄纪福被调升为虎门守备营少校营长。1931年6月,陈济棠将第8路军改编为第1集团军。黄纪福营在改编中被编为第1教导团第2营,他仍任少校营长。3个月所部又改编为第1教导师(师长缪培南)第1团第2营,他升任中校营长。

1936年6月,陈济棠联合广西的李宗仁发动“两广事变”。黄纪福与此时被调升到第13师(师长谭延)担任第38团上校团长。但未及2个月,陈济棠便兵败下野,第13师也随之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改编。在这次改编中,黄纪福团改称第159师(师长谭延)第475旅(旅长罗策群)第949团,他仍任上校团长。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为能投入到抗日战争中,黄纪福和大部分粤籍军官纷纷呈递参战请愿书。8月,第159师奉命开赴上海参战,黄纪福在部队出发前召集所部官兵训话,强调保卫家园抵御外辱的责任感。

9月17日,黄纪福所部经过火车、轮船等长途运输后抵达上海,随即投入到刘行的战斗中。面对日军占据优势的火力压制,黄纪福不惧危险,





亲率所部与日军展开激烈的肉搏。经过9昼夜激战,第949团因伤亡较大而奉命撤往嘉定休整。一个半月后,上海守军奉命撤出战斗,为保障第3战区主力顺利撤退,黄纪福又奉命指挥第949团进入设立于吴福线的国防工事断后。完成任务后,于11月26日奉命率部撤往南京。此时,第159师人事有重大变动,第475旅旅长罗策群升任副师长,黄纪福也被调到第477旅(旅长陈骥)担任上校副旅长。

12月4日,黄纪福随部抵达南京,随后根据第159师师部的命令接过了汤水镇的守备任务。7日下午13时,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以两个联队的兵力发起猛攻。第477旅经过淞沪一战已经大伤元气,在撤抵南京后虽然得到了第66军教导旅残部的补充,但仍然没能恢复战力。在日军一波又一波的进攻下,第477旅的防御能力已到极限。尽管如此,黄纪福仍然与旅长陈骥一起到一线参与作战,并不断鼓舞士气。如此坚持了两昼夜,终于得到了撤出战斗的命令。黄纪福随部先后在大水关、明故宫休整。到12月11日,第159师根据第66军的命令将所部整编为一个战斗旅,由第475旅旅长林伟俦指挥。在这次整编中,第949团作为战斗团被保留建制,为使该团团结一致并承担接下来更加艰巨的战斗任务,在罗策群的建议下,第66军军部同意让黄纪福和新任团长谢彩轩互换职务。就这样,黄纪福在离开第949团半个月后,又回到该团继续担任团长一职。

12月12日上午,黄纪福奉命率部驰援在中华门作战的友军,但到下午17时许,第159师接到了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下达的突围命令。第66军军长叶肇和第83军军长邓龙光协商之后,两军决定于晚上21时在叶肇的统一指挥下开始突围。突围顺序为第160师、第159师、第154师,其中第159师的突围攻击部队为第949团。黄纪福接到命令,急忙带着部队前往太平门集结。晚上21时许,黄纪福率领部队继第160师之后出城。他们在潜行中接连绕过日军多处防线,但在13日凌晨0时左右进至尧化门、仙鹤门时,被日军第30旅团第38联队(联队长助川静三)发现,日军随即组织起密集的火力来封锁第159师的突围道路。指挥部队的副师长罗策群严命第949团立即冲破封锁,但该团连攻数次都没能成功,中校团附罗丕振、第2营营长邓雄英、特务连连长谢瑞华都在冲锋时阵亡。黄纪福知道部队如果再不突破阻击,等到日军其他部队赶来围攻时必将全军覆没。情急之下他与少校团附文坚各率一支敢死队又一次向日军阵

地发起突击,但不幸先后倒在了日军的机枪火力下,时年 35 岁。

黄纪福阵亡后被晋级少将抚恤。

2015 年 8 月 24 日,黄纪福被列入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雷 震 字汝勤,清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1903 年 12 月 7 日)出生于四川省蒲江县县城的一户普通家庭。雷父德森以开杂货店为生,母王氏。雷震的父亲希望他能够继承家业,平安地过普通日子。但雷震从小就立志从军,以振兴国家武力,不受外国欺凌为志向。他向往广东的革命政权,遂于 1924 年 5 月启程前往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雷震抵达广州时,黄埔军校第一期已经招生完毕。雷震为了能够考入军校,决定留在广州,以做学徒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费用。1924 年 8 月,他终于如愿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

雷震被编在炮兵队(队长蔡忠笏)第 1 区队(区队长周鹏飞)接受炮兵军官的速成教育。经过 1 年的苦读,雷震于 1925 年 9 月毕业。值得一提的是,在同区队的同学中,有鲁宗敬、王忠辅、冯尔骏、蔡劭等人在毕业后逐步进阶为将军。雷震被留校服务,由于他在军校学习期间参加过政治活动,而被校方分配到军械处(处长邓士章)担任中尉党代表。雷震对于没能被派到野战部队任职而感到遗憾,但是作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对于党代表一职,他仍然认真履职。1926 年 10 月,他被调升军械处第 3 分库上尉库长。

1927 年 10 月,雷震奉调第 1 军(军长刘峙)教导团(团长李仙洲)少校团附兼第 1 营营长,并于 11 月 28 日当选教导团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1928 年 2 月,他被调升第 1 军参谋处(处长彭启彪)第 3 科中校科长,此后随部参加北伐,曾在山东与张宗昌的部队作战。同年 7 月,第 1 军军部缩编为第 1 师(师长刘峙),雷震降任该师参谋处少校参谋。在此期间,他对辎重兵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遂于 1929 年 6 月考入中央军校辎重研究班深造。1930 年 5 月,雷震学成毕业,由于他以前学的是炮兵专业,于是被分配到炮兵第 1 团(团长姚永安)担任少校军需。1932 年 4 月,炮 1 团改称独立炮兵第 1 团(团长李汝炯),他仍任少校军需一职。同年 12 月又被调升为炮兵第 1 旅(旅长史文桂)中校军需。1934 年 2 月,雷震在老师长刘峙的推荐下被调升为中央军校驻豫军官教育团(兼团长刘峙)军





官总队(总队长金衍武)第1队上校队长。

为使自己能够不断得到新的历练,雷震又申请转调步兵部队服务。为了达成这个心愿,他宁愿自降一级,于1934年7月前往第78师(代师长文朝籍)第465团(团长邓经儒)担任中校团附。第78师曾参加“闽变”,后被中央军收编,雷震到职后积极参与改造。他的表现被继任第78师师长的桂永清所注意。

桂永清是被临时调到该师兼代师长的,他发现雷震是一名全才军官,他对军需、军械都十分了解,对步兵的训练又很有成绩,便决定调他去教导总队继续历练。1935年9月,第78师裁撤,所部分别调拨他部改编,雷震于此时被调到教导总队担任第2团(团长胡启儒)第1营中校营长。教导总队此时正在接受德国军事顾问的训练,雷震积极配合,并不断督训所部官兵,使他们能在今后有可能爆发的中日战争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在总队长桂永清的不断请战之下,雷震所在的第2团于8月21日率先进入上海参战。1天后,雷震奉命率领所部与第2营驰援吴淞,他亲带一个连为先头部队,在抵达目的地后对正在进攻友军的日军第3师团一部发动侧袭,在与第2营密切配合之下,成功将日军击退。此后雷震率部转战张华浜,他在那里面对日军炮兵的猛烈炮击和步兵的不断进攻,沉着冷静地在一线指挥作战,直到11月5日奉命撤守南京。

当雷震返回南京时,教导总队已经根据军政部的命令由3个团扩编为3个旅。在这次变动中,不少军官得到提拔任用,雷震也被提升为新成立的第3旅(旅长马威龙)上校副旅长。

教导总队虽然新兵较多,但仍被留在南京担负保卫首都的重任。根据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的部署,教导总队主守紫金山,其中第1旅守工兵学校至中山门一线,第2旅守陵园新村至老虎洞南侧一线,雷震所在的第3旅主守紫金山第二峰至老虎洞一线。为了指挥方便,第2旅第4团和第3旅第6团临时调换建制。

雷震接受任务,便与旅长马威龙同赴紫金山视察阵地。经过商议,他们决定由睢友兰的第4团担负主阵地紫金山各峰的守备任务,邓文儒的第5团负责老虎洞、岔路口的守备任务,并策应第4团。

12月10日上午,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第30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第33联队(联队长野田谦吾)对第5团据守的老虎洞

阵地发起进攻。第5团在日军炮兵火力的压制下伤亡惨重,不得不于上午10时30分放弃老虎洞,向紫金山的第4团靠拢。日军第33联队尾随追击,并在第9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第6旅团(旅团长秋山义允)第35联队(联队长富士井末吉)第3大队的增援下,继续对紫金山发起猛攻。第3旅官兵依靠紫金山上构筑的大量钢筋混凝土碉堡群,以密集的火网封锁进攻的日军步兵,马威龙还与雷震商定,由马在第5团督战,雷在第4团督战,绝对不能再让日军有所进展。经过整整一天的激战,终于将日军击退,并击毙第35联队第3大队第9中队中队长野田耕一。

11日拂晓,日军第33联队以一个中队的兵力对第二峰发起突袭,但被守军及时发现,他们依靠山崖断壁将日军压制在下面。受阻的日军随即请求炮兵增援,猛烈的炮火立即将第4团阵地覆盖。日军第35联队第3大队随即发起夹击,但遭到第5团的有效阻击。此时战况十分激烈,日军几次突破守军阵地,但又被守军发起的反击夺回。

至12日,两军依然在紫金山上鏖战。此时雷震身上已经有2处负伤,但他仍坚持在一线督战。10时许,日军第35联队第3大队再次向第4团阵地发起冲锋,雷震与团长睢友兰各守一处顽强抵抗,在将日军大队长菅原梅吉击毙后,又一次成功将日军击退。然而守军的伤亡也十分惨重,其中第4团第1营营长傅守兴、第5团中校团附王碧若、少校团附刘国统、第1营营长郑惠然先后阵亡。

就在此时,日军另一路第16师团第19旅团(旅团长草场辰巳)第20联队(联队长大野宣明)从西山方向发起进攻,使第3旅遭到两面夹击。旅长马威龙被迫命令所属各部全部撤守紫金山主峰,他亲率第5团固守高峰,由雷震指挥第4团防守天文台和天堡城。

12日上午11时,投入作战的日军各部开始了最猛烈的一次进攻。在炮兵的不断轰炸下,守军阵地被大部摧毁。第4团团长睢友兰在天堡城与日军第33联队激战,终因大部阵亡,而被迫退往天文台与雷震汇合。雷震知道天文台再丢失,紫金山必定不保,而紫金山一丢,日军将攻至南京城下。他站在阵地前大声呼喊鼓励着所属官兵要保卫首都,保卫民众战至最后一刻。

下午15时许,日军第33联队在稍事休整之后再次发起进攻,雷震则督率第4团残部死守阵地。第3营阵地的压力最大,营长罗毓峰在反击时中弹身亡。雷震不顾身份,主动前往该营继续指挥作战,在日军一波又





一波的进攻下,雷震在与突入阵地的日军肉搏时力战身亡,时年 34 岁。雷震阵亡后,睢友兰接过指挥权继续阻击,第 5 团也依然据守在 448 高地上,直到 13 日凌晨才由旅长马威龙下达了分散突围的命令。部分没有接到突围命令的士兵继续坚守阵地,致使日军直到上午 10 时才完全占领紫金山各处。

雷震阵亡后被晋级少将抚恤。

2015 年 8 月 24 日,雷震被列入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易安华 原名易福如,字镜海,清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五日(1903 年 5 月 31 日)出生于江西省宜春县遯市乡泽溪村(现宜春市袁州区遯市乡泽溪村)的一户中医家庭。易父静山,母余氏。由于父亲长期在外行医,易安华从小被寄养在外祖父家中,他“少聪颖,卓犖不凡”,被外祖父赞为“非池中物”。易安华初入私塾,即表现出惊人的悟性,深得先生的赞赏。此后他又陆续就读于县立高等小学、省立第八中学。

1919 年五四运动发生时,易安华在爱国主义精神的影响下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宣传反帝爱国思想。由于“思想激进”,易安华被校方开除,不得不返乡务农。在此期间,他博览史书,向往着建立班超、马援那样的不朽功勋。由于江西属于孙传芳的地盘,易安华不愿意参加军阀部队,便于 1924 年 11 月收拾行囊,只身前往当时的革命圣地——广州。1925 年 1 月,易安华如愿考入黄埔军校,他被编在入伍生总队(总队长王懋功)第 1 营(营长陈继承)第 1 连,接受为期半年的入伍生训练。在此期间,他随部队参加了东征。同年 7 月 1 日,易安华升入军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被编在步兵第 3 队(队长翟瑾)。9 月 6 日,军校第二期学生毕业后,第 3 队调整队号,改称步兵第 1 大队(大队长郭大荣)第 1 队(代理队长丁晓)。经过为期半年的军官速成教育,易安华于 1926 年 1 月学成毕业,他被分配到正在筹备的军校宪兵教练所担任第 2 队少尉队附。宪兵教练所是国民政府为了培养专职宪兵而成立的速成教育机构,于 1926 年 2 月 1 日正式成立,所长由广州卫戍司令部宪兵营营长杭毅兼任,众多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二期的学长担任骨干。如易安华的一期学长钟彬任党代表,一期学长刘嘉树任第 1 队队长,二期学长贺崇梯任第 2 队队长,二期学长赖汝雄任第 3 队队长。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所长杭毅及各队



长,对于士兵学术科之训练,以及风纪军纪之整顿,特别认真;而队党代表钟彬之于政治训练,尤为热心。故该所改组未及两月,成绩斐然”。

1926年8月,宪兵教练所第一期学兵毕业,本打算续招第二期,但校方为了适应北伐需要,根据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要求,决定将军校宪兵营与教练所并编为军校宪兵团(团长杭毅),易安华被提拔为第2营(营长贺崇悌)中尉排长。

1927年3月,易安华随部开赴南京。2个月后调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补充第3团(团长李园)上尉连长。1928年1月,易安华考入国民革命军军官团步兵科学习。经过为期1年的学习后,1929年1月他被任命为新组建的中央军校陆军教导队(队长冯轶裴)步兵队(队长白兆琮)上尉连长。同年12月,步兵队扩编为教导团(团长冯轶裴)步兵营(营长白兆琮),他仍然担任上尉连长。1930年4月,军校教导团被扩编为教导第1师,原团长冯轶裴升任师长,易安华升任第1团(团长白兆琮)第3营少校营长。11月27日,教导第1师奉命改编为国民政府警卫师(师长冯轶裴)第1旅(旅长伍诚仁),易安华改任该旅第1团(团长张世希)第3营少校营长。1931年3月,警卫师扩编为国民政府警卫军,其中第1旅扩编为警卫第1师,师长由军长冯轶裴兼任。在这次扩编中,易安华升任第2旅(旅长杨步飞)第4团(团长张本清)中校团附。

1931年12月,蒋介石辞职下野,国民政府警卫军的番号也随之撤销。1932年1月11日,警卫第1师改编为第87师(兼师长张治中),易安华改任第261旅(旅长宋希濂)第522团(团长沈发藻)中校团附。该师的任务,仍然是卫戍首都,但随着“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爆发,易安华奉命随部于2月初驰援上海的十九路军。

在第5军军长张治中的指挥下,第522团于2月19日被部署在蕴藻浜至张华浜一线担负守备任务。22日,第261旅奉命驰援庙行,易安华随部作为左翼,先占领陆家桥,随后向占领南孙宅、顾家桥宅的日军发起进攻。易安华在作战中身先士卒,率部猛冲,成功将日军击退。

2月25日,日军第9师团一部对第522团阵地发起进攻,在日军的猛烈炮火下,该团阵地大部被毁,但易安华等第522团官兵仍然沉着应战死守不退,经过近2个小时的激战后终于等到了友军第78师的增援,此后两部联合发起反击,将日军击退。

3月1日上午,日军第11师团一部进攻浏河防线,守军教导总队仅



有1个营及部分义勇军,形势万分危急。第522团于11时奉命增援浏河,易安华接到任务后即随部急进,在与日军遭遇后立即投入肉搏,他“奋不顾身、杀敌致果,声威卓著”,战至下午18时许,终将日军击退取得捷报。3天后,中日两国停战。5月,停战协定签订,淞沪抗战随之结束。此时,易安华因患足疾请假返乡休养。

1933年9月,易安华足疾痊愈返回部队,回到第87师(师长王敬久)第261旅(旅长刘安祺)第522团代理该团上校团长(1934年4月17日正式任命为团长)。

1935年5月18日,易安华任陆军步兵中校。7月,第87师被列为“调整师”,开始接受德国顾问的军事训练,并逐步更换进口武器。对此,易安华不仅以身作则虚心接受德国顾问的教导,还不断激励所部官兵要虚心学习奋发图强,为今后即将爆发的中日战争做好准备。年底返乡探亲时,他还曾对家乡父老说:“强邻狡焉思逞,行将发生战事,吾辈军人当负救国之责,此后吾辈与诸父老会晤良艰”。可见易安华此时已经做好了为国牺牲与敌拼死的决心。

1936年9月30日,易安华晋任陆军步兵上校。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易安华终于等来了与日军再次交锋的机会,他对同事说:“吾等报国之期已至,送眷返里”。对妻子说:“汝准备领吾抚恤金,为事蓄费”,妻子闻言哭泣,易安华不得不又安慰说“吾言戏耳”。但是他的内心却知道,在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中,牺牲是不可避免的,自己的命运究竟会怎样,无法预测。

华北战事正酣之际,易安华所在的第87师则奉命由江阴、常熟秘密调往上海。根据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的计划,第87师与第36师、第88师、独立第20旅等部应于8月13日对日军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发起突然进攻,并一举将其歼灭。但因种种原因,这次进攻延至14日才开始,而此时日军海军陆战队已有察觉,使进攻部队失去了先机。

8月14日上午9时许,易安华指挥的第522团作为先头部队,沿着其美路经陈家行、张家宅、陈家港向前推进,很快就将日军位于虹口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包围起来。但是日军凭借着已经构筑好的工事,以及占据优势的火力,使第522团的每次进攻的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8月16日夜,根据第261旅旅长刘安祺的计划,第521团和第522团各组织突击队,分别对大公纱场和其美路的日军据点发起夜袭。突击队凭借着夜色

的掩护按时发起进攻,其中第522团成功在其美路上取得突破,但因为突击队进攻分散,没能突破日军的主阵地。当易安华发现问题所在时,日军已经调整了部署,集中于一点顽强抵抗,使得这次夜袭功败垂成。3天后,第522团转调到杨树浦作战。

8月19日,第522团成功在塘山路、公平路路口找到日军防御的薄弱点,并取得突破。这一捷报使参与攻势作战的友军各部都极其振奋,张治中进而要求战车部队参战,以求在突破口取得更大的战果。但是由于步兵缺乏坦步协同的意识,导致日军先是将参与进攻的战车逐一消灭,随后填补空缺堵住了缺口。此后,易安华又奉命在汇山路方向寻找突破口,但却没能取得突破,战况逐渐转入相持阶段。

就在第9集团军各部继续寻找突破口的时候,日军第3师团和第11师团于23日分别在吴淞和川沙登陆,并突破了上海市保安总团和第56师的防线,中国军队也开始陆续抽调部队驰援上海,淞沪战事的规模越来越大。同一天,易安华奉命率部向宝山、刘行、罗店方向推进,准备阻击日军。9月12日起,中国军队全线转入守势。此后易安华指挥所部在江湾、庙行阻击日军。

10月15日,已经升任第71军军长的王敬久辞去师长兼职,第87师师长由副师长兼第259旅旅长沈发藻升任。与此同时,第87师各级军官也都有所升迁,其中易安华升任第259旅少将旅长(辖刘漫天第517团、彭龙骧第518团)。11月9日,易安华奉命率部撤出上海,开赴镇江整补。不久又接到卫戍南京的任务,马不停蹄地赶赴南京。

12月7日,易安华率领的第259旅先头部队进抵高桥门,随即根据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的命令接替友军第51师位于河定桥、上坊门、高桥门一线的守备任务。不料就在9日凌晨第259旅刚刚进入阵地时,日军第9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第18旅团(旅团长井出宣时)第36联队(联队长胁坂次郎)第3大队即乘第259旅立足未稳之际发起进攻,并迅速突破防线。易安华虽然重新组织反击封闭缺口,但突入的日军继续向南京城推进,于凌晨4时许攻至光华门下。守城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部虽然将城门紧急关闭,但耐不住日军工兵的数次爆破及炮兵的猛烈轰炸,于10日下午16时30分被日军第36联队第1大队攻占城门洞。

为了夺回光华门及城外几处据点,第87师师长沈发藻命令所属第259旅和第261旅在城外联合发起反攻。易安华受领任务,即与第261旅





旅长陈颐鼎商定,由易安华亲率第260旅519团在通济门方向发起进攻,由陈颐鼎率领第522团2个营由清凉巷、天堂村出击配合第259旅夹击光华门外的日军。遗憾的是,经过激战,出击部队仅将大校场据点收复,对于光华门下以及城外通光营房的日军未能歼灭。此外,临时受易安华指挥的第519团团长谢家珣以及配合进攻的第261旅中校参谋倪国鼎先后阵亡。战至11日上午11时许,友军第51师守备的中华门遭到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第11旅团(旅团长坂井德太郎)第13联队(联队长冈本保之)的猛烈进攻,易安华又奉命撤离光华门转而增援中华门。经过半天的激战,第259旅在第88师的支援下成功击退日军,并击毙担负主攻任务的日军第13联队第2大队的2名中队长。

12月12日拂晓,日军第6师团集中3个联队的主力猛攻中华门及以西的城墙,易安华则率部在城外的既设阵地中顽强阻击。不料在下午13时许,友军第88师守备的主阵地雨花台防线被日军第114师团(师团长末松茂治)第127旅团(旅团长秋山光三)突破,所属第66联队(联队长山田常太)继在炮兵的火力支援下朝着中华门方向发起猛攻。在此情况下,易安华仍然率部勉力支撑。激战中,他的头部、左肩先后受伤,但他只是用绷带简单包裹后继续督战。不久右臂又中弹受伤,部下劝他退上城头指挥,但易安华拒绝道:“吾与城共存亡,与士卒同生死,绝不能偷生,以负国而负委座”,说完后又不顾一切地继续投入到战斗中。这时,他的腰部不幸再中一弹,因伤重昏倒在地。

易安华的卫士见状,急忙将他扛起欲送进中华门内抢救。但因战况激烈,守城的第51师不敢擅自打开城门,激战中又无法用绳索吊上城头,卫士无奈之下只得向通济门方向转移。在城内的师长沈发藻得知易安华受伤昏迷后也急忙派人出城寻找,并悬重赏法币2000元营救。遗憾的是通济门方向因城外溃兵拥挤,十分混乱,易安华在卫士试图送他进城时,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时年35岁(注:根据第261旅旅长陈颐鼎回忆,易安华于12月11日在光华门阵亡。此说留待进一步核实)。

1983年8月1日,江西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2014年9月1日,他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朱 赤 字幼卿,号亲民,清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二日(1903年3月10

日)出生于江西省修水县上衫乡下衫村的一户书香门第。朱父良才,清末秀才,母吴氏。朱赤幼入私塾,继入朱溪镇仁义小学就读。他“勤奋读书好学不倦”,毕业后前往东港镇自办私塾教书育人,希望以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农村孩子有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

民国的成立并没有使中国得到真正的统一,且在欧美日等国的欺凌下,国力日弱。朱赤逐渐产生了投笔从戎的想法。1924年年底,位于广州黄埔岛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开始向社会招考第三期学生,朱赤认为时机已到,便关闭私塾只身徒步前往广州,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1925年1月,朱赤在通过考试后被编到入伍生总队(总队长王懋功)第1营(营长陈继承)第1连,接受为期半年的入伍生训练。在此期间,他参加了东征。7月1日,朱赤正式升入军校第三期习步兵科,他被编在步兵第3队(队长翟瑾)。9月6日,军校第二期学生毕业后,第3队调整队号,改称步兵第1大队(大队长郭大荣)第1队(代理队长丁琥)。

朱赤在读期间刻苦训练、努力学习,由于他沉默寡言、行为端正,办事又老练沉稳,得到不少教官的赏识。1926年1月学成毕业后,朱赤被分配到军校所属的卫兵队(卫兵长胡公冕)担任见习官。3月9日,卫兵队扩编为特务营(营长王世和),朱赤担任少尉排长,承担起保护军校的任务。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并组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金佛庄),朱赤所在的军校特务营被编为该团第1营(营长王世和),他仍然担任少尉排长,并随部参加北伐。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蒋介石提议,首都应成立一支可靠的警备师。在此情况下,朱赤所在的警卫团第1营被编为首都警备师(师长姚琮)特务营(营长童葆暉),他升任中尉排长。同年8月13日,蒋介石在何应钦、李宗仁等人的压力下被迫辞职下野,首都警备师也随即撤销。但是,朱赤所在的特务营却没有解散,而是在警备师第1团团团长王世和的指挥下随蒋介石一同前往奉化,依然担负着保卫蒋氏的责任。

1928年1月,蒋介石复出,并重新掌握南京国民政府所属军队的领导权。同年8月9日,国民政府成立警卫团(团长杜从戎)时特务营编入,朱赤调升为该团第2营第6连上尉连长。1929年4月,警卫团改编为国民政府警卫旅(旅长俞济时)第1团(团长郑坡),朱赤仍任第2营第6连上尉连长。

1930年1月,警卫旅扩编为警卫司令部(司令俞济时),朱赤因部队





改编调任警卫第2旅(旅长蒋伏生)第4团(团长何凌霄)第2营上尉营附。11月27日,警卫司令部与教导第1师所属3个步兵团并编为国民政府警卫师(师长冯轶裴),朱赤仍任第2旅第4团(团长冯圣法)第2营上尉营附。4个月后,警卫师又扩编为警卫军,朱赤所在的部队改称警卫第2师(师长俞济时)第4旅(旅长蒋伏生)第8团(团长黄梅兴)第2营,他升任该营少校营长,1932年1月,警卫军因蒋介石再次下野而被撤销建制,朱赤担负着保卫蒋氏安全的任务长达5年之久。1932年1月11日,警卫第2师改称第88师(师长俞济时),朱赤指挥的营则改称该师所属第264旅(旅长钱伦体)第528团(团长黄梅兴)第2营,他继续担任少校营长。17天后淞沪抗战爆发。

朱赤所在的第88师于2月7日由苏州开赴南翔,作为淞沪战场上的预备队。20日进入上海后,第528团担负庙行至江湾一线的守备任务。22日拂晓,日军第11师团24旅团一部猛攻庙行东侧的第527团麦家宅阵地,守军工事大部被毁,防线不稳。朱赤奉命率部驰援,一举将日军击退。此后至3月4日中日停战,朱赤始终在庙行地区阻击日军,不退一步。

1932年5月5日,中日两国正式签订停战协定。朱赤所部解除作战任务。1934年1月,朱赤被提拔为第528团(团长胡世贤)中校团附。10月15日,朱赤代理第528团的团长。

1935年10月,第88师被选入第二期“调整师”,开始接受德国军事顾问的训练和改编。朱赤深知对日决战已为时不远,他认真学习德国军事顾问教授的知识,并不断宣传抗日爱国思想。1936年1月27日,朱赤正式担任第528团上校团长。1936年5月18日,朱赤任官陆军步兵中校。1937年5月6日,晋任陆军步兵上校。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8月11日,朱赤随部进驻无锡,准备投入到上海的攻势作战中。根据作战计划,朱赤所部是中国军队进攻位于虹口区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主攻部队。8月16日,朱赤率领的第528团对日本海军俱乐部旁边的开林油漆公司据点发起猛烈进攻。为了攻下这个据点,朱赤亲往一线督战,经过3小时激战,击毙日军上海特别陆战队第1大队第2中队中队长贵志金吾,成功攻占该处阵地。此后,朱赤率部在浏河沿线阻击日军逾2个月,直到11月8日才奉命撤离上海退往南京整补,并入列首都卫戍部队。

11月20日,第88师副师长冯圣法外调升任第58师师长,副师长的空缺由第262旅旅长彭巩英升任,而彭氏所空出的少将旅长缺,由朱赤升任(辖谭本良第523团、韩宪元第524团)。

根据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的防御部署,朱赤的第262旅担负中华门至光华门一线的城防守备任务。12月8日,光华门的守备任务改由第51师承担,第262旅即专守中华门至光华门(不含光华门)一线的城墙线。9日,日军各师团的先头部队皆已近抵南京城外并发起进攻。光华门告急,朱赤奉命抽调所部一营前往增援。

10日上午开始,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第11旅团(旅团长坂井德太郎)第13联队(联队长冈本保之)即对中华门发起猛烈进攻,朱赤督率所部坚守城头,数次击退日军的进攻。11日上午,日军第13联队再次发起进攻,部分城墙被炮火轰塌,日军一部从坍塌的城墙上突入城内,朱赤急忙抽调部队予以包围堵击,并在友军第87师259旅一部的增援下,又一次成功击退日军。在这次战斗中,1名排长不幸负伤,朱赤为争取抢救时间,主动将自己的指挥车让出来,并取出自己的钱款嘱咐卫士随车至医院使用治疗,此事受到师部的通令褒奖。

11日晚上23时,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重新调整城防部署,朱赤的第262旅奉命将城防移交给友军第51师,随后出城增援在雨花台与日军激战2天的第264旅。根据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的部署,雨花台左翼主阵地由第264旅继续承担,右翼阵地交由第262旅第524团和第72军补充旅第2团承担,这2团由朱赤统一指挥,第262旅第523团则由孙元良直接控制,仍暂留中华门以东城墙上作预备队使用。朱赤率领所部进入阵地后,曾于当天深夜和第264旅协同发起反攻,但因日军防守严密,不得不退回阵地采取守势。

12月12日凌晨4时许,日军第114师团(师团长末松茂治)集中所部炮兵集中轰炸雨花台守军阵地,随后于5时许集中第114师团第127旅团(旅团长秋山光三)2个联队的主力再次发起猛攻。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朱赤沉着冷静地在第一线指挥作战。当双方陷入肉搏战时,朱赤又亲率敢死队发起反击,士兵见旅长带头,也都勇气倍增,纷纷以命相搏,终将日军击退,稳定了阵地。朱赤率部连战3个多小时,伤亡十分惨重,为表明死守之志,他命旅特务排将周围的几十箱手榴弹盖子全部揭开,用绳子串上导火线,放在阵地之前,准备做最后一搏。





12日上午9时左右,第524团阵地被日军第127旅团第66联队(联队长山田常太)突破,第2营营长黄琪、第3营营长符仪廷先后阵亡,团长韩宪元也在之后率部反击时阵亡。朱赤得知后急命所部组织敢死队,对侵占阵地的日军实施反冲锋,暂时稳定了阵地。但日军第102联队稍事休整后又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攻势,朱赤于率部反击时身中数弹,但他仍然勉力支撑,并大呼着“不要管我”继续指挥战斗。延至11时许,朱赤终因伤势过重而亡,时年35岁。

朱赤阵亡后,日军再次突入阵地,第524团此时已无力抵御,少校团附胡替华、第1营营长黎仁阵亡,补充旅第2团第1营营长李强华、第2营营长苏天俊、第3营营长王鸿烈皆力战身死,守军残部被迫向第264旅靠拢,雨花台左翼阵地随即陆续丢失。根据曾任第262旅联络副官朱国为的回忆,第262旅在合肥收容时,全旅仅剩80人。由此可见,在朱赤指挥下,第262旅坚持到了最后时刻,全旅几乎尽没。

1987年11月,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朱赤为革命烈士。2014年9月1日,朱赤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华品章 字希平,清光绪三十年八月初七日(1904年9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西昌县西乡玉窝州村(现属西昌市西乡乡)的一户农民家庭。华品章出生前2个月,父亲华宗清就因修建宗祠受伤而亡。待至出生后,叔父华云章为占家产,密谋扼杀华品章。华母急将华品章送至亲戚家抚养得免于难,直到8岁才被接回继承家业。

由于父亲早逝,华家都靠祖母和母亲勤耕苦织来维持。华品章知道两位老人的苦楚,在入私塾时就勤学苦读,并先后在官立马平坝小学堂和宁远联立中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918年冬,华品章返回家乡,他本打算以孝道侍奉二老终身,却因遭到乡邻匪霸的欺凌而决心改变命运,于1924年投入刘文辉的四川陆军第9师军士教导队,当起了学兵。随着广东革命声势的日益壮大,华品章决定前往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他希望能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使自己的家庭命运得到改变。

1926年3月,华品章通过当时已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黄埔军校的考试,被编到入伍生第2团(团长陈复)炮兵连接受入伍生训练。半

年后正式升入军校第五期炮兵科,接受军官速成教育。在此期间,华品章一边学习军事科目,一边跟随校军参加北伐,这使他能将理论和实战结合起来,受益颇深。

1927年8月,华品章学成毕业。此时刘文辉的部队已经响应国民革命并被改编为第24军,校方考虑到华品章与刘文辉部的历史,便派他前往第24军服务。对于华品章等川籍黄埔毕业生的到来,刘文辉表示欢迎,但他并不信任这些外来户,只是分配他们担任一些虚职。比如华品章,他在第24军历任中尉宣传员、上尉政训员、少校参谋等职,始终与带兵打仗无缘。许多黄埔川籍生因此纷纷离部前往南京,希望能够谋求一个实缺。华品章对此却能泰然处之,他知道第24军是中国西南边陲的一支重要国防力量,且担负着西康警备和监视西藏的使命。华品章因此仔细调查康藏边界的地形,深入了解两地居民的民俗风情,并将这些调查结果写成专文呈交蒙藏委员会文官处。

1931年3月,华品章被从边陲调回南京,他的新职务是国民政府警卫第2师(师长俞济时)少校军械官,负责全师武器装备的调拨和保养工作。1932年1月警2师改编为第88师(师长俞济时),他仍任少校军械官。同月淞沪抗战爆发时,第88师奉命参战,但华品章却因职责所在而被留在南京,但他时刻关心前方战况,以不能上阵杀敌保家卫国而引为憾事。

1934年1月,华品章被继任第88师师长的孙元良调任师部少校服务员。同年10月又调升为炮兵营中校营长。炮兵营长是华品章步入戎马生涯以来的第一个部队长实职,他对此极为兴奋,日夜操练所部,甚至还与士兵打成一片,同他们一起投入到对所部装备的山炮保养工作中。

1935年11月,华品章得师长孙元良的保荐,外调到第85师担任第507团上校团长。第85师源自黔军,因内乱不断,前任代理师长刘竹铭被逮捕法办。军政部勒令重新整编,并抽调大量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前往该师任职。第85师当时驻防四川万县,辖3个团,新任师长是黄埔一期生陈铁,第510团团团长糜藕池和第505团团团长谷熹也分别是黄埔三期和四期生,华品章能以五期生的资历当上团长,这在同时期的众多团长中,是极其罕见的。经过陈铁等一众黄埔生的努力,第85师的官兵素质不仅在接下来的半年里得到质的飞跃,战斗力也得到大幅度提升。

华品章因对所部纪律严明,坚持做到“不拉夫、不扰民、不派粮派款、





不损害庄稼、珍惜武器弹药、注意士兵伙食生活”而深得所部官兵的尊敬和拥护。多年的军中历练也使华品章自己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当他返乡探亲时,族中长辈惊奇地说,“想不到品章这小子性格的变化有这样大啊!想当年他住小学中学时,一副十足的书生模样,态度腼腆,温文尔雅,说话小声小气,像个大闺女,而今在战场上却叱咤风云,勇冠三军,前后对比,真是判若两人”。

1936年6月,第85师奉调南京浦口,并根据军政部的命令扩编为两旅四团制,华品章升任第255旅(旅长刘震清)上校副旅长。1937年3月,华品章随部移驻蚌埠。此时,第85师入列军政部调整师第三期计划,开始接受德国军事顾问的训练。遗憾的是,由于抗战在半年后全面爆发,第85师的改编计划未能完成。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华品章随部经徐州、沧州北开南口参战。但在此时,华品章接到了新任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的来电,电文中说第72军正在扩编中,部队极需骨干,希望华能返回该部效力。华品章在第88师任职期间,屡次得到孙元良的照顾,尤其是在接任炮兵营营长一事上,华品章毫无带兵经验,是孙元良力排众议,力保他当上这个营长。由此可见,孙元良对华品章的器重和信任。对于孙元良的邀请,华品章无法拒绝,他考虑到无论是在南口还是在上海与日军作战,都没有区别,便决定返回第88师效力。

华品章在向师长陈铁说明原委并得到同意之后,于9月初起程赶赴上海,在被孙元良战地委任为第88师第262旅(旅长彭巩英)上校副旅长兼师补充团团长后即投入到在蕴藻浜的战斗中。半个月后,孙元良筹组第72军补充旅,他以第88师在8月作战负伤痊愈的军官和士兵以及师补充团作为成军基础,将他们扩编为补充旅(旅长吴求剑),调华品章担任该旅第1团上校团长。华品章受领任务后,即刻动身前往南京协助补充旅旅长吴求剑组建部队。经过1个月的紧张训练,当第72军主力从上海撤退到南京时,整齐肃穆的补充旅官兵已经可以投入到作战中了。

第72军军长孙元良受领保卫南京的任务后,便对所部作出部署,他命令第262旅担负中华门至光华门一线城墙的守备任务,第264旅第528团协防中华门,旅部及第527团和补充旅担负城外雨花台的守备任务。此外,根据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的命令,补充旅第1团还需抽调一部配置在离南京20公里处的板桥镇作为前哨阵地。华品章于是命令中校团附

高健指挥第1营和第2营前往板桥镇,自带第3营坐镇雨花台西台阵地。

12月9日中午,日军第9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第18旅团(旅团长井出宣时)第19联队(联队长人见秀三)对第527团阵地发起主攻,并以一部佯攻第1团,华品章根据军部命令将位于板桥镇的前沿部队尽数撤回。此时第1营和第2营已经与日军激战一昼夜,2名连长阵亡,华品章为鼓舞官兵士气,坚定抗日决心,亲往一线阵地视察。根据中校团附高健的回忆,日军此时对雨花台发起猛烈炮击,华品章不幸中弹伤重而亡,时年仅33岁。第1团此后由高健代理团长继续指挥,并转移到中华门作战。在之后的3天里,第1团官兵在中华门上顽强阻击日军,少校团附罗之张、第1营营长周鸿先后阵亡,最后仅20余人从南京突围而出。

华品章阵亡后被晋级少将抚恤。

2005年8月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四川省西昌人民政府在泸山之麓为华品章修建了纪念碑。2015年8月24日,华品章被列入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刘国用 字剑豪,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生于广东省梅县白渡镇凤岭虎形村(现为梅州市梅县区雁洋镇虎形村)的一户农民家庭。刘国用在家中行二,初入凤岭小学堂学习。当刘父远渡新加坡谋生立足后,他也随同母亲卢氏前往,后考入中华中学继续学业。不幸的是,刘父因病去世,使刘家生计陷入困难。好在留乡生活的大哥刘挺豪在部队里当上了一名军官,刘国用便跟随母亲回国,在大哥的接济下,勤学苦读,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广东省高等师范学校。

刘国用的志向本是以教育救国,但在广东高师就学期间,在种种革命新气象的影响下,决定投笔从戎。1925年1月,刘国用考入黄埔军校,在经过半年的入伍生训练之后,于7月1日正式升入军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刘国用接受的是为期半年的军官速成教育。在学期间,他依靠自己的文化底子刻苦努力,不仅在文科上取得优异成绩,术科成绩也名列前茅。此外,他还参加了孙文主义学会,积极提倡“三民主义”救国。1926年1月,刘国用学成毕业。由于在军校学习期间政治思想进步,刘国用被越级任命为第1师(师长钱大钧)第1团(团长郭俊)第1营上尉党代表。长期担负政治工作并非刘国用所愿,他在半年后申请调职担任部队长,成为一名上尉连长。



在北伐战争中,刘国用历经南昌、龙游、松江、龙潭、蚌埠诸役。龙潭一战,他率领所部身先士卒,因功被提拔为第1营少校营长。1928年7月,刘国用营被改编为第9师(师长蒋鼎文)第25旅(旅长甘丽初)第49团(团长陈裴)第1营,他仍然担任少校营长。1929年年底,他被提拔为第50团(团长李楚瀛)中校团附。

1932年4月,第50团团长的李楚瀛升任第25旅副旅长,在李氏的举荐下,刘国用被任命为第50团代理上校团长,但仍支中校的薪水。刘国用新官上任半个月,就遭到诬告。5月18日,他因“涉嫌贪污”被撤职逮捕,此后经过军事法庭审理,于7月13日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刘国用在军中向以清廉著称,此次却因贪污受刑,军中许多同僚都为他打抱不平。

1935年7月,刘国用刑满获释。由于是“犯官”身份,许多部队都不愿意接受他。在此情况下,刘国用的梅县同乡、时任第95师师长的李铁军向他伸出援手。在李铁军的保荐下,刘国用被送入军政部参谋团受训。1936年2月,刘国用结业后返回第95师,被李铁军任命为中校服务员,派在参谋处工作。1937年4月,李铁军调任第1师师长,刘国用也随同前往,仍任中校服务员,在参谋处工作。相对那些已经当上师、旅、团长的三期同学来说,刘国用已经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刘国用于8月随部开赴上海参战。1个月月后,第58师(兼师长俞济时)第172旅(旅长何凌霄)第344团(团长陈式正)中校团附周浩在作战时负伤离职,刘国用在李铁军的推荐下,前往该团接任中校团附一职。

9月起,刘国用随第344团先后在浒浦口、朱宅、吴家巷、川沙、东李宅与日军激战,他几次率领预备队对突入阵地的日军实施反击,都使防线转危为安。在2个月的作战中,刘国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逐渐得到第344团同僚的认可。

11月6日,第58师奉命转移到苏州河南接替友军西陶浜至八字桥一线的守备任务。7日早晨6时许,日军台湾步兵第1联队对第344团阵地发起猛攻,第2营营长童亚仆力战身亡,部队因失去指挥防线逐渐动摇。危急时刻,刘国用向团长陈式正请命率领第1营驰援。当部队赶到八字桥时,日军已经突入,刘国用当即下令发起逆袭,一举将立足未稳的日军击退,稳定了第172旅的整体防线。

11月9日,刘国用奉命随部退守苏州。此后刘国用随部队边打边

退,于28日撤抵南京。第58师经淞沪一战后,元气大伤,部队未经整补即奉命参加首都保卫战。与此同时,第58师的人事也有了很大调整,兼任师长的俞济时专任第74军军长,调第88师副师长冯圣法接任师长,第174旅旅长吴继光在青浦阵亡,调第343团团团长朱奇接任旅长,上校副旅长楼月因伤离部,遗缺由刘国用递补。

根据计划,第58师承担南京外围淳化镇附近的大胜关至大山一线防务,其中板桥镇和牛首山分别由第174旅所属第347团和第348团防守。刘国用随部进入指定地点后,发现原阵地的防御工事十分简陋,他只得和旅长朱奇分头指挥所部赶筑工事,尽最大的努力构筑起有效的防线。

12月7日凌晨,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第36旅团(旅团长牛岛满)第23联队(联队长冈本镇臣)和第11旅团(旅团长坂井德太郎)第13联队(联队长冈本保之)分别对第174旅阵地发起进攻,刘国用和旅长朱奇分头督战,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死战不退。在与日军的激战中,第347团团团长石补天负伤,第3营营长张介夫阵亡。

12月8日深夜,刘国用随部撤入南京城,第174旅的新任务是在水西门以东地区休整,并作为水西门守军第51师的预备队。12日上午,日军第36旅团第45联队(联队长竹下义晴)猛攻水西门,遭到第51师顽强抵抗。战至下午,刘国用奉命率领第347团第1营增援水西门,配合第51师主力作战。12日晚上20时许,刘国用奉命前往师部开会,并得知突围的命令。为保障第58师主力成功突围,刘国用主动请命断后,但在完成任务时,日军第45联队已经攻入城内,其余各处也都有日军涌入。眼看部队陷入重围又突围无望,刘国用决定指挥剩余的百余人作最后一搏。

日军第45联队第3大队由水西门入城后开始扫荡,他们没有料到还会有成建制的中国军队发起反扑。13日凌晨1时许,刘国用乘日军第3大队松懈休息的机会发起突然袭击。该大队措手不及,第11中队中队长大园庄藏当即毙命,第9中队中队长前川参次重伤,整个大队很快陷入混乱。但日军在回过神后,立即组织围歼,刘国用所部终因寡不敌众,他和第1营营长廖明耻在混战时中弹身亡,时年33岁。

刘国用阵亡后被晋级少将抚恤。

2015年8月24日,刘国用被列入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韩宪元 字则垂,号如潮,清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1906年4月22日)出生于广东省文昌县水北村(现为海南省文昌市迈号镇水北村)的一户书香门第。韩宪元的祖父韩锦璋是清末秀才,父亲韩晓中为革命志士,辛亥革命成功后即返乡从事教育事业,母亲文氏为当地名门,叔父韩定远和舅舅文鸿恩都在国民革命军服务,官至中将。

韩宪元在家中5个孩子中居长,他“自幼聪明、性格坚毅”,“事亲至孝、待人接物至诚”。在读小学和县立蔚文中学时,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不仅老师称赞,同学也都表示钦服。

在叔父和舅舅的影响下,韩宪元中学毕业时已经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并立志从军报国。1924年年底,他和同乡龙其伍、岑家卓、林卧薪、符致远等30余人相伴前往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就此走上戎马之旅。

1925年1月,韩宪元在通过考试后编在军校入伍生总队第1营(营长陈继承)第1连,开始为期半年的入伍生生活。在此期间,他曾跟随校军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并积累了一些临战经验。同年7月,黄埔军校第三期正式开学,韩宪元编在步兵第3队(队长翟瑾),开始了他的步兵军官速成学习生活。2个月后,校方调整队号,韩宪元所在的第3队改称步兵第1大队(大队长郭大荣)第1队(代队长丁琥)。

1926年1月韩宪元学成毕业,被分配到第1师(师长钱大钧)当见习排长,但还未出发,就接到时任第14师第41团团附的叔父韩定远邀请。于是韩宪元决定前往第14师(师长冯轶裴)第41团(团长涂思宗)担任少尉见习排长。同年5月,第41团改称第1师(师长王柏龄)第3团(团长薛岳),韩宪元随部行动,实任少尉排长。此后他随部参加北伐,历经南昌、龙游、松江、龙潭诸役,屡立战功,职务也从中尉排长、上尉连长,而升至少校营长。

1928年7月,第1师缩编为第9师(师长蒋鼎文)第25旅(旅长甘丽初),韩宪元被编余,改任第25旅少校副官。2个月后,副旅长俞济时调任第6师(师长陈焯)第16旅(旅长郭忏)第31团团附,韩跟随俞氏同往第6师,被任命为第16旅少校副官。第16旅当时在溧阳剿匪,韩宪元随部参战,至11月将土匪歼灭,并俘获匪首葛小妹妹。此后韩宪元作为审判官之一参与了对葛小妹妹的审判。

1930年12月,韩宪元受到时任国民政府警卫师(师长冯轶裴)副师长俞济时的邀请,前往该师担任少校参谋。1931年3月,警卫师扩编为



警卫军(军长冯轶裴),韩宪元升任警卫第2师(师长俞济时)参谋处(处长马君彦)中校参谋。1932年1月,警卫第2师改称第88师(师长俞济时),韩宪元仍然担任参谋处(处长马君彦)中校参谋。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韩宪元随部参战。作战期间,韩宪元充分展现出自己的胆识,他屡次带领侦察人员调查日军情况,并在返回师部后写出简明扼要的报告,使第88师对日军的动向了如指掌。韩宪元因此受到俞济时和马君彦的赞赏。

1933年1月,韩宪元调任第88师(师长孙元良)第264旅(旅长萧冀勉)中校参谋,实际负责第264旅的日常训练事宜。1934年7月,韩宪元离开参谋岗位,改任第262旅(旅长彭巩英)第524团(团长张子鸿)中校团附。

1935年10月,第88师被军政部选为第二期调整师之一。为了应对有可能爆发的中日战争,韩宪元积极配合德国军事顾问对部队的训练,并屡次直言中日战争必定全面爆发,要所部官兵做好准备,随时投入到保家卫国、抵御外辱的战斗中。部队在接受“调整”期间,韩宪元还协助新任团长陈素农,承担起京沪沿线的国防工事修筑任务。

1937年5月,团长陈素农调升第88师参谋长,遗上校团长缺由韩宪元升任。2个月后,抗战全面爆发,韩宪元奉命率部于8月12日秘密进驻上海闸北区的火车北站,准备投入到对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攻势作战中。部队出发时,韩宪元站在全团官兵前慷慨激昂地说:“此次参加淞沪抗战,正我军人建功报国之时,必须戮力同心,发挥本团过去光荣战绩,抱成仁取义之决心,誓与敌寇周旋,即存一兵一卒,亦不许失去尺地寸土”。

8月13日,位于八字桥的第523团与日军发生小规模交火。14日拂晓,韩宪元第524团所属第1营率先向日军位于宝山路桥的据点发起攻击,标志着淞沪会战正式开始。由于第524团的主要任务是牵制日军兵力,配合友军第264旅的进攻,所以在战事开始后的3天里,韩宪元指挥的第524团与吴求剑指挥的第523团互相配合,在宝山路至虬江路一线紧紧地牵制着日军3个大队。

然而随着战事拖延,中国军队未能在短期内歼灭日本海军陆战队,致使战事越大越打,当日本陆军也登陆上海参战后,整个攻势作战不得不转入守势,韩宪元也奉命率领所部转移到蕴藻浜地区阻击日军达数月之久。



《申报》记者曾在阵地中采访韩宪元团,并以《英雄团长访问记》为题予以报道。韩宪元为此亲赠戎装照片1张,亲笔题写“抗战图存”给记者刊发,此举大大鼓舞了奋战在前线的广大官兵。

10月26日,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奉命率部撤往苏州河南岸。为保障北岸守军安全脱离,孙元良命令第524团中校团附谢晋元率领第1营400余人留守四行仓库,团长韩宪元则率领第2、3两个营采取逐次后退的方式向西南方撤退。

韩宪元在接到任务后,即与团附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等官兵以酒道别,他说:“本师奉命之日,即誓以马革裹尸,未尝企求生还。今诸位得此机会报国,较余等尤为光荣”。谢、杨等人听后皆大为感奋,此后坚守四行仓库,成为闻名全国的“800孤军”。

11月中旬,韩宪元率领残部撤抵南京休整。此时第262旅人事有了重大调整,原旅长彭巩英升任副师长,调朱赤接任旅长,第523团团团长吴求剑调升第72军补充旅旅长,调谭本良接任团长,韩宪元则继续担任第524团团团长,并在不久之后奉命参加南京保卫战。

根据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的计划,韩宪元所在的第262旅奉命承担中华门至光华门一线的城防任务,第524团主守光华门,与守备中华门的第523团协同作战。12月8日,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调整城防计划,将光华门的守备任务交由第51师接替,韩宪元于是奉命交出城门防务,但仍然担负不包含城门在内的城墙防务。

12月10日上午,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第11旅团(旅团长坂井德太郎)第13联队(联队长冈本保之)对守备中华门的第523团发起猛烈进攻,韩宪元的第524团压力相对较轻。但战至11日上午,中华门附近一段城墙被日军炮兵轰塌,大量日军开始从坍塌处入城。为保友军阵地不失,韩宪元急忙抽调预备队增援第523团,终于成功将日军击退。

11日深夜23时,第262旅旅长朱赤向韩宪元传达了第72军军部的新命令,要第524团将城防任务全部移交给第51师,全团由朱赤亲自率领驰援城外雨花台与日军激战中的第264旅。朱赤与第264旅旅长高致嵩经过协商,决定由第264旅继续承担雨花台左翼主阵地,朱赤则指挥第524团和第72军补充旅第2团担负右翼阵地的守备任务,其中第524团左与补充旅第2团、右与第264旅一部相邻。

防务调整完毕后,朱赤与高致嵩就商量着如何乘夜发起一次反击,借夜色的掩护夺回部分丢失的阵地,以便第二天与日军再战。在这次反击中,韩宪元亲自上阵指挥所部官兵冲锋,但无奈日军防范严密,没有取得战果。

12月12日凌晨4时,日军第114师团集中所部炮兵集中轰炸雨花台守军阵地。1个小时后,第114师团(师团长末松茂治)第127旅团(旅团长秋山光三)所属各部对雨花台守军发起进攻,其中进攻第524团阵地的是日军第66联队(联队长山田常太)。

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韩宪元亲在一线督战,当日军步兵突破阵地时,他还亲自带领预备队投入反击,形势危急时甚至夹杂在一起肉搏,这才勉强将阵地稳定下来。经此一战,第524团元气大伤,韩宪元负伤,第2营营长黄琪、第3营营长符仪廷都在激战中阵亡。当日军第66联队于上午9时许再次发起进攻时,第524团的防线被突破。此时韩宪元左右见状劝他“暂避”,但韩宪元却推开左右,并大声责问道:“我五二四团能以一营兵力固守上海四行仓库,今我一团官兵,尚不能固守小小雨花台乎?大丈夫既舍身许国,岂可临难苟免畏死偷生?”说罢,即裹伤提起冲锋枪再次投入到与日军的激战中,终不幸身中数弹而亡,年仅31岁。此后,少校团附胡替华、第1营营长黎仁也都先后战死。

韩宪元阵亡后被晋级少将抚恤。

2015年8月24日,韩宪元被列入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乐以琴 四川芦山人,生于1914年11月11日。乐以琴在家中10个子女中行六,他自幼具有刚毅不屈的性格。乐以琴先后毕业于雅安小学、明德中学和华西协合高级中学。在学期间,他刻苦勤奋、品德良好,说起话来心直口快,做起事来认真负责,因此颇得老师和同学的称赞。此外,他酷爱运动,体形虽然并不高大,但却锻炼得精悍结实,是学校有名的短跑冠军,也是四川省的短跑选手。

1931年夏,乐以琴作为四川省的田径选手代表出席全国运动会。不料“九一八”事变突然发生,全运会因此停开,这使他想在全运会上一展技能的雄心壮志如泡沫般破灭。乐以琴便前往上海投奔哥哥乐以钧,准备报考大学。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乐以琴也参与到爱国青年



的集会和游行中,他们纷纷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收复东北。他不仅在上海参与宣传奔走,而且还随一批学生前往南京向蒋介石请愿。然而,国民政府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使乐以琴十分失望,他闷闷不乐地返回上海。不久,他在大哥乐以勋的邀请下前往济南报考齐鲁大学理学院深造。

1932年夏,中央航空学校在北平秘密招生,这一消息在爱国学生的不断传递下,被身在济南读书的乐以琴获悉。乐以琴认为空军必定成为将来抗击日寇的中坚力量,又是国家大力建设的新兴军种,他毅然决定投笔从戎,期待将来能够驾驶“空中铁鹰”,狠狠打击日益嚣张的日本侵略者。

1932年12月,乐以琴成功考入位于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第三期航空班,他先是接受了为期半年的入伍生训练,随后经过初、中、高3个阶段的飞行训练于1935年12月学成毕业。在学期间,乐以琴刻苦努力,他利用一切机会反复练习飞行动作,力求做到精准完美。此外,他还对空中的战略战术研究苦下工夫,不仅理论扎实过硬,在实际的飞行训练中,也都能以出色的成绩完成任务。和乐以琴同期学习的同学也大都勤学苦练,他们之中既有成长为高级将领的王育根、顾兆祥,也有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沈崇海、李嘉礼、吕基淳、周竹君、邵瑞麟、林觉天、黄保珊、汤卜生、郑少愚、谭文等人。

乐以琴于1936年1月被任命为空军第8队少尉队员(1936年3月3日任官空军少尉),旋因飞行技术精湛,又被调回航校担任飞行教官。同年10月,军政部为适应对日作战需求而改编空军,乐以琴被调任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第22队(队长黄光汉)中尉分队长。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乐以琴驾驶霍克III型战斗机在淞沪战场上多次迎击日军的轰炸机群和战斗机群,积功升任第22队上尉副队长。从11月开始,日军的陆航和海航编队就不断对南京实施空袭。第4大队在周家口接收了苏联援助的伊-16战斗机后,立即飞赴南京参与到保卫首都的空战中。

1937年12月3日,日军大批机群再次飞临南京上空实施攻击。此时乐以琴的座机正在修理,他杀敌心切,当即决定改用同僚的座机升空迎敌。乐以琴在栖霞山上空发现了日军3架轰炸机,便开足马力冲了过去。不料这是日军早计划好的陷阱,当乐以琴即将靠近日军轰炸机时,在他的

上方突然出现了3架日军战斗机。乐以琴见情况不妙,急忙调头还击,终因势单力孤连中7弹,而被日军击落于栖霞山上,年仅23岁。乐以琴阵亡后,于1945年1月30日追赠为空军少校。

2006年12月,乐以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2014年9月1日,乐以琴被列入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涅日丹诺夫·尼古拉·尼基福罗维奇 1913年出生于俄国伊尔比特市,青年时加入苏联空军成为战斗机飞行员。1937年10月成为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成员,随部队经中国的新疆、甘肃来到内地。1937年11月22日到达南京上空。在当天的南京空战中,为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而牺牲。他也是中苏并肩抗击法西斯期间作战牺牲的第一位苏军烈士。

侵华日军对南京平民的屠杀从1937年8月15日初次轰炸南京就已经开始了。从这一天起至南京沦陷的近4个月时间,日军航空兵不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在南京地区上空进行疯狂投弹,给南京市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面对日军的空袭,中国空军展开了“空中南京保卫战”,在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进行了英勇的抗击,虽遏制了侵略军的攻势,但空中战力渐渐消耗殆尽。至11月,在南京仅剩的中国战机已不能阻击日军的肆意空袭了。据当时在南京作战的中国空军飞行员王倬回忆:“到了十一月六日,我们在南京的飞机能够起飞的仅有七架”。

1937年11月上中旬,华东地区出现了持续阴雨天气,不利于日军航空兵出动。日军只在10日、11日和15日三次轰炸南京市区。而这三次空袭均未遇到来自空中的还击。

此前,全面抗战开始后,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苏联援助中国空军一批战机。中国空军著名英雄高志航率队前往兰州接收和训练,准备以这些飞机来保卫南京。

据参加接收飞机的飞行员杨遇春回忆,中国空军接收的新战机本来是11月15日飞往南京的,但是在河南省周家口机场遭遇恶劣天气。连续等待6天之后,11月21日天气转晴。在正准备起飞前往南京时,遭到事先获得消息的日军航空兵突然空袭,绝大部分飞机在地面损毁,高志航





等飞行员也不幸牺牲。原定 11 月 22 日去保卫南京的计划,也被迫只好取消。

在南京原有战机损失将尽而接受的新飞机又半路损毁的历史背景下,1937 年 11 月 22 日,苏联援华飞行员直接驾驶的战斗机赶到南京上空,直接投入了保卫南京的空战。此前不到一个月,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的先头部队刚通过新疆的中苏边界进入中国。他们是从兰州一带经长途飞行来到南京的。

日军 1937 年 11 月 22 日发起“南京大空袭”。下午 14 时 30 分,日军海军航空兵飞机到达南京上空,企图在实施空袭同时还投放用来瓦解中国军队士气的《劝降书》。就在骄狂的侵略军以为遇不到抵抗时,苏联飞行员驾机出现,与来犯的日本战机展开了激烈空战。

据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考证,11 月 22 日下午 14 时 45 分,日军飞行员宫崎康治在空战中被击毙,座机被击落。据此可知,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投入中国战场的首战之中,虽是刚刚长途赶来且还不熟悉日军航空兵战术,但是已取得了击落敌机、击毙敌人的战绩。余下的日军飞机也被迫放弃空袭南京的计划,仓皇撤出南京上空。不幸的是,空战中苏联战机也有一架被击中,坠落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校园内,飞行员牺牲。

1989 年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给江苏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的一份公文函里,列出 6 名 1937 年在南京阵亡的志愿飞行员名单。其中明确记录,最早牺牲的是涅日丹诺夫,1913 年出生在伊尔比特地区,1937 年 11 月 22 日在南京空战中阵亡。

1993 年 4 月,北京、南京航空联谊会等为建设南京航空烈士墓的纪念碑而编纂的《中国和国际援华航空烈士名单》。这份名单里收录了俄罗斯官方提供的苏联在华牺牲飞行员名单。名单中可以查询到,1937 年 11 月 22 日,1913 年出生的苏联空军中尉涅日丹诺夫·尼古拉·尼基福罗维奇在“НАНКИН”(俄文“南京”)牺牲,年仅 24 岁。

这些记录显示,1937 年 11 月 22 日保卫南京而殒身长空的烈士正是涅日丹诺夫。

2015 年 5 月,俄罗斯伊尔比特市人文历史博物馆发现了涅日丹诺夫的档案和照片。他的档案显示,1937 年 11 月 22 日牺牲,被授予了苏联红旗勋章。

因为是秘密援华,烈士的家乡伊尔比特市 78 年来一直不知涅日丹诺

夫牺牲于何处。伊尔比特市人文历史博物馆馆长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知道南京方面考证了烈士事迹的讯息时,说:“我们终于了解涅日丹诺夫牺牲在南京上空的英勇事迹,他不再只是一个名字,他是俄罗斯的儿子,是伊尔比特的骄傲,我们会永远铭记他。希望我们伊尔比特市能与南京加强沟通,增强往来,一起怀念我们并肩战斗的英雄”。

2015年8月24日,涅日丹诺夫·尼古拉·尼基福罗维奇被列入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敌后战场



64

英魂谱·圣地祭

成庆镛 又名成善之,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出生于江宁县汤山镇前村街一个大户人家。少年时期,进入学堂,聪颖好学,成绩优异。成年后,他待人和善,谦虚正派。

20世纪30年代初,他教过几年私塾,一度受到国民党左派思想的影响,并阅读过不少进步书籍。30年代中期,适逢国民党政府进行地方选举,成庆镛参加遴选,成功当选,被任命为汤山镇古泉乡乡长。在3年任期内,他处处为群众着想,备受乡里称道。

1937年,南京沦陷后,日军在汤山设立据点,经常下乡扫荡,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日军的暴行使成庆镛怒火燃烧,他毅然参加了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积极投入到抗击日军侵略的艰苦斗争中。

1938年,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先遣支队,由皖南挺进苏南,以横山为中心,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江宁县汤山一带是重点活动范围之一。成庆镛知道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便继续担任古泉乡乡长一职,并积极参加新四军的抗日斗争活动。一天中午,新四军二支队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彭冲带着一名警卫员,化装后来汤山镇前街村张王庙,找到成庆镛,给他讲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并一起讨论组织革命机构等问题。他们谈得十分融洽,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晚饭后,成庆镛和弟弟成庆柯2人连夜护送彭冲回根据地,他们穿越坟头公路到山凹村,经湖山、义鸡庙、

新塘等地,最后将彭冲安全送到花山(宝华山)根据地。

彭冲走后,成庆镛在其同学周志明(烈士)等人的鼓动下,决定策划组织东郊抗日游击大队,即江宁县抗日自卫队(简称“江抗”)。在成庆镛等人的宣传鼓动下,这支队伍很快就从初期的四五十人发展到三四百人。成庆镛时任江宁县第六区政府助理员(副区长),兼任“江抗”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和经济保管、文书等多职于一身。这期间他不仅积极动员成庆柯、周恒贵等人参加新四军游击队,还经常与周志明、庞声虎、徐康杰等人迂回在汤山周边的青龙山、上峰、土桥和句容县郭庄庙一带,进行抗日游击活动。

在抗日游击活动期间,成庆镛收缴前街村土匪库立余手枪1支。库怀恨在心,遂纠集三四十名匪徒围攻成家,吊打其妻子和儿子,还抢劫衣物,牵走耕牛,最后将成庆镛20岁的长子成洪才活活烧死。当时,由于成庆镛在外工作,幸免于难。他对敌人惨无人性的报复,未消沉在悲哀中,更加坚定了铲除日伪势力和土匪的决心,在后来的各次战斗中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1938年9月,成庆镛为游击队员做向导,配合并参加廖海涛司令员率领的一营部队,伏击日军经过汤山的军车。他们埋伏在坟头至侯家塘交界公路两侧的小山上,日军军车一开来,枪弹猛射,打得敌人溃不成军。激战中,我营只牺牲1名侦察员。此后,成庆镛又多次带路并率队配合二团三营罗为达营长和二团二营黄守善营长的部队,在这一地区伏击日军军车,袭击敌岗哨和碉堡,打得敌人日夜不宁,胆战心惊。

1939年4月,成庆镛带领的游击队,奉命调至土桥以南张巷重新整编,原地方抗日游击大队改编为新四军主力部队。原“江抗”大队长周志明调任二支队二团二营副营长,成庆镛任营经济委员,仍兼任江宁县第六区区长助理,主要任务负责财经工作,保障主力部队后勤供应。

1940年6月20日,伪乡长杨厚芝设圈套诱骗区抗日政府贺超指导员和成庆镛2人到他家“开会”,研究所谓收缴学田田租问题。杨妻趁开会之机向伪区长陈泽洲告密,陈立即报告汤山日本警备队队长中下。21日上午,日本警备队和伪自卫团将龙泉乡神家庄杨厚芝家团团包围,成庆镛与贺超不幸被捕。

敌人把他们关押在汤山陶庐日本警备队司令部,劝降不成,又施以酷刑拷打,但他们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屠杀由你。”敌人





在牢中折磨他们约 40 天,从他们身上得不到任何情报,便惨无人道地使唤狼狗咬,用刺刀戳,将贺超残忍杀害。1 个月后,敌人把成庆镛押到汤山林场荒野,用大刀将他的头颅砍下,成庆镛壮烈牺牲,时年 42 岁。

王齐贤 原名王贞富,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2 月生于江宁县平陵乡绿杨头村(现属湖熟街道周岗镇),早年靠父亲王裕杰在溧阳县上兴埠开杂货店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王齐贤 10 岁前读了几年私塾,以后便随父亲到溧阳县上兴埠杂货店学徒,18 岁成婚。军阀混战时,店被烧,王齐贤回到家乡,生活无着落,便炸油条、卖烧饼、开小茶坊做小生意糊口。当时社会上安清帮势力大,做生意也难以立足,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加入安清帮,勉强觅一块立足之地。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2 月,南京沦陷后,日军烧杀奸淫,土匪打家劫舍,周岗圩广严寺、西释村先后遭抢,当地百姓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人心惶惶。各村为了保家护村,维持地方治安,周岗圩 30 亩田以上的“大户”,发起组织大刀会,从外地请来点传师传授技艺,活动遍及各村。王齐贤和同村王昌茂,也领头在当地办起刀会,王齐贤一度当了刀会教师,他们从几把大刀起家,逐渐搜集些枪支弹药,拉起了一支护家护村的自卫武装。

1938 年秋,新四军来到周岗圩,老三团政治处主任钟国楚到绿杨村了解情况,通过村上进步教师吴宁忠的介绍,结识了王齐贤和王昌茂。在钟国楚的教育和影响下,王齐贤和王昌茂提高了觉悟,认清了抗日形势,同意接受新四军的领导,在刀会基础上,组织成立了抗日自卫团,团长王昌茂,该组织对外名义上仍是刀会。

王齐贤在长干大刀会当了会长之后,便以此公开名义团结了众多大刀会员,尽力保护新四军和基本群众。1938 年年底,中共江句溧县委为扩大游击区,派游击大队大队长刘鹤亭、副大队长王久真等 9 名队员带着短枪前往长干分会(广严寺村)争取徐晋和吴本发等人,向他们劝降。当这 9 名同志分两路进入广严寺时,不料被刀会岗哨发现。他们以铜锣为号,纠集会员和长枪队 100 余人,发起围攻和追击。王齐贤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向前冲去,告诫说:“猴山恐有新四军埋伏,不可再追。”从而阻止了大刀会的追击。短枪队乔老七不幸脚负伤,不能行动,副大队长王久真

请了几名农民抬着伤员,才顺利突围到高阳桥。这次被追击,如果不是王齐贤在暗中掩护,这9名队员很难脱险。

1939年,王齐贤经新四军民运干部庞家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江溧句抗日自卫大队大队长、县警卫连连长、秦淮区区长等职务。他经常在龙都、周岗圩一带率领民兵抗日锄奸,在日伪交通线上剪电线,断桥破路,拦截日伪汽车、牲口队,把粮食夺回来分给穷人吃。并发动贫苦农民向地主借粮、借种,以度春荒。在他们的活动下,周岗圩一带群众抗日情绪高涨,热情支持、掩护新四军开展抗日游击活动。特别是王齐贤的老家绿杨村,抗日群众团结紧密,敌人在这里无法藏身,成为新四军领导干部、战士来往活动的可靠基地。

1940年2月,新四军主力老四团在钟国楚指挥下,分别进驻周岗圩的石桥口、陡门口、焦村、庞家桥、绿杨头等村庄,对长干分会形成半包围的态势,迫使徐晋、吴本农、张日先、徐华朋等分会头目前往庞家桥与新四军谈判。最终,无条件撤销联庄分会组织,全部归顺新四军。王齐贤等同志把所有枪支、弹药和大刀全部交给新四军。从此,长干地区成了新四军的游击中心区。

1940年3月17日,游击大队大队长刘鹤亭在周岗圩焦村焦于西家召开乡保长会议,不料被敌人包围。刘大队长 in 突围中受伤被俘,于周岗龙王庙旁惨遭杀害。之后,由王齐贤续任江宁县自卫大队队长职务兼任龙都区区长。在部队,他待兵亲如兄弟,对牺牲的战友家属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新四军四团班长冯德才在赤山战斗中牺牲,王齐贤每次到周岗圩陡门口村时都要到冯德才家去看望烈士家人,他对冯的父母说:“你儿子为了打鬼子牺牲了。我和部队都是你们的儿子。”在生活上,他指派伪保长王传金给予照顾,并指定在农忙时给予代耕。对其他军烈属他也同样关心,令地方给予代耕和生活上的照顾。赵德义和王志顺2名战士均是周岗石桥口人,均有父母妻女,生活都很困难。王齐贤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都要给他们一点钱粮,让他们回家看望家人。在这样无微不至的关心体贴下,战士们都能安心工作,英勇作战。情况再紧张、艰险,生活再困难、艰苦,部队中很少有开小差的现象。

王齐贤有高度的民族气节,他痛恨日本侵略者,也痛恨那些汉奸、走狗、叛徒、特务等民族败类。周岗圩和平村人郭高林,从小好吃懒做。日军侵占南京后,他经常到秣陵、禄口等日军据点里鬼混,还拜了禄口的顽





固势力把头陆开义为干师爷。当新四军黄玉庭营长到江宁开展工作时,郭高林伪装成积极分子,混进新四军黄玉庭部队,并在本村发展了4名青年参军,因此被任命为新四军常备队队长。从此他常以扩充人员和维持地方治安为由,指名向广大群众勒索钱粮,不达目的就放火烧房。有一次,他公开带领日伪军和河西大刀会共400余人,窜进周岗圩大肆搜捕新四军。周岗圩地区的老百姓遭受了极大的灾难,对郭高林恨之入骨。王齐贤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极为震怒。经上级批准,王齐贤于1941年5月派6名短枪队队员设伏于周岗钱家渡口,将其捕获处决,为当地百姓和新四军除去一害。

1941年皖南事变后,敌、伪、顽进一步合流,在新四军活动地区增设据点,驻守伪军,大肆“清乡”“扫荡”。此时,王齐贤跟随陆纲、庞家义等县领导转入青龙山一带打游击,风餐露宿,环境十分艰险。其妻邵氏担心他和家人的安全,哭着劝他不要干了,可王齐贤坚决抗日不动摇,把家里妻儿老小搬到龙都杨柳村去隐蔽,自己仍一心一意在外打游击。并多次配合主力部队,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1941年10月的一天傍晚,新四军四十六团参谋长傅狂波率领一连人进发至龙都杨柳、东岗头一带。此时,伪警卫师营长常海波带一个连伪军驻扎在龙都镇王家祠堂,妄图封锁南北交通,分割新四军抗日活动地区。得知敌情,新四军主力部队决定迎头歼击这股伪军,时任县警卫连连长的王齐贤立即召集班以上干部研究配合作战的计划,派出短枪班20余人,分头为主力部队带路,趁天黑直扑王家祠堂。祠堂门口架着敌人的机枪,县警卫连排长李修文猫着腰猛扑上去,用身体堵住敌人疯狂扫射的机枪口,为掩护主力部队迅速冲进敌营而壮烈牺牲。新四军击毙和生俘全连伪军,并缴获机枪1挺,步枪几十支。此次战斗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但他们不甘心失败,1个多月后,又派1营伪军分驻龙都、陶吴、秣陵一线。1个连在龙都东庵店强迫民工修工事,挖壕沟,筑碉堡,拉铁丝网阻拦行人,勒捐派税,放火抢劫,妄图卷土重来,在龙都立下足来。

1941年年底,王齐贤又带领县警卫连,配合主力部队,在团参谋长傅狂波的率领下,重返龙都拔“钉子”。此时,敌人凭借坚固碉堡和精良武器,居高临下疯狂扫射;新四军机动灵活,采取“火攻”的办法,摧垮了日伪据点。王齐贤派了2名战士,快速冲到碉堡一死角,用洋镐挖通一个口

子,在木柴上倒上火油,很快,碉堡里腾起了熊熊大火。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歼击伪军1个连,缴获轻机枪2挺,长短枪100多支。接着,又发动200多民工,扒平碉堡,吓得敌伪军再也不敢在龙都立足逞凶,大大鼓舞了江宁人民的抗敌斗志。这是江宁抗日斗争史上有名的三战三捷“三打龙都镇”战斗。

1942年年初,王齐贤调任青龙区区长。他常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去秦淮区一带开展对敌斗争活动。3月30日,王齐贤和县长强博、秘书焦恭士、警卫连长许治、民政科长庞家义等数十人在龙都开会,夜宿邹家边。31日凌晨,由于特务告密,秣陵伪自卫团团长李宏堂率伪军1个营,趁大雾包围了四面环水的邹家边。在仓促突围中,王齐贤在过沟时不幸被掷弹筒炮弹震伤,落水牺牲。在此次突围中,同时牺牲的还有强博、焦恭士等其他12位同志。

许维新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出生在江苏省句容县磨盘乡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8岁时,父母将他过继给白杨村塾师许云峰为子,他在养父身边读了七八年书,后在家种田。青年时代的许维新聪明颖悟,能会说会写,为人正直,性格刚毅,有胆略,富于斗争精神。

许维新的养父许云峰品高德重,在地方颇有威信。他为人正直,主持正义,敢于打抱不平;曾为遇到不公正之事,亲自到国民党县“衙门”去抗辩。塾师正义、无畏的品质,对许维新影响颇大。

地方恶势力视许云峰为“眼中钉”,后许云峰被诬告入狱,含冤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监狱里。许维新对此愤愤不平,胸中燃起强烈的复仇怒火,深感在人吃人的社会里要立足,就必须有自己的力量。于是在29岁那年,他联合同样遭遇者组织起5人小队伍,不久,就发展到10多人,自发地向恶势力和恶霸财主开展“反压迫”斗争。地主刘天曾多次对许维新的武装进行围剿,但均未能成功。

1934年,许维新被陷害坐牢。抗日战争爆发后,许维新出狱,看到中华民族遭到日本侵略者蹂躏,家乡的劳苦百姓仍倍受恶霸财主的迫害,心中充满悲愤。于是,他在家乡重新组织起100多人的武装,自称“游击司令”,活动在句容、金坛、溧阳、溧水4县交界地带。他们抗日自卫,劫富济贫,打击地方上依靠权势欺压人民的反动势力。这样,许维新的威望越来越高,许多人都来拜他为师。





1938年春,许维新与自称抗日的陶华阳为首的地主武装有过短时间的合作,不久,他们被国民党苏浙皖边区司令谢升鏢收编为第七大队,在攻打金坛朱林日军据点时,损失惨重,自动解散。许维新带领少数武装回到句容的磨盘山和溧阳的竹箠桥一带,开展抗日保境斗争。

4月23日,蔡巷据点4个日军来到白杨村追逐少女企图奸污,许维新见状怒不可遏,举枪要打死日军,当时保长怕惹成大祸阻止开枪,许维新大声怒斥:“他(指日军)不伤害老百姓,我不开枪;如果他伤害老百姓,我一定开枪。”该村群众在许维新的带领下,打死3个日本兵,另1个逃走。次日,日军前来报复,大队人马从天王寺据点出发,包围了朱巷、大冲、白杨等村,大肆烧杀,抓去群众70余人,押至马场集体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场惨案”。许维新目睹惨景,更激起对日本侵略者仇恨。

1938年6月,新四军挺进苏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陈毅司令率领新四军一支队到达茅山地区。为发展和壮大抗日队伍,新四军对地方抗日武装采取了争取、改造的方针。当时,许维新的游击队正在一支队司令部驻地附近的竹箠桥一带活动。陈毅司令了解到许维新有强烈的民族正义感,有自发抗日的行动,就派支队副参谋长张道镛(后改名陶勇)去做争取工作,并邀请许维新来作客。陈毅热情接待了许维新,并亲自与他长谈。在陈司令的教育引导下,许维新有了新的觉悟,毅然地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领导,300多人的抗日自卫武装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第一大队,许被委任为大队长。从此,他走上了革命大道,投入抗日的洪流。

许维新对陈毅十分敬佩,陈毅司令也很关心许维新政治上的进步,改编不久便调他参加新四军第一支队干部训练班学习,让他学习抗日救国的道理,了解新四军的光荣革命传统。学习结束后,他高兴地对陈毅说:“上了几天训练班,真是胜读十年书。”

8月,许维新所在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独立营,许维新任营长。司令部调派杨汉林同志任副营长,帮助开展政治教育工作、整顿组织纪律、教授游击战术,并让他们与主力部队协同作战,在战斗中锻炼他们。由于许维新明确了革命方向,斗争就更自觉、更勇敢、更有智谋了。他多次组织群众扛着钉耙,背着梯子到溧武公路天王寺往薛埠一段破坏交通、割电话线。他侦察到天王寺到唐陵之间的洋桥护桥日军天天要到河边洗脸。一天下午,许维新就率领10多名战士带着短枪化装埋伏在洋桥周

围,趁日军下河洗脸之际,活捉了1个日军。还有一次,许维新获悉有敌军车从天王寺过来,就立即带领几个战士在溧武公路上埋地雷,炸坏了1辆军车。

1939年2月,新四军一支队老二团夜袭京杭公路上的东湾日军据点。许维新配合老二团争取了据点内的炊事员,掌握了日军兵力情况,夜袭开始,许维新的独立营当向导,狠狠打击了敌人。在一段时间内,天王寺据点敌人被搞得惶恐不安,听到许维新的独立营就心惊胆寒。

5月,为坚持茅山地区的抗日战争和掩护六团东进,茅山地区成立了新六团,独立营改编为该团二营,许维新任营长,吴嘉民任副营长。

9月,党组织苏南敌后的地方干部去皖南军部教导总队第九分队学习,许维新在教导队认真学习,服从领导,严守纪律。军事生活艰苦、紧张,但他以苦为荣,还特地穿上新军服拍了1张全身照作纪念。

1940年初春,学习结业后他们从军部回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举行了欢迎仪式。陈毅司令还特地同许维新至诚谈心,殷切期望他回到地方继续发展武装,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沿着革命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为拯救中华民族做出更多的贡献。许维新激动地说:“陈司令怎么说,我就怎么办,办不到,我把头交给陈司令”。这次学习,许维新的思想有了一个新的升华。不久,许维新在溧阳杨湾村被个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由领导同志单线联系。此后,他以更高的政治热情,投入抗日战争。在斗争中,许维新对陈毅等领导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看到陈毅司令骑的马,既瘦矮又夜鸣,不利于夜行军,为保证首长的安全,就派人去皖北买了一匹雌性灰黄色骡子。这年四五月,陈毅司令在茅山北视察,传达中央指示,部署北渡准备工作,返回水西途经磨盘山时,在许维新家宿营。许维新将骡子亲手赠给陈司令。陈司令接过骡子就要和许维新比赛,这匹骡子身高体壮跑得又稳又快,陈司令连声称赞:“好骡子!好骡子!”

同年6月,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许维新兼任句容县四区区长。是年冬,敌伪配合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对茅山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斗争形势出现空前艰险的局面。这时,许维新组建的武装除留下警卫排已全部上升为主力,随同新二支队转移到太滂地区活动。组织上考虑许维新对人事、地理等方面熟悉的有利条件,决定留他在两溧地区任兵站站长,他不畏艰险,身入虎穴,做侦察工作。





1940年年底的一天,许维新化装后只身一人到天王镇汪伪区长戴臣富(当地人,与许维新相识)家,对他说:“带我到‘红部’(日军营部)去一趟,有人要问就说我是你的亲戚”。伪区长只好将许维新带到“红部”走了一圈,摸清了敌情。在兵站工作期间,他还为保护军用物资,安排、护送过往同志做了许多工作。他精心保护主力转移时埋藏在老人山、许家大洼等一带的军用物资。一次,汉奸刘有谟带着鬼子到李塔村搜查埋藏的军用物资,许维新的嫂子林氏泄露了一处。事后,许维新大义灭亲,逮捕了嫂子,因她怀有身孕而未枪决。

1941年年初,新四军一支队1个小分队,在皖南事变中冲出敌人重围,来到两溧地区,在竹箦桥北边找到许维新。他热情接待,安排住宿,并派人护送他们安全到达十六旅旅部。还有一位部队首长在皖南突围时负伤,途经兵站,许维新把他安排在较隐蔽的地方养伤1个多月。

在这期间敌人除武力“围剿”外,还用软化诱降手段,企图分化瓦解革命队伍。镇江一个姓李的汪伪师长,过去与许维新相识。一天,该师长带了30套黄呢军服亲自来见许,要接他去镇江做事,委为少校团长。许维新严词拒绝,保持了民族气节。

许维新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又建组成一支有60多人、30多支长枪、十四五支短枪的抗日游击队。

1941年5月,溧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许维新为第一任县长。第十六旅旅部决定,以许维新新组建的抗日游击队为基础,建立溧水县警卫营,许维新兼任营长。当时溧水地区还没有恢复,许维新带领县政府和部队在溧阳的大山口、瓦屋山一带活动。

1941年8月6日,许维新带领5个警卫员重返句容老家,开展统战工作。当晚在许家棚子(许的家)南边小松树山宿营。警卫员中小贾(贾长根)、二哈(王从吾)、小童(丁志和)是被伪自卫团长王致炜收买潜伏在短枪班的内奸。

7日凌晨,3个内奸趁许维新熟睡之际,用短枪将其杀害,同时遇害的还有他怀孕的妻子李三毛、警卫员赵四、曾昭扬。陈毅在苏中地区得知许维新被害的消息,悲愤地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要我陈毅还活着,一定要报”。

许维新英勇斗争的事迹至今仍在人民群众中传颂。

郑行郊 湖北省红安县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出生。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营政治教导员。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3年游击战争。1941年任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第十二团第二营政治教导员时,参战负伤,同年3月,伤愈后调任新四军第二师兼淮南军区六合县独立团政治委员。

1941年10月,驻六合县马鞍山日伪军窜至练山一带抢劫民物,杀害群众。郑行郊闻讯后,立即率独立团1个连在盛家岗以北的蚂蚁山龙王庙堵击敌人,战斗中不幸头部中弹牺牲,时年39岁。他的遗体被安葬在竹镇东赵家岗之北,后迁至乌石乡乌山烈士墓,2014年5月迁至竹镇镇烈士陵园。

1982年10月,江苏省民政厅公布江苏省烈士名录,郑行郊名列六合县烈士名录。

邓仲铭 原名邓振询,又名邓重民。清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一日(1904年9月30日)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大塘村的一户贫苦农家。一家人栖身于上无片瓦的土坯茅屋,家中无耕地,生活来源主要依靠给人干些零活或是帮人打短工勉强维持。1910年,邓仲铭的父亲邓元焕积劳成疾离开人世,邓仲铭时年6岁。孤儿寡母从此相依为命,颠沛流离,靠四处乞讨和乡亲接济过活,艰难地度过了4年。由于生活难以为继,母亲带着10岁的他被迫改嫁。到了继父家,便帮继父放牛。放牛之余邓仲铭到附近私塾就读。第二年,邓仲铭母亲陈氏因病离世,他的处境更加艰难。13岁起,邓仲铭跟着继父学做泥水匠,东奔西走,风餐露宿。3年学徒期满,继父就要他干重活、累活,除了吃不饱、穿不暖之外,还经常挨师傅的打骂。继父去世后,年少的邓仲铭孑身一人、无依无靠,只好重归故里投奔伯父,伯父收留了他并认为义子。在经历了这一时期的磨炼之后,年轻的邓仲铭充满了对旧世道的仇恨和对新生活的向往。因此,他很早就立志要为改变国家和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而奋斗。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9月,北伐军进入江西赣州,许多在广州黄埔军校学习的兴国籍中共党员(如陈奇涵、胡灿、鄢日新、肖以佐等同志)纷纷回到家乡,领导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邓仲铭深受影响。他以满腔热情、斗志昂扬的革命精神投入其中,积极做好组织



73

英雄
魂
谱



广大工农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建立农民协会等各项工作,成为领导当地农民运动的重要人员之一。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全国大批共产党员被国民党逮捕并惨遭屠杀。中华大地腥风血雨、阴云密布,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运动从胜利走向失败,进入了低潮。兴国县的革命者也随之转入地下活动。大革命失败后,邓仲铭在党组织的教育、引导和启发下,开始逐步认识到革命的艰难性、曲折性和长期性,阶级觉悟不断提高。这时,邓仲铭经常以泥水匠的身份作掩护,进行秘密宣传,发动工人、农民建立秘密武装,与敌人开展斗争。同年冬天,邓仲铭为了打击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积极组织并参加了秘密镇压当地恶霸地主王化铭和谢才伟父子的打土豪行动。在革命处于低潮的特殊时期,这一行动极大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也鼓舞了工农群众的革命斗志。1928年春,邓仲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还被选为兴国县塘石乡工会主任和区工会委员长。1929年2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等地。红军进入兴国,建立了革命政权,并成立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邓仲铭当选为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委员。接着毛泽东又亲自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共“六大”会议精神,提出干部要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为争取革命的胜利而奋斗。1930年2月,邓仲铭作为兴国县武装暴动领导人之一,出色地领导了全县工人革命斗争,被选为兴国县总工会委员长,成为全县工人运动的指导者和领袖。当时兴国县的工人多是以店员、泥木、纺织、缝纫、理发、船筏、码头等行业为主的手工业者,人员散且不易集中,游动广且难于组织。邓仲铭上任之后,把工作重心放在恢复和建立各级工会组织上,为了早日把各行各业的工人团结凝聚起来,他夜以继日,深入到工人中去进行革命宣传,动员和发动工人积极参加各类基层工会组织。他关心工人的切身利益,把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实现八小时工作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他常说:“开展经济斗争,改善待遇是需要的,但必须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必须把争取工人的个人利益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结合起来,工人才能获得彻底的翻身解放。”经过邓仲铭的不懈努力,兴国县的工人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广大店员、手工业者、船筏码头工人,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踊跃参加工人纠察队,积极进行军事训练,在配合主力红军攻打赣州和九打吉安的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此,邓仲铭名扬

赣南。

1931年11月7日,邓仲铭作为江西省工人代表,出席了在红色苏区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1932年2月7日,全总苏区执行局在瑞金叶坪的黄家山召开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会议正式宣告成立江西省、福建省职工联合会。邓仲铭被选为江西省职工联合会执行委员兼江西省职工联合会组织部部长,后升任省职工联合会委员长。这时的邓仲铭不仅是兴国县的革命领袖,而且是赣南工农劳动者的领袖了。邓仲铭在担任江西省职工联合会委员长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为了大家舍小家”,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国民党为了剿灭红色苏区,派飞机进行狂轰乱炸,妻子不幸被敌机炸死,他顾不上回去,儿子生病得了天花,他也没空回去照料。在他心中,党的事业、工人的疾苦、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他用辛勤的工作,争取到工人工作条件的改善和生活待遇的提高,换来了全省工人的觉醒,影响和调动了工人群众拥护工会、参加工会的积极性。新的工作环境,对理论和文化水平的素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闲暇之时,邓仲铭见缝插针,认真学习,刻苦钻研,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并在全总苏区执行局的机关报——《苏区工人》上发表了《安远县工人热烈拥护工会》《于都县工人斗争胜利》《南广县城市工人斗争的胜利》《兴国县扩大红军新的伟大成绩》《买公债——南广县超额预定数》等文章,介绍各地工人向不法老板作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况,报道了苏区工人在发展生产、节约支前、购买公债、扩大红军等活动中作出的成绩和典型事例。他还在《宁都职工委员长怠工腐化》一文中,严厉谴责了工人内部腐化变质的现象。为了纯洁工会组织,他坚决地清除了混入工会内部的不良分子。1933年5月1日,邓仲铭作为代表参加在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手工业工人代表大会,光荣地当选为全国手工业工会委员长。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了50万国民党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党中央决定在苏区开展“扩红突击月”活动。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阿金领导的党中央瑞金扩红突击队、罗荣桓领导的总政治部兴国扩红突击队、邓仲铭领导的全总执行局西江扩红突击队,因成绩突出被评为模范突击队,受到党中央的表扬,邓仲铭本人也被评为苏区“扩红模范”。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在授旗的时候,全场的空气兴奋极了,党中央代表项英同志手擎着旗子微笑地喊着瑞金、兴国、西江突击队的名字,于





是在四五千只眼睛的钦羡的注视下,3县突击队队长阿金、罗荣桓、邓仲铭接受旗子,会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3个突击队队长都脸红红的带着胜利地微笑把他们的奖品带回自己的代表团。”邓仲铭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劳动人民委员(相当于劳动部部长)。至此,邓仲铭不仅成为兴国县、赣南地区的劳工领袖,而且还成为全国工农群众及一切劳动者的领袖。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责任更大了,为人民求解放而奋斗终生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了。

1934年4月,王明实行错误的“左”倾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为了保存红军实力北上抗日,被迫放弃红色苏区,走上了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0月,邓仲铭随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出发,任第五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红五军团是全军的后卫,其主要任务是掩护中央红军突围。而邓仲铭所在的地方工作部,工作中心是保证全军团粮食供给。长征途中,由于沿途群众受到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蒙骗,给红军筹粮带来了极大困难。邓仲铭为解决部队给养问题,所到之处,不顾行军途中的劳顿,带领地方工作部的同志深入当地群众,向他们宣传红军为穷人大众谋解放的宗旨和解释党的北上抗日方针。通过耐心细致的宣传,解除了沿途群众对红军产生的疑虑,群众主动拿出收藏起来的粮食支援红军部队。邓仲铭在这种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总是保持着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出革命者大公无私、任劳任怨、先人后己、坚韧不拔的高尚品德。1935年8月,邓仲铭又被调到中央军委直属政治部民运部工作。尽管一路上战斗频繁,但他还是出色地完成了掩护红军突围的任务。10月,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劳动部部长。

1935年年底,党中央迁到瓦窑堡之后,干部休养连的指导员李坚真在邓颖超、蔡畅、刘群仙等同志的关心下,和邓仲铭在瓦窑堡举行了婚礼。

1936年3月底,中共中央委派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邓仲铭肩负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工作,并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办事处主任。1937年1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央安排一批工农干部入抗日军政大学深造。邓仲铭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聆听了毛泽东、张闻天、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同志讲课。1937年9月,党中央将陕甘宁边区工农政府正式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任边区政府主席。邓仲

铭学习期满后,被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兼工农厅厅长。他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致力发展边区生产,改善军民生活,通过减轻人民负担,废除旧的苛捐杂税,奖励手工业生产等方式,极大地调动了边区人民开展生产自救、共同抗日的积极性。短短的几年中,邓仲铭多次调换工作岗位,但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他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所到之处,深得同志们的好评。

1937年10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多方努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逐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蒋介石被迫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并达成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南方8省15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为了完成这支队伍的集中整编,开辟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和加强南方党的工作,党中央决定派曾山、邓仲铭、李坚真、罗梓明等同志到南方工作。邓仲铭和李坚真夫妇奉命一起南下,前往南方参加改编新四军的工作,并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邓仲铭一行于12月初离开延安,前往武汉。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移至江西南昌。邓仲铭随之到达南昌后,立即着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建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工作。此时,中共江西省委成立,邓仲铭任江西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同时还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由项英任书记,邓仲铭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民运部部长。1月底,邓仲铭受东南局的派遣,为完成新四军第二支队的组建任务,前往赣南、闽西。邓仲铭一行5人带着军费、电台、委任状乘车前往龙岩,在广昌停留住宿时,听说自称“国民党别动队”的王彩特在瑞金扣留了谭震林等同志。第二天,邓仲铭等人立即赶赴瑞金,代表新四军交涉,也遭到无理扣留。邓仲铭、谭震林对此进行了有礼有节的斗争,痛斥其破坏国共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对部队开赴抗日前线的倒行逆施。后经新四军军部抗议和中共中央交涉,王彩特才被迫将他们放行。谭震林、邓仲铭等先后抵达龙岩,协助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完成了新四军第二支队的组建工作,保证了第二支队按期奔赴江南抗日前线。其间,邓仲铭还成立了瑞金、赣州、吉安、龙岩等地的通讯处(留守处),组织抗日群众团体和抗日青年参加新四军的扩军运动。

1938年春夏,新四军第一、二支队主力挺进苏南,逐步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邓仲铭奉命前往江南工作。1939年1月,邓仲铭





抵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任中共皖南特委书记。他利用公开身份恢复和发展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建立了泾县、南陵、繁昌、青阳等县的中共组织。12月,中共苏皖区委成立,吴仲超、谭启龙、邓仲铭先后任书记。1940年2月,邓仲铭被派往苏南,先后任中共苏皖区委员会书记和苏南军政委员会书记等职。他协助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同志实现了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使苏南根据地成为新四军挺进苏北的桥梁。在他的领导下,苏南新四军主力和地方武装及不脱产的自卫队等发展到20多万人,为坚持敌后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0年夏,国民党顽固派一方面在苏南加紧军事进攻,企图把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赶出溧(阳)武(进)公路以南地区。另一方面,反动地方势力乘新四军主力北渡之机,策动刀会组织暴乱,制造了“横山事件”,武装侵入我江(宁)当(涂)溧(水)地区,缴我枪械,杀我干群。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邓仲铭以“发展革命的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机动、灵活地方式坚决执行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精神。他抓紧武装建设,放手发展新四军和地方武装,使主力部队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为坚持敌后斗争打下雄厚的群众基础。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注重对地方干部的培养,把他们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并让他们到一线去经受锻炼。同时,邓仲铭为进一步扩大抗日统一战线,针对刀会是苏南西部地区的一个特殊问题,应采取团结的方针,进行疏导工作,分别对待,争取其基层群众,中立其上层头子,孤立和打击极个别最反动的分子。邓仲铭还主持区党委制定了切实的措施,照顾刀会组织的经济利益,如不在其地区内收税等,因而逐步缓和了紧张关系,并争取了蒋永赓等刀会首领的中立。这为集中力量对付敌顽和坚持江当溧、江句溧地区的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1年1月,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邓仲铭非常气愤,立即布置各地党委做好接待、收留和安置工作,并交代一定要把这些同志安全护送到苏北。他还亲自检查设在闸口的交通总站,与特委同志详细研究护送的路线和方法。后来,经过这条交通线安全转移去苏北的就有200多名干部。7月底,陈毅同志根据党中央指示,顾全大局,率新四军主力过江进入江北敌后。而邓仲铭仍留守江南主持工作,与罗忠毅、廖海涛3人组成江南党、政、军委员会,

他任书记。在这期间,他组织有关方面草拟并正式颁布了《为坚持江南敌后抗战之纲领》,其中提出了“坚持江南抗日战争,驱除日寇出江南,驱除日寇出中国”,“结束一党专政与腐败的官僚统治,实行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抗战经济,改善民生,破坏敌伪一切经济”等项主张,号召“全江南人民本此方针,团结一致共同奋斗。”这一纲领的颁布,对于发展和巩固苏南抗日根据地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侵华日军也集中了三四千人的兵力,对句容茅山、江宁、溧水、当涂等新四军根据地发动了持续6个月的反复“扫荡”,使苏南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游击区域不断缩小,干部连续牺牲,部队大量减员。面对这种险恶环境,邓仲铭毫不畏惧,坚定地指出:“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坚持斗争,讲究策略,依靠群众,团结多数,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他及时召开区党委会议,对形势作出充分的分析,确定了“仍是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危机,争取利用顽伪,打击敌人,坚持巩固原有地区工作,开辟新地区,打通南北联系,充实主力,充实地方武装,巩固党,深入民众斗争”的方针,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斗志。邓仲铭在苏南工作3年多的时间,正值苏南敌后斗争最艰难险恶的时期,他领导苏南军民团结奋斗,百折不回,同甘苦,共患难,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至1943年6月,苏南敌后的形势开始好转,根据地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地的党政组织和抗日武装陆续恢复,新四军二支队及地方武装已发展到4500余人。

皖南事变后,苏皖区党委改为江南区党委,谭震林兼任书记,邓仲铭任副书记。1941年8月,邓仲铭随新四军第十八旅主力渡过长江进入苏中地区工作。1942年2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扩大会议在阜宁县单家巷召开,会议由刘少奇同志主持。邓仲铭在会上作题为《关于苏南工作情况》的汇报。对这一时期苏南地区在建立根据地过程中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各个时期的环境特点和工作方针、任务及实际工作情况”以及“对过去工作的检查”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肯定成绩,纠正错误,找出差距,分析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苏南今后斗争的估计,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8月初,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迎接新的斗争,区党委召开了苏南民运工作扩大会议,邓仲铭作了《组织群众与秋收问题》的报告。报告对过去苏南的环境、苏南民运发展的经过、苏南民运落后的原因、苏南斗争发展的规律、苏南今后情况的估计进行了检讨和总结,提出了今后苏南





群众工作的任务及具体措施。报告对促进苏南民运工作的开展、巩固,以及加强根据地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月,他被调入华中局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先任华中局民运部部长,是年年底,调任中共苏皖区委书记。

邓仲铭在苏南工作期间,非常重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他认为“提高党的战斗力,保证每个党员与干部都能一切为党,牺牲个人”的关键是“提高党性”。他采取办训练班的方式,组织区县以上干部学习,并亲自给学员作报告、上党课。为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觉悟与水平,还制订了教育党员干部的具体措施,“县级干部应以策略教育为主,区级干部应以工作教育为主,支部党员应以思想教育为主。”仅1940年,区党委就办了3期党训班,培训学员200余名。邓仲铭还特别强调各级领导要正确掌握党的政策和策略,坚决执行党的正确决议和指示。他对苏南的同志们说:“我们是长期处在敌伪顽夹击的斗争形势下,如果政策不能正确掌握,武装就不能发展,根据地就不能巩固,江南斗争就不能坚持。因此,全体党员,尤其是干部,必须加强对党的政策与策略的研究、学习……。”为了使各级党政军干部能及时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了解党的政策,邓仲铭十分重视报刊工作,尽管困难重重,苏南敌后仍然有东路的《大众报》、苏太常的《民报》、长溆的《太湖报》《长溆报》、茅山的《民众报》以及区党委办的《江南通讯》《青年团结》,部队办的《抗战报》《火线报》等十几种报刊坚持正常出版,较好地起到了党的喉舌作用。

1943年3月,邓仲铭在溧水县的蒋家小学主持召开了苏南各县县长联席会议,总结两年来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工作,讨论和制定了今后政府工作任务。通过了《苏南施政纲领》,会议选举江渭清、邓仲铭、李坚真等15人为行政委员,成立了苏南行政公署。江渭清任主任、邓仲铭任副主任。这期间他积极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发展地方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使苏南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4月,正当苏南地区准备进一步加强政权建设的时刻,以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第三十二集团军副司令员陶广为总指挥,调集了13个团的兵力向新四军驻溧水、溧阳的部队发起进攻,实行军事“围剿”。邓仲铭协助江渭清领导苏南军民奋起英勇反击,在曹山、苇蓬山一线将敌击退后,新四军十六旅主动转移到江宁县境青龙山、索墅、方山、龙都一带。6

月中旬,国民党顽固派又向我军发起第二次进攻,新四军为保存有生力量,驻溧水部队全部转移到溧武公路以北敌后活动。7月下旬,时任中共苏皖区党委副书记的邓仲铭率领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到江宁横山地区指导开展对敌工作。据邓仲铭夫人李坚真回忆:“8月3日,部队宿营于江宁县冯谭庆幸,准备迎击‘扫荡’之敌。因敌情变化,部队连夜转移,振询同志在渡秦淮河时不幸牺牲,终年39岁。”

邓仲铭不幸遇难的消息很快传遍苏南抗日根据地,人们都为苏南失去了一位好领导而悲痛,为我党失去了一位忠诚的战士而惋惜。几天后,江宁县军民在周岗乡绿杨村举行追悼会,由于当时敌情严重,追悼会原定规模较小,但各界代表还是纷纷前往吊唁,直至深夜。会场中挂了很多挽联,有苏皖领导机关的,有地委的、专署的,有本县、邻县的。1944年8月3日是邓仲铭牺牲一周年的纪念日,中共苏皖区党委、苏南行政公署在宜兴隆重举行追悼邓仲铭烈士大会,中共苏皖区党委书记、苏南行政公署主任江渭清代表区党委致悼词。

邓仲铭烈士的尸体翌日被打捞上岸安葬在龙都乡,1944年冬,迁葬于周岗乡绿杨村附近的猴山,1958年3月,又迁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1960年4月,江宁县人民委员会在墓前立碑。1981年8月,江宁县人民政府在今禄口街道黄桥社区邓仲铭烈士殉难处竖碑1座,上刻“邓仲铭同志殉难处”及碑文,同时在该处秦淮河上建“重民桥”1座。1983年3月,中共江宁县委、江宁县人民政府为纪念邓仲铭烈士牺牲40周年,决定在竹山公园的西北面半山腰处建“仲铭亭”,于7月竣工。8月3日,江苏省和江宁县在东山镇举行邓仲铭烈士纪念碑揭幕仪式,同时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等1000多名干部群众参加大会,充分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邓仲铭烈士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仲铭亭为六角形。高6.1米,跨度7.2米,占地面积为110平方米。亭檐口有江渭清所题“仲铭亭”匾额。亭中央有汉白玉纪念碑1座。碑座高0.7米、宽0.8米,碑身長1.1米、宽0.6米、厚0.6米。碑身正面镌刻着书法家武中奇题写的“邓仲铭烈士碑”6个大字,东、西、北三面用隶书刻着烈士生平以及简要事迹介绍。仲铭亭于1984年11月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被列为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2年被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列为南京市第三批党史教育基地。





郑维发 湖北省红安县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出生,自幼父母双亡,从童年起就在地主家中放牛做长工。1926年,郑维发即在家乡参加红军组织的赤卫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红四军第十一师排长、区警卫营三连连长,游击队队长。1937年调任红第二十八军政委兼军长高敬亭的警卫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支队连长、营参谋长、东乡区医院政委。1940年调入江苏省六合县(现为南京市六合区)工作,先后任县军事科副科长、马集区副区长兼区大队长,县总队副兼方山大队长。

1932年7月,国民党第89师“围剿”大别山红军创建的根据地,时任游击队长的郑维发率领游击队配合红军第二十五军在打鼓岭和敌激战1天,歼灭了大批敌人,缴获长短枪55支,机枪13挺。在以后的一次反“围剿”中,郑维发不幸被捕,敌人逼他交枪,供出同伴,他以带敌人找同伴为名,将敌人诱到一处20米多高的悬崖边,以宁死不屈的精神纵身跳下悬崖,虽幸免于难,但身负重伤,被当地群众发现救出。伤好后,归队继续与敌作战。

1942年5月下旬,盘踞在六合县马鞍山的日伪军100余人,在日军小队长田中率领下,越过屏山,窜至周营,大肆抢掠。时任马集区副区长兼任区大队长的郑维发刚好带领区队驻在周营东北面3华里左右的方大营,闻讯后即率区队100余人,在秦超领导的县教导队30余人配合下,痛击敌人。郑维发向以作战勇敢机智善谋闻名。他根据敌情,亲率2个排正面冲向敌人,派1个排从东屏山迂回侧击。正在周营抢掠的日伪军猝不及防,慌忙向屏山方向逃跑。一阵猛烈射击后,日军小队长田中和2名伪军当即倒地毙命,伪自卫团长赵连祥吓得昏迷不醒,尿尿直流,被人抬回后大病一场,寝食不安,最后辞去了伪自卫团长职务。从此以后,郑维发威名远扬,使驻在城周的日伪军闻之丧胆,再也不敢越过屏山。郑维发英勇善战的事迹被广为传颂。

1944年9月,中共浦六工委改建中共六合县委、六合县人民政府,郑维发调任县总队副兼方山大队长。使威震南北的浦六工委武工队如虎添翼,驻六城、瓜埠、东沟、横梁一带日伪军更加惶惶不可终日。

1945年1月11日,方山大队在郑维发亲自率领下,经过内线工作,一枪未鸣,全俘驻娄子庄伪自卫团王广元部和汪伪警卫第三师1个班计13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掷弹筒2具、步短枪100余支,扫清了新四军

第二师和第六师地下交通线的一个严重障碍。

1945年2月初,方山大队侦悉驻八百桥日伪军百余人将于5日这一天开往六合。郑维发决定亲率1个连在小项庄附近伏击敌人。狡猾的敌人怕在途中被新四军伏击,派伪军先走,另由日军和1部伪军在侧面秘密策应。当先行伪军进入伏击圈后,郑维发亲率1个排冲向敌人。这股敌人遭到突如其来的打击,纷纷瓦解、举枪投降,但侧面的日伪军刚好赶来。准备缴械投降的伪军又进行反扑,方山大队另两个排被敌人火力封锁,与郑维发所率的1个排隔开。郑维发率战士在包围圈中与敌人展开激战时,头部被子弹击中。身负重伤的郑维发面对险恶处境,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如何避免部队遭受过大损失。他一边指挥部队四面堵击敌人,一边命令留下1个班做掩护,2个班突围。2个班突围成功后,又命令留下来的1个班继续突围,自己单身掩护,并把身上装文件的皮包和驳壳枪交给已经负伤的警卫员孙玉玺带走。孙玉玺虽然负伤,但他的责任是不允许在战场上丢下首长。稍一犹豫,郑维发发现敌人从四面围攻上来,再不走,就突不出去了,于是对孙玉玺严厉地命令道:“快走!这是命令。”他边说边堵击敌人。弹不虚发的郑维发四周倒下一批日伪军,使敌人不敢轻易靠近他。他看见最后一个班和警卫员孙玉玺已经安全突围后,不觉松了一口气,就在这时,流血过多的郑维发昏倒在地,被赶来的敌人杀害,时年40岁。

郑维发英勇牺牲后,中共六合县委、县政府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悼念这位身经百战,多次负伤,最后为掩护部属而壮烈牺牲的老红军。马集人民闻讯后,请求将郑维发遗体安葬在马集黄岗(现黄岗村农科站),得到了县委的批准。1958年在郑维发墓地附近造一水库,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为了纪念这位老红军,将水库取名为郑洪水库。尖山烈士墓建立后,1979年春又将郑维发遗体迁到尖山烈士墓。

1982年10月,江苏省民政厅公布江苏省烈士名录,郑维发名列六合县烈士名录。



邵贤聚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出生在江宁县土桥镇上合村郑家边(现属淳化街道土桥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他8岁时开始在村上读了5年私塾。14岁时随父亲在汉口某杂货店学徒,后当店员。他为人憨厚本分,但个性十分刚强、直爽,由于忍受不了老板的欺压,邵贤聚一气



之下,回到南京。1932年至1936年,邵贤聚在南京做皮货生意。此后,他回乡结婚,买了几亩田,在家务农。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的暴行让邵贤聚内心极为愤恨,但却苦于报国无门。

1938年,新四军进入江宁后,在土桥乡一带发动群众抗日,邵贤聚意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抗日救国,才有出路。是年秋,他参加农抗会,并担任“递步哨”总指挥。

1939年,邵贤聚担任税务员,不仅负责在解放地区收税,还常常不顾个人安危,深入敌占区收税。他找到那里的富商士绅,向他们宣讲民族大义和抗日民主政府的税收政策,要求富商士绅们按期纳税,支援抗日。在邵贤聚的鼓动下,富商士绅们爱国热情高涨,纷纷主动交税,为抗日民主政府筹集了一定的经费。

1940年后,邵贤聚以党外人士身份担任副区长,并负责征收钱粮工作。其间,他的一条腿患上了痼疾,但他全然不顾,积极开展工作。在遭遇敌人袭击时,他勇于周旋拼斗,并常在群众掩护下化险为夷。

1941年,邵贤聚被任命为江宁县抗日民主政府索北区区长。当时,汤山据点的敌人妄图收买他。邵贤聚有个内侄叫汤世海,是上峰孟墓人,原是索北区区大队长,后叛变投敌,投奔在汤山伪自卫团团长金大贵部下。汤世海多次受命劝降邵贤聚,他在信中向邵贤聚许诺,若能反水过去,一供其儿子在汤山上学,二给其妻子住洋房,三给他连升三级。邵贤聚见信后,将信撕成碎片,还骂其内侄是个“混账”。敌人见劝降不成,打算用硬方法对付他。一次,汤山来了2个敌人,拿着枪闯进邵家,想威逼他投降。邵贤聚在敌人未进门之前,就听到外面有急骤的脚步声,他急中生智地作了对付的准备。当敌人进门后气势汹汹地威逼他投降时,邵贤聚一手拿枪,一手拿手榴弹说:“你们要是动手,咱们全部报销。”这2个敌人见势头不妙,吓得撒腿就跑。后来,敌人又陆续来信,辱骂他是新四军走狗,还恐吓他说:“你要当心,我们不会放过你的。”面对敌人多次威逼,邵贤聚岿然不动。敌人见软硬兼施都不成,恼羞成怒,每逢出来“扫荡”,都要去上合村捉拿他。抓不到人,就在邵家冲东贯西,其故居家中至今还保留被敌人劈坏门板的历史罪证。

其间,邵贤聚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做瓦解敌伪军的策应工作。当时驻索墅的伪警卫三师第一营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在共产党抗日民主政府的强大政治攻势和积极策动下,先后有三批100多名伪军携带各种武器向



新四军投诚。特别是第三批投诚的人数最多,共 80 余人。当天,由伪连长带领全副武装的伪军,冒雨前去投诚,其中有一伪军副连长思想动摇,想要回去,这位伪连长怕动摇军心,当场将他击毙。邵贤聚此次在负责接应中,十分注意策略,他一边派人准备办饭弄菜,一边乔装老百姓在一旁察看动静。当他看到投诚的伪军将身边枪支乱放,举止大方,不似诈降,才表明身份与伪军连长交谈。他亲自倒茶拿烟,热情接待,同时宣讲抗日救国,不做亡国奴的道理。并进一步向他们交代党对投诚人员的方针政策是“只要肯弃暗投明,不管什么人,我们都给予保护和优待,愿意留在新四军中服役的,我们欢迎;在敌伪军担任什么职务的,过来时仍干原职;不愿留在军中服役的,也不勉强,每人发 2 块钱路费,送其回家。”伪军听后甚为感动,表示都愿从军,不愿回家。当夜,虬山根据地老二营派员来接领这批人,后来这支队伍被编入新四军主力部队。

1942 年 1 月,索墅区政府成立,邵贤聚任区长。7 月,索墅区并入索北区,他仍任区长。其间,邵贤聚积极发展地方武装,领导开展抗日斗争活动,并进一步做好对敌伪军艰苦细致的瓦解工作。曾驻汤山的伪军排长李勇有些爱国思想,他知道后,就动员李勇的熟人去劝说,自己也亲自找李勇分析利害,指明前途,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启发李勇为国立功。在他的努力劝说下,李勇转变了立场,率部持械投诚,给了汤山敌人很大打击。

1942 年 8 月的一天,邵贤聚在上峰乡茅山庙里召开各乡、村长会议。不料开会之前,汉奸伪保长贾定元已去汤山告密,把开会的时间、地点全告诉了敌人。当天上午,汤山去了 100 多名便衣队,分几路向会场包抄过去。警卫员发现这些形迹可疑的人时,立即报告。邵贤聚当即宣布散会,命令迅速撤离。敌人为了向日军请功领赏,企图活捉邵贤聚,一边朝天放枪,一边喊投降不杀。邵贤聚为掩护人员突围,奋勇抵御敌人,且战且退,使其战友安全转移,但由于他腿有残疾,行动不便,最后被敌人包围,英勇牺牲。

漆承宏 安徽省金寨县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出生。1928 年,漆承宏毅然投身革命,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被分配在红军南溪医院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 3 月,漆承宏调任红军第七十三师营长,为扩大红军武装,党组织派他回原籍,宣传发动群众起来参加革命。



他回乡后,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使广大劳苦大众认识到要翻身求解放,只有跟共产党干革命,很快就有12名青年参加了红军。在他的宣传鼓动下,很多群众参加了5月在金寨县爆发的立夏节起义。同年8月,漆承宏被提升为红军营长。后漆承宏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漆承宏随新四军第五支队做供给工作,1939年7月到第五支队机关工作,进军淮南津浦路东。1940年8月调任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独立第二团副参谋长,在天长、六合、仪征、扬州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1940年11月,驻天长日伪军500余人窜到六合的四合墩、东王庙一带“扫荡”,枪杀无辜群众,这时驻东王庙附近任家老庄整训的独立第二团,为了粉碎敌人“扫荡”,掩护群众转移,当即决定阻击敌人。漆承宏在指挥第七连正面阻击向东王庙方向进犯的日伪军,与日伪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其他连队由南至北压向日伪军。在新四军顽强阻击下,日伪军力竭不支,施放毒气后溃逃。漆承宏在指挥第七连正面阻击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2岁。他的遗体被安葬在马集街西的一座坟地里,2013年3月迁移至桂子山烈士陵园。

1982年10月,江苏省民政厅公布江苏省烈士名录,漆承宏名列六合县烈士名录。

徐润芝 原名传富,又名刃,江苏省六合县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出生。徐润芝童年在仪征万年桥小学读书,后考入南京中学、栖霞师范。在南京中学和栖霞师范时,开始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先后参加过1923年南京各界举行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旅顺、大连,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游行,各校举行的“国耻游行”及1925年6月南京各界民众数万人援声上海“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他以优异成绩从栖霞师范毕业后,即返回故里从事教育工作。先在六合东沟同善社小学(现东沟小学前身)任教,1934年又在东沟陈堡桥创办小学,陈堡桥乡国民党乡长为了安排亲信,曾阻止徐润芝在那里办学,徐润芝力排众议,利用延寿庵做教室,并用自家的树木打了30多套桌椅,亲自任教,为贫苦农民的子女入学提供方便。1936年秋徐润芝到阜宁县教育局任职。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徐润芝返回故里。12月中旬,六合、仪征相继沦陷。日军到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而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及当地的土匪流氓,横行乡里,广大乡村民不聊生。徐润芝自发组织联庄会,

后来发展为抗日游击队,约定遇有匪警,即鸣锣为号,各保负责人就带领壮丁持枪去打土匪。是年腊月的一个雪天,土匪丁家祥等一伙 10 多人在老虎洼作案,徐润芝带着 30 多人去打,经过激战,十几个匪徒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活捉,并缴获长枪 4 支。回来途中,枪被国民党乡长王鹿鸣劫去。徐润芝发动群众同王展开说理斗争,迫使王把枪交还。1938 年春,土匪杨小六子等 10 多人带着武器,窜到徐营,准备抢劫徐长有家财物。徐润芝闻讯,把自己小孩安排在地洞里后,便到庄东头鸣枪阻击,同联庄会员一起把土匪赶跑。第 3 天又与徐长发、周宗昌等人到九龙墩处决了土匪杨小六子,接着到秦家洼枪毙了土匪秦立明,经过对匪徒的惩治,遂使地方稍安。后又先后消灭了以丁家祥、杨小文为首的两伙杀人越货鱼肉乡里的土匪,还带领 20 多名联庄会员,在大河口摆渡伏击一艘从六合开来的日军汽艇,毙伤日军 6 名。

1938 年夏初,徐润芝和仪征、六合爱国青年余雷(现名余磊)、费放天、卞竞武、孙坚、李刚等组织抗日救国青年团(以下简称抗救团),在仪征天宁寺举行理事会,选举李刚、余雷为正副理事长,徐润芝、卞竞武等 9 人为常任理事。并拟定章程,确定以“唤起全国同胞,团结起来,抗日救国”为“抗救团”的宗旨。“抗救团”下属武装改称“仪六边区游击队”。为了宣传抗日主张,唤起民众,还创办了《仪征青年》刊物,先后发行 15 期,同时印刷抗日传单,到处张贴散发,徐润芝经常撰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1939 年春,徐润芝等“抗救团”抗日活动,受到群众的拥护、爱戴,却遭到仪征联庄会总头目、大地主侯香远及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领导的忠义救国军南京行动总队的排挤和威胁。1939 年夏秋,新四军挺进津浦路东,徐润芝等闻讯欣喜万分,决定投奔共产党、新四军。先后派费放天、余雷、卞竞武、张桂民、赵玉寿等人到皖南泾县及江都大桥两地找到了新四军。新四军派遣石磊、程仲英、孙实、许思潮等到仪征,帮助“抗救团”开展工作。当年秋冬,新四军第五支队、苏皖支队相继进入六合和仪征,新四军又派周爱民到“抗救团”指导工作。“抗救团”在谢集南面的一个庄上召开了全体成员会议,修改章程,改“抗救团”为“天六仪扬边区青年抗敌协会”(所属游击队名为天六仪扬边区游击队),选举了正副主任和 13 名委员,徐润芝被推选为委员兼军事股长。并在东沟、樊集、十二圩、仪城等地成立分会(徐润芝曾任东沟乡会负责人)。“抗敌协会”明确提出“开





展江北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江北民主根据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等主张。不久将 100 余人的天六仪扬边区游击队改称为江北人民抗日义勇军,余雷为总队长,徐润芝为副总队长,总队设在樊集,下设东沟、九里 2 个大队。

1940 年 1 月,“江北人民抗日义勇军”经整顿后编入苏皖支队。4 月,仪征抗日民主政府在月塘集成立后,徐润芝被留在地方工作,任仪征县第四区第一任区长。未及到职,党组织就派其同余雷、万佰川、卞竞武等共赴天长汉涧“新四军江北指挥队民抗日军事政治干校”学习 6 个多月,回到仪征后,因四区区长已由魏然担任,他改任四区副区长兼江防大队长。这时日伪军已在大河口附近的林摆渡、赵家坝、火星庙建立据点,家住仪征三十里堡侯家营的大地主侯香远已公开投靠日伪,使四区腹背皆受敌人威胁。一次,伪自卫团长侯香远写信威胁他,叫他不要当新四军的区长,否则就要给他颜色看,徐润芝不畏恐吓,与之进行斗争。侯派伪军陈守汉带人抓徐润芝的儿子,徐润芝事先得到消息把孩子转移别处,使敌人扑了空。侯又要派人来拆毁徐润芝家的住房,徐润芝事先请了几个邻居帮助拆掉 5 间房屋(2 间大房,3 间厢房),把木料藏到别处(卖掉一部分),敌人又没有捞到好处。

1940 年年底,他把刚入伍的 20 多名新战士,集中到高庄(现在的南五大队)办学习班,以自家出租土地剥削农民的事实,讲解反对封建制度的道理,提高新战士的阶级觉悟。据当时听徐润芝讲课的区队战士陈天朝回忆说:徐润芝讲课很生动,说得很有道理,我们听得也很入神。革命斗争虽然艰苦,大家情绪却很高,都愿意跟着他干。

1941 年春,日伪军开始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并采取蚕食政策,在仪征侯家营和六合的东沟、瓜埠、横梁、娄子等地建立据点,分割抗日根据地,斗争环境十分险恶。徐润芝和区里主要领导人一起,机智勇敢地领导区队,到敌后的长江边龙袍、玉带地区开展小规模的游击活动。他英勇善战,经常深入虎穴,打击敌人,日伪军称他为“徐老虎”。一次,他带领独立第四团夜袭龙袍大蒋庄伪自卫团,遇到内河阻道,即与另外 2 人涉水渡河,找来小船把部队渡过去,一举捣毁伪军团部和林摆渡、赵坝、火星庙等 3 个伪军据点,活捉伪自卫团长王广元等人,缴获 50 多只枪。王广元经过教育,同他约法三章,警告后以不得妨碍抗日活动。一天晚上,徐润芝又带着警卫员苏松华等人,乘黑摸到划子口王广元部伪军据点,翻墙入

内,一枪未发,俘获1个班的伪军。他还和区里主要领导人一起,率领区队配合部队三打仪征侯家营日伪军据点。该据点伪军头子侯香远,原是23个乡联庄会的总会长,后勾结日伪当上伪四区自卫团总团长,手下有200多人。他们在侯家营修碉堡、挖水沟、拉铁丝网,建立据点,与新四军为敌。区队第1次于2月底去打未打开;第2次配合独立第二团打,又未打下;第3次于冬天配合独立第四团去攻,终于拔除了这个据点,从而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

仪征的胥浦桥和六合县的东沟沿江边的大河口、沙窝子等地,是中共上海地下党、江南新四军与江北新四军、津浦路东区党委来往的地下交通线,为确保这条地下交通线安全畅通,徐润芝经常深入这一带,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教育和争取伪职人员。胥浦的伪自卫团副团长余定濯,经过徐润芝的教育和争取,带枪向新四军投诚。徐润芝根据余定濯提供的驻十二圩日伪据点兵力部署情况,率江防大队配合独立第四团拔掉了这个日伪据点,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50余支。

1942年2月,曾参加过伪军的陈子文反正后任民主政府的税务员,但贼心不死,又携带长短枪5支投敌。徐润芝根据县委决定,决心活捉叛徒陈子文。他通过“两面派”伪乡、保长陈伟才、孙立荃等人的关系诱出陈子文,陈于2月18日到东沟一带的大唐庄陈长庆家去敲诈(陈家刚卖了2头肥猪)。是日天亮前,徐润芝就率领区队20多人到达大唐庄,随身带了5名战士隐蔽在陈家一、二道门后面,其余10余名战士伏在附近的张窑白马山作掩护。早饭后,陈子文和伪军叶大洲(伪团长王广元警卫员)果然来了,当陈子文跨进二道门槛时,埋伏在门后面的徐润芝跃身而出,大喝一声“不许动,抓活的”,一把抱住陈子文。不料,陈子文的身子虽被抱住,他却扣响了插在大衣口袋里的手枪,子弹打伤了徐润芝右膝盖骨,陈趁机逃出门外,被区队战士当场击毙,叶大洲被活捉(后被新四军镇压)。战士们背着负伤的徐润芝撤走时,原准备去李洼锯树的一股日伪军路过大唐庄,听到枪声立即包围过来,徐润芝当即决定分散撤退,命令区队3名战士押着叶大洲向白马山方向突围,留警卫员徐善立、苏松华背着他从大唐庄后面突围。刚走到房后面竹园沟时敌人蜂拥而来,徐润芝情知敌众我寡,自己难以脱身,唯恐连累2个警卫员,他果断命令:“你们快走,将我留下!”2个警卫员坚决不从,背徐润芝的苏松华哭着说:“区长,我们要死死在一起,要活也活在一起。”徐润芝从他背上强行挣扎下





来,声色俱厉地说:“革命者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决不要作无谓牺牲,多保留一个人,革命就多一份力量,执行命令,你们快走!”2个警卫员在白马山上区队的掩护下脱离了险境,而徐润芝则不幸被俘。

徐润芝被日伪军抬到东沟后,开始日军还不明他身份,由于伪乡长丁林河告密,日军才知道他就是威震敌胆的“徐老虎”,如获至宝,随即带到日军据点小崔庄关押。

徐润芝被俘后,新四军两次派人去东沟通过伪自卫团长王广元营救(王曾被新四军俘虏由徐润芝出面保释)。但徐润芝是被日军关押,王广元无法插手。开始日军企图在徐润芝口中得到情报,百般诱降不成,就施加种种酷刑。徐润芝大义凛然地说:“抗日战士视死如归,不成功便成仁,决不卖国求荣,你们想从我嘴里得到情报,完全是白费心机。”并绝食拒医。日军见徐润芝软硬不吃就将他杀害。王广元十分害怕新四军加罪于他,将烈士遗体用棺木装殓,派人送到东沟北街沈桥,交新四军安葬,并写一封信给新四军谎称“徐润芝性烈,在关押中自己撞墙而死。”

徐润芝不幸牺牲,抗日军民无不悲恸。中共仪征县委、县政府在骆张为徐润芝烈士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参加追悼大会会有县、区、乡和各界代表人士 500 多人。追悼大会由县长陈雨田主持,四区区长魏然致悼词。县政府为表彰徐润芝烈士英勇斗争精神,将当时陈堡乡改称润芝乡。烈士遗体安葬在张家洼,1985 年春后移小茅山脚下,墓前树立徐润芝烈士墓碑,供人瞻仰凭吊。

1982 年 10 月,江苏省民政厅公布江苏省烈士名录,徐润芝名列六合县烈士名录中。

程一惠 清宣统二年(1910 年)出生在江西省新建县大塘乡土库(现属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一户贫农家庭。家中有兄弟 4 人,他排行第二。程一惠自幼聪明活泼,兴趣广泛,尤其偏爱文艺戏曲。

1929 年,19 岁的程一惠考入省立南昌乡村师范学校。1932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考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1935 年,华北事变发生,正逢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他对国民党政府制定不抵抗的投降政策切齿痛恨,深感亡国之忧。程一惠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和发动的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发出了停止内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呼声。1936 年,江西在北平的大学生,接办江西会馆创建的豫章中学,程一惠被推荐为该

校的教导主任。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面对国将破、人将亡的严峻形势,程一惠悲愤填膺,他与江西会馆豫章中学的同乡青年学生熊德基等数十人组织参与北平学生南下救亡团,并于1938年春在汉口和南昌等地秘密发动和领导抗日救亡活动。在南昌期间,程一惠以江西省民众教育馆作掩护,加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战时青年工作团”,他任总干事。其间,程一惠积极组织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大力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并亲自登台演唱《流亡三部曲》。同时,他还不断地接受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为革命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1938年,程一惠在南昌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为民族解放事业,迈出了更加坚定的步伐。他和熊德基等人在南昌百花洲省图书馆内创办《大众日报》,开辟专栏,着重报道新四军的抗战成果。他经常发表有关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文章,利用这块没有硝烟的舆论阵地,坚决谴责,无情地打击敌人。

1939年,程一惠由组织调遣到皖南参加新四军,不久又被调到苏皖区党委组织部任副部长。1940年8月初,江宁横山一带的敌伪顽相互勾结,乘新四军主力撤出之际,唆使和操纵大刀会进行反革命暴乱,制造了血腥的“横山事件”。这次事件之后,横山地区一片白色恐怖,新四军暂时退出横山,中共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转入地下活动,地方武装力量受到很大损失,抗日活动也陷于停顿。10月,程一惠受苏皖区党委派遣至江宁、句容、横山地区的中共江当溧句中心县委工作,并坐镇指挥,帮助第三游击区秘密开展恢复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同月派出汪大铭、费明龙进入横山恢复党组织未成,汪大铭脱险回到中心县委,费明龙被捕牺牲。11月,中心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程一惠、钟国楚、王一凡、陈辛、夏定才等同志,研究横山地区的恢复和开展工作,并再次决定委派陆仁毅(化名纪涛)、吉惠兰为横山地区特派员,负责恢复横山地下党组织。同时负责摸清统战对象情况及群众的思想状况,并注意利用职业掩护,建立政治交通等任务。

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后,苏南皖区党委于1月22日在周岗(广严寺)附近召开区党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邓仲铭、罗忠毅、廖海涛、钟国楚、程一惠、欧阳惠林等。会上决定:新四军主力第二支队司令部带领新四团由江句地区转移到溧武路以南溧阳地区活动;留下的人员以中共





苏皖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程一惠为首,加上欧阳惠林、王一凡2人组成苏皖区党委组织委员会,率新四团特务队在土桥西北的插花庙和句北地区活动,负责联系指导二、三游击区的工作和斗争。这样决定,一方面可以打通和淮南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联系,继续收容皖南军部撤出的人员,把他们护送过江;另一方面立足于这个地区,可以开辟京沪沿线城市和日伪据点的工作,建立秘密交通点。1月26日,程一惠等3人小组率特务队越黄梅桥、新塘之间的京杭国道进入句北地区,在二、三游击区作大范围的迂回行动。但28日发生了特务队队长朱者赤率被裹胁的战士逃跑叛变事件。面对当时复杂的处境,程一惠当机立断,决定一部分人坚持打游击,另一部分人打入京沪沿线各据点,转入城市地区工作,程一惠则继续留在当地活动。

1941年2月8日晚,程一惠住在汤山东北五六里的一个伪甲长家里。由于伪保长告密,9日清晨,汤山作厂日军特工队和伪军突然包围了村子,程一惠被捕。被捕后,敌人扒光他的衣服,放在雪地里冻,让狼狗咬,并将他的络腮胡子一把一把地硬拔下来。程一惠在酷刑之下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最后惨遭日军杀害,时年32岁。

陈宗胜 湖北省礼山(今大悟)县人,清宣统三年(1911年)出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红军第二十五军便衣队任战士、班长,鄂东北独立团手枪队任政治指导员,红军第二十八军手枪团一、二中队队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第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他历任连长、营长、淮南抗日游击队参谋长。1942年任新四军第五支队第八团副团长,同年调任第二师第五旅第十三团副团长。在手枪队里,他经常只身深入敌巢,打击敌人,是一位身经百战,屡立战功的红军战士。

陈宗胜是著名的桂子山战斗的主要指挥员之一。1943年8月,进驻六合县四合、东王庙一带保卫秋收的第五旅第十三团,与侵犯六合八百桥的日军小田大队及六合伪军600余人在桂子山展开激战。当时一营营长和教导员发症疾病住院,不能指挥战斗,陈宗胜和政治处副主任李秉初奉命到第一营分别代理营长和政治教导员指挥战斗,当日伪军攻占桂子山后,陈宗胜身先士卒,带领突击队从正面向日伪军压过去,从中间切断日伪军,战至夜23时,终将日伪军击退。在反复争夺阵地的激战中,陈宗胜

不幸中弹牺牲,时年 32 岁。烈士遗体当时先安葬在四合观音山,1956 年 3 月后移葬于桂子山烈士陵园。

1982 年 10 月,江苏省民政厅公布江苏省烈士名录,陈宗胜名列六合县烈士名录中。

夏定才 1912 年出生于浙江省奉化县(今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县)。1937 年以前,夏定才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领导下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了一个“救亡人员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人员主要是学生与职业界救国会的一批进步青年,夏定才经由职业界救国会派去工作,当时他已是共产党员。是年 11 月,救亡训练班分散,夏定才组织其中的十几名同志成立战地服务团,去浦东钱亦石那里工作(钱是中共党员,时任张发奎部副总指挥)。

1938 年 1 月,夏定才参加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6 月,新四军先遣支队离开濮塘后,夏定才作为民运干部被派到十七、十八村(即濮塘、杜塘、霍里一带),组织开展抗日活动。他经常利用晚上时间走村串户,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组织起来闹翻身求解放的道理。他深入群众,教育群众,许多话讲到穷人的心坎里,由此,在群众中扎下根来,为下一步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各项抗日活动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夏定才的艰苦努力下,濮塘一带的民运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地方党组织和群众抗日团体纷纷建立起来。1938 年 7 月,濮塘农民抗敌协会成立;9 月,中共濮塘支部诞生。与此同时,濮塘乡农会、经济委员会、动员委员会、青年抗敌协会、妇女抗敌协会等也相继建立。

夏定才与战地服务团成员潘田在濮塘组织乡农抗会,会员有薛德英、赵光辉、薛永太、陈树生、李安则、邱奇才、薛永清、吴学礼、薛中林,薛德英为农会主任。通过农会开展减租减息,动员人民抗日,发动青年参加新四军,妇女为新四军做鞋等工作。他们还以濮塘为中心,成立了妇抗会、青抗会等群众抗日组织。他们走家串户、走村串乡,常通过开大会的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还按自然村分班,将 18 岁到 45 岁的男子组织起来,成立民兵,开展军事训练,并从中选出骨干,组织成立抗日预备队。维持地方治安,把守要道路口,盘查形迹可疑之人,担任递步哨,密切注意日军动向,传递情报。





1938年7月,夏定才被派到刘一鸿的民间抗日自卫队做政治工作,民间抗日自卫队不久被改编为“苏皖边区抗日自卫大队”,刘一鸿任队长。其间,夏定才在横山一带组织发动群众,成立小丹阳镇抗日动员委员会,并担任指导员。这支队伍在新四军的帮助下,政治、军事素质不断提高,经常配合新四军开展对敌斗争。他们一夜扒掉从姚家寨至潘村的铁路2公里多,使日军运输矿石的线路瘫痪。自卫大队侦察到日军护路队队长李保太的行踪后,按照夏定才、潘田和三团郑营长研究的方案,派向导去黄陂村,惩办了李保太,为地方除掉一害。“黄庄事件”发生后,夏定才、潘田和三团同志一道,为黄庄死难的同胞掩埋尸体、给受难的百姓发衣发粮,搭建临时窝棚。又和村民一起搞生产自救,并补偿群众部分损失,号召群众为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至此,濮塘地区成为敌人重点对付的地区,为避敌锋芒,夏定才离开了濮塘地区,并一直在横山地区从事革命斗争和领导抗日活动。

1939年7月,中共江当溧县委成立,夏定才任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是年冬,以小丹阳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为基础,组建成立“新编第二连”,夏定才担任政治指导员。1940年1月28日,夏定才率领新二连夜袭凹山伪警察局,击毙日、伪军5人,俘30余人,缴获长短枪30余支。

1940年3月,夏定才接任中共江当溧县委书记。同时,根据上级党委确定的“扩大抗日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工作任务的指示精神,积极筹建统一战线的半政权性质的组织——江当溧抗敌委员会(简称“三县联抗会”)。是年春,“三县联抗会”在铜山乡溧塘村周铭熙家中召开成立大会,夏定才兼任组织部长。6月,任江当溧三县抗敌自卫委员会副主任。7月,任江当边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指导员。

1940年8月“横山事件”发生后,夏定才随同部队突围,撤出江当溧到了江溧句地区。是年12月,江当溧、江溧句两个抗敌自卫委员会合并,成立代理政权机构——江当溧句四县抗敌国民总会,夏定才任主任。夏定才到横山地区后,在发动与组织群众、建党、扩军和对敌斗争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1年8月,江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夏定才被任命为第一任县长。9月15日,夏定才到湖熟镇丹桂乡附近李家巷汪伪乡长李文龙家召集伪乡保长开会。意在为新建立的江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宣传路线、方针和政策,争取两面派乡保长多为抗日出力。不料此事被汪伪特务侦知告

密,伪句容四区自卫团当即派兵包围李家巷,夏定才因撤退不及时被捕。敌人将他作为要犯押到句容县城。日军警备队以句容县看守所关押不严为由,特地将他押到日军警备队去审讯。夏定才受尽日军警备队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一言不吐,敌人无计可施,将夏定才杀害。

夏定才牺牲后,日伪将他的遗体钉在句容县城墙上,并写上大幅标语“这是共产党县长的下场”,用以恐吓革命人民。夏定才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更加激励了横山人民的抗日斗志,他们踏着烈士的血迹,越战越强,直到把侵略者彻底消灭。

杨 希 1912年出生于南京市。父亲杨庆松是江苏省邮政管理局的夜班门卫,哥哥杨忠禄在南京市邮政局任投递员。杨希原名杨忠财,参加革命后改名杨仲才、杨怀仁,后又改为杨曦、杨希。在杨希少年时代,贫困和疾病就先后夺走了他父母的生命,他只得跟兄嫂一块生活。杨希升入初中不久,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南京沦陷前,他随嫂嫂和2个侄女,离乡背井,逃往苏北避难。

1938年春天,全家又从苏北迁至宜兴周铁桥亲戚处住下,杨希赴彭城中学读书。他在校学习勤奋,成绩优良,并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深得老师的喜爱和同学的敬佩;回家以后主动帮助嫂嫂处理家务,照看侄女,得到邻里夸赞。

1939年,18岁的杨希迫切要求投身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中去。当时,彭城中学有些师生已先后离校,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给他很大启发和影响。他得知学校的凌老师与在张渚活动的青年抗日救亡工作团(简称青工团)有联系,便多次登门要求参加这个抗日组织。

1940年年初,经凌老师介绍,他终于去张渚参加了青工团。临行告别时,亲戚和邻居问杨希怎么舍得离家,他回答说:“天下这么大,哪里都是家!”表现了立志为国的宽广胸怀和献身抗日的坚定信念。

杨希参加青工团后,在青工团中共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中去。他和任保璞(青工团长)、任鸿儒、任燮臣、沈莹等青工团同志在张渚一带登台演出《麒麟寨》《魔窟》《反正》《送郎上战场》等进步话剧,宣传抗日,反对投降,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的阴谋;与同伴组织青年歌咏队演唱《松花江上》《热血》《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等





抗日歌曲,激励青年走抗日革命道路;和战友不分昼夜编印、散发宣传刊物,对人民进行抗日宣传鼓动;冒着生命危险到敌据点附近村庄登台演讲,启迪群众的爱国激情。敌机轰炸张渚时,他协助团长任保璞组织担架,进行抢救,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当他获悉日军向张渚进攻的消息,与同志们一道星夜通知各家住户转移。青工团在张渚地下党领导下,抗日宣传活动搞得生气勃勃,他也在抗日斗争中锻炼成长,成为青工团活跃的一员。经过青工团地下党支部的培养和考察,1940年下半年,杨希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工团在宜兴张渚地区进行的一系列抗日宣传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江南军政机关的注意。江南行署主任冷欣赶到张渚,声称青工团有异党活动,指使其爪牙对青工团要限制、取缔,并欲逮捕青工团人员。

1941年皖南事变后,张渚形势日趋险恶,青工团遭严密监视,青工团活动大受限制。张渚地下党为了保护这批抗日革命力量,指示青工团内党员分批撤离张渚,转移到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去。杨希于1941年4月最后一批撤出。同年5月,他被分配到锡宜武三县行政委员会担任民运工作队队长,率领民运工作队员做宣传、发动、组织群众的工作。1942年1月,入苏皖特委举办的党训班学习并担任党训班班长。

1942年上半年,杨希从党训班学习结束,被分配到溧水县民运工作队,初任副队长,后任队长。在中共溧水县委领导下,他带领民运工作队员,在溧水新桥、白马、韩胡、蒲塘等区发动民众,组织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抗日群众团体,配合溧水县民主政府开展春荒借粮、减租减息、增加雇工工资、参军扩武等群众运动,经过实际斗争的培养考察,他介绍积极分子张友松、扶元银等加入了党的组织,壮大了党的队伍。他对韩胡区一些青年知识分子说:“国民党一心反共,置民族存亡于不顾,新四军则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启发教育青年们要坚持抗日方向。由于杨希工作积极热情,以身作则,民运工作干得出色,任务完成很好,受到领导的表扬。在搞民运工作的日日夜夜,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当时溧水县民主政府所辖4区的各个村庄。他的宣传演讲、歌声和勤奋工作的精神,给同志们和当地群众留下了“活泼、热情、勇敢、能干”的深刻印象。在抗日斗争中,他的组织能力,领导才干不断增长,21岁就被上级组织提拔为溧水县委青年部部长。

1943年4月,国民党第三战区调遣12个团的兵力向我苏皖区党委机

关和十六旅旅部驻地溧水中心区发动进攻,企图一举围歼苏南新四军十六旅主力,将新四军赶出江南,制造又一次“皖南事变”。新四军奋勇阻击,在大量消耗顽固派军队有生力量,取得战斗胜利后,为照顾大局,团结抗战,主力部队主动转移分散到溧水周围地区活动,区党委机关也撤出了溧水地区。顽军占领溧水中心区后,实行军事“清剿”,溧水形势险恶,斗争更加复杂。区党委走前决定,部分溧水县、区及民运工作干部随区党委机关一同撤离溧水,选定少数精干力量留下坚持斗争。担任县委青年部长的杨希,根据县委分工留在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夹击的前沿地带白马区和韩胡区的毗邻地区坚持斗争。任务是向溧水城边敌伪地区发展,做敌伪军工作。

1943年7月,坚持原地斗争的韩胡区长邹毅和蒲塘区长任重2人牺牲于老虎庄。杨希同志面对险境,毫不畏惧,不仅坚持原地斗争,而且积极向溧水城边开拓,开展敌伪军工作。

8月20日,他只身到韩胡村与诡称准备拉出一些人枪投诚新四军的溧水日军特务队长杨瑛谈判。杨瑛先派便衣王士英前来,企图诱使杨希到严笕里村加以杀害。杨希坚持在韩胡村谈判,王士英返回严笕里。不久杨瑛在王士英的护卫下来到韩胡村,暗中指使随随便衣李立金、李兴隆持枪尾随。在杨瑛假意同杨希谈判的时候,2个匪徒突然闯入,拔出手枪企图挟持杨希。杨希面对敌人,据理力争,毫无惧色。狡猾凶狠的汉奸杨瑛见状从背后连发2枪,杨希当即倒在血泊中,年仅22岁。

杨希为国捐躯的消息传出以后,邻近各村群众和党员干部,无不为之痛惜,甚至失声痛哭。傍晚,地方党组织动员农民群众丁成祥、许玉根、史振东等人,不顾生命危险,到韩胡村将烈士遗体抬到尹家边村备棺成殓,安葬于村前螺髻山西侧,让英雄安卧在山麓高坡上。溧水韩胡村地区的群众几十年来始终没有忘记他。新中国成立后,每到清明节日,学校的师生,当地的群众,附近的乡村干部,都要列队来到烈士墓前,敬献一只花圈,添上一杯黄土,默默地悼念,深情地表达着溧水人民对杨希烈士的敬意和思念!

高颂章 字承焕,1914年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县新塍高家桥(现属浙江省嘉兴市高照乡高家桥自然村)一个书香之族的清贫家庭。他幼年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清贫的生活,促使他早熟懂事,养成了吃苦耐劳





的优良品质和勤奋好学的良好习惯。在族人和亲友的资助下,他曾在村里一所私塾就读。

1929年,高颂章因生活所迫,辍学外出谋生,来到潮州市骆驼桥堍大成纸号,开始了学徒店员的生活。学徒生活十分艰苦,他每天黎明即起,打扫店堂、洗抹桌案,帮老板做家务,还要留心学习业师买卖业务和操作技术。其间,他阅读了《新生》《太白》《生活》等多种书报杂志,眼界逐步开阔,在这些书刊的影响下,他开始追求进步,同情劳苦大众,憎恨旧社会。他还常在当地报刊发表针砭时弊的短文。

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货大量倾销国内市场,各地爱国志士群起抵制。高颂章所在的大成纸号老板,利欲熏心,想进一批日货在市上销售。此事被高颂章得知,他极力反对,陈析利害,进行谏阻。后在他的多方阻挠下,使得店方经销日货的计划化为泡影。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后,高颂章的抗日热情更为高涨。他常与邻居好友谈论国事,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镇压抗日救亡运动的反动政策。他的这些举动,颇得同事的赞扬和业师的褒奖。

1934年,高颂章与同乡爱国青年宋铭心等,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与中共上海地下党、上海救国联合会领导人章乃器、邹韬奋等人士取得联系。他还经常与王亚平、臧克家、黄浦芳、叶紫等名士通信,在他们的鼓励和帮助下,高颂章参加了“中国诗歌会吴兴分会”。他勤奋笔耕,用诗歌表现城市青年的心态,反映一代有个性、有探索精神的青年的心路历程。他擅长白话诗,诗作风格别致。作品曾刊登在《湖州日报》诗歌专刊上。此后,高颂章又得到上海地下党员王达仁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他积极自筹资金,物色人选,并邀集江岳浪、陆冠英等同志,创办了《野烽》杂志。他们在这个刊物上挥笔疾书,激扬文字,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刊物向湖州、上海、杭州等地发行。

1936年西安事变后,高颂章除写文章外,还经常到湖州郊区采访农民、筑路工人,与他们交朋友,有时还到湖州教育馆去进行宣传鼓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高颂章到湖州东吴大学礼堂演讲,号召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一个共同目标——抗日救国,建设和振兴中华而努力。

由于高颂章等人积极参与创办刊物,宣传抗日,抨击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引起了湖州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受到湖州保安司令部严密监视,并

以所谓“危害民国紧急讼罪法”先后逮捕了高颂章、宋铭心等5位《野烽》杂志社的进步青年。高颂章被捕后,被带上脚镣手铐,关押在浙江省国民党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受审时,他义正词严地向审讯者发问:“宣传抗日,何罪之有?”审讯者被他反问得张口结舌,无言可答。审讯者以只要肯写份“悔过书”,即可找保释为条件劝他妥协。高颂章断然拒绝,他说:“我自问无罪,有何过悔,要我写有损人格的悔过书,以授权自由,那得白日做梦。”他被折腾了1个多月,终因态度强硬没有丝毫转变而被解送陆军监狱。他在狱中被囚禁半年多,受尽酷刑,一件白衬衫上,沾满了血迹和鞭印。但他仍十分坚定和乐观,觉得让自己的生命微光与祖国独立富强的光明未来融为一体是有价值的。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全国团结抗战局面的出现,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释放了一批政治犯,高颂章等人也被无罪释放。出狱后,高颂章回到湖州后,决定去革命圣地——延安。

1937年秋,陕北公学招生的消息传到湖州,高颂章和宋铭心等进步友人动身前往延安投考。他们途经武汉,并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但由于国民党特务的封锁,未办成去延安的手续。在进退两难之时,他们得到李公朴先生的介绍,进入“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先在运城编队,后到临汾学习。“民大”当时是一所进步学校,有爱国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任教。高颂章在这里学到了新知识,弄懂了许多革命道理,更坚定了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斗争的信念。

1938年3月,战事逼近临汾,“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要迁移里川,学校宣布学员自愿选择去向。高颂章与2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折回汉口,参加“浙江同乡回乡服务团”,回到浙江丽水,高颂章后被分配在丽水一家进步的新知书店工作。不久,闽浙边区的红军游击队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粟裕率部北上皖南集中,在浙江龙游停留。高颂章听到消息,立即赶到龙游,要求参军。参军后,他被编入随军服务团第四大队。由于他是“民大”学生,又有长期抗日救国的经历,会做宣传鼓动工作,办事比较老练,又能联系群众,所以到服务团不久即担任中队长。他工作积极负责,遇事又处处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很快就得到大家的了解与信任。

1938年5月,随军服务团第四大队跟随新四军第二支队向苏南敌后挺进。7月,高颂章跟随服务团团(当时对外称二支队参谋)陈雨笠一





同来到江、当、溧三县交界的横山地区开展工作。高颂章被分配在小丹阳地区,与第二支队司令部秘书王绍杰一起做地方民运工作。他们工作很有成效,8月就正式建立了“小丹阳各界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高颂章被推选担任副主任,王绍杰担任指导员。9月,高颂章由小丹阳各界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指导员王绍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入党后,3个月的候补期尚未满期,小丹阳中心党支部书记、抗日动员委员会的指导员王绍杰奉令调回部队,组织上决定由高颂章接任小丹阳中心支部书记,并兼任抗日动员委员会指导员。

当时小丹阳地区的斗争形势十分险恶,部队到达小丹阳后不久,南京和镇江的敌人同时出动,对新四军一、二支队活动的地区展开报复性的大“扫荡”。1938年8月22日,日军纠集秣陵关、溧水、当涂3处步兵4000多人,骑兵500多人,飞机20多架,装甲车多辆,分路合击,妄图一举将初进江南的新四军聚歼于小丹阳。10月,小丹阳、博望、横溪桥、薛镇等横山地区主要市镇被日伪军占领,并建立星罗棋布的据点,对新四军封锁分割,多路清剿,包围搜索。面对险情,高颂章将个人安危完全置之度外,他日夜奔波,布置检查工作,广泛发动群众,耐心细致地做好抗日组织工作,使小丹阳周围如新市、博望沿石臼湖一带的村子,都陆续建立起抗日游击小组,配合在那一带的二支队三团部队,寻找战机,惩罚敌人,打击日伪军。

1939年3月中旬,高颂章获知当涂县伪税务局长汪跃廷率伪军14人,在小丹阳收税抢劫钱财后,拟乘1条民船,由小丹阳上船经叶村、小花津,进入姑溪河,过护驾墩返回当涂县城,立即报告三团领导,团部派参谋王培臣率领该团所属侦察排,于3月18日晚到达新市附近,与高颂章共同研究对策。19日,他们在小丹阳以南的叶村,组织火力伏击,仅半小时,就将汪跃廷等15人全部生俘,缴获步枪14支,驳壳枪1支,以及伪币数十万元。

1939年7月,中共江当溧工作委员会成立,高颂章任委员,负责组织工作;8月,江当溧县委在横山地区正式成立(由工委改称),高颂章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0月2日下午13时许,高颂章带领通讯员潘福生从新市附近出发,前往横山以东桑园铺、谢村一带慰问部队,并找县委的同志商讨工作,在东村附近穿越小丹阳至博望公路时,遭遇一小队日军,日军疯狂扫射,高颂章和潘福生中弹牺牲。当地的抗日游

击队和群众闻讯,备棺将他们安葬在新市附近的于家甸。高颂章牺牲时年仅 25 岁。

谭雨文 1914 年出生于福建,祖籍广东省台山县。他在广州求知中学毕业后,于 1936 年春季进入大夏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学习。

1937 年 8 月淞沪会战爆发,大夏大学和复旦大学组成联合大学内迁,谭雨文也随校迁往庐山。到达南昌后,学生们的抗日热情高涨,谭雨文等同学在大夏大学地下党同志的号召下参加了“江西省乡村抗战宣传巡回工作团”(简称“乡抗团”),深入南昌、宁都等地农村,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抗战活动。在宣传途中,条件恶劣,困难重重,但是大家历尽艰难,苦中作乐,毫不退缩。“乡抗团”的宣传活动对提高当地群众的抗日觉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38 年“乡抗团”结束后,谭雨文来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在战地服务团工作。为了开展抗日工作,新四军军部决定从军部民运部、战地服务团和皖南民运干部训练班等单位,抽调一批富有民运工作经验的干部,组成民运工作队,深入到皖南各地区,担负开辟新区的任务,谭雨文也在被调之列。

7 月,以曾如清为主组成皖南南陵三区民运工作队,队员有胡明、方休、梁竹吉、洪琪、朱哲夫、谭雨文等数十人,以南陵县三里店为中心,向四周地区辐射,开展民运工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活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三里店四周的局面基本打开。接着,南陵三区民运工作队分成若干个支队,到新的地区去工作。

11 月底,谭雨文等组成何湾地区民运工作支队,到以何湾地区为中心的丫山、绿岭、戴汇一带进行开辟工作。这支民运工作队的任务一是开辟新区、发动和组织群众,二是打通新四军军部与江北四支队联系的通道。

谭雨文等在何湾地区,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做群众的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何湾地区的群众组织——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猎户队都建立起来了,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起党的地方组织。

1939 年春,谭雨文与张东具体负责开辟的丫山、水龙山、涧滩一带,成立了中共南陵区委,谭雨文任区委书记,由谭雨文和张东介绍入党的





本地青年贺森任副书记。

1940年年初,谭雨文奉命从南陵县调铜陵县,任中共铜陵县委组织部长。

谭雨文在开辟新区工作中,兢兢业业,不计劳苦,经常深入群众,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放手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组织抗日群众团体,积极发展地方党员,团结同志,坚持抗战,为开辟南陵地区作出了贡献,他踏实、勤奋的工作作风,给战友和当地群众留下极深刻的影响。

1941年1月,谭雨文在皖南事变中不幸被俘,被关押于江西上饶周田村集中营,化名李福荣。他在监狱中备受折磨,但始终坚持斗争。

1941年3月被押往上饶集中营。在集中营,谭雨文被国民党特务视为“顽固分子”,关押在茅家岭重禁闭室。时值初春,天气寒冷,而谭雨文身无厚衣,睡无棉被,时常受到严刑拷打。但是,谭雨文却从不向敌人低头,依然昂首挺胸,坚持斗争。

1941年年底,国民党反动派迫于国内政治舆论的压力,将重禁闭室里的难友转到“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军官大队”和“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特别训练班”,谭雨文转到了军官大队。

1942年6月,日军进犯浙赣铁路沿线,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上饶集中营从江西迁往福建建阳和崇安一带。南迁前夕,集中营里重新组队,原军官大队和特训班合并,改称“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谭雨文被编在6中队。6月5日,集中营从上饶起程,向福建转移。出发前,国民党特务对全体被囚人员宣布了行军纪律,扬言“谁要违抗,格杀勿论”,并增派武装力量进行押送,同时还利用少数叛变分子,密加监视。尽管敌人防范严密,6中队的难友们在转移途中,秘密成立了地下党支部,组织难友,寻找时机,进行暴动。

1942年6月17日傍晚,集中营的队伍来到了福建省崇安县赤石镇。赤石面临崇溪,对岸是一片丘陵,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6中队地下党支部选中了这个有利地点,趁大队人马渡河时,带领大家举行了暴动。这就是著名的赤石暴动,谭雨文是暴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经过与敌人的英勇拼搏,6中队大多数难友冲了出来,奔向武夷山根据地,找到闽北党组织和游击队。根据闽北特委指示,谭雨文等20多名难友,组成游击队,并以谭雨文、赵天

野、李铁飞、陈平等5人成立临时工委。

9月初,国民党反动军队对武夷山区进行“围剿”,游击队突出敌人包围圈后,与闽北党组织失去联系。临时工委决定:化装分散,奔赴苏南抗日根据地。谭雨文等在山上把步枪、短枪等武器埋好,最后离开武夷山区。1943年年初,谭雨文、李铁飞、陈平、陈戈群等6人,一路经浙江龙泉、温州、宁波到上海,后又辗转到了苏南抗日根据地。

1943年2月,谭雨文等来到了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溧水县。谭雨文等将自己在上饶集中营和赤石暴动以及在武夷山打游击的情况,向党组织作了详细的口头和书面汇报,接受组织审查后,被分配到苏皖区党委敌工部门工作,他具体负责溧武路以南,溧水城以东,京杭路以西,溧老路以北地区的敌伪军工作,为了工作方便,他化名唐智凤。谭雨文来到溧水地区开展敌伪军工作,克服了人生地不熟的困难,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在溧水城内和其他地区,他都建立了联络点;他胆识过人,经常一个人身穿便衣,来往于各联络点之间,收集情报;还经常进入到敌伪军据点里,了解敌情,做敌伪军工作。由于谭雨文在溧水做敌伪军工作时,大多是单独行动,他的很多英勇事迹,已无法收集。但他壮烈牺牲的情况,给溧水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1943年6月的一天,谭雨文到溧水城附近了解敌情,在行走途中,和敌人遭遇,不幸被俘,敌军将谭雨文抓进溧水城,关押在日军驻地——溧水县积谷仓(今溧水县城盐仓巷内)。

被日军关在积谷仓临时牢房里的谭雨文,时刻寻找机会逃出牢房。有一天,谭雨文趁看守小便之机,突然从牢房里冲出,夺过日军手中的枪,发现枪中没有子弹,便拼命往城外跑。敌人紧追不舍,谭雨文跑到城南面,见城门已关闭,便爬上城墙,纵身跳下,摔坏了腿,不能动弹,这时,日军赶到城墙上,见谭雨文躺在城墙下,拾起城墙砖,惨无人道地将谭雨文活活砸死。

牢房,酷刑,真正的共产党人是无所畏惧的。谭雨文在敌人的牢房里,在敌人的酷刑下,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克服重重困难,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暴动过程中,他积极沉着,机智勇敢,面对凶恶的敌人,不畏艰险,勇往直前,是一位深受大家爱戴的好同志。谭雨文对党忠诚,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宁死也不向敌人求饶,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崇高的品质。





周志远 原名叶家洪,1915年出生于安徽省一官僚家庭。参加革命后,曾化名周荣生、许荣生、周家良等。他在安徽家乡度过中学时代后,为追求真理,离家北上北平。

1935年秋,周志远考入北平私立民国大学读书。是年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爱国学生掀起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他在学生救亡活动中,与青年们深入街头巷尾,散传单、作演讲,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华北自治,因表现突出,经黄尔义介绍,加入共青团江苏省委北平特别支部,任团小组长。

1937年春,共青团北平特支奉令结束,周志远与部分团员调往上海。抵达上海后,团组织派他到沪东扬州路宁波小学办劳工夜校,担任教学工作。他住在法租界,每天赶到沪东教书,因经济拮据,来回常以步代车。平时生活节衣缩食,去沪东教书常在小饭铺喝点稀粥充饥,他与群众同甘共苦。七七抗战爆发后,不仅对劳工夜校读书的工人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还经常深入工人家庭访贫问苦,与工人交知心朋友,深得工人们的尊敬。他注意启迪工人的觉悟,激发爱国热情。他给夜校学生教唱《五月的鲜花》《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唱得声泪俱下,感动得学员们一个个流淌出热泪。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劳工夜校停办,周志远带领夜校部分学员投入救亡工作。白天,他到《译报》做编辑工作,报道抗日救国消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晚上,他到地下党创办的新光等难民收容所做救亡工作。他对难民收容所救亡工作的夜校学员讲解《西行漫记》,激发学员的爱国热情。为此,他劳累得常常顾不上回去食宿。由于周志远的爱国热忱和勤奋工作,经地下党的考察,党员李文运的介绍,1937年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38年2月至3月,中共江苏省委工人工作委员会委员马纯古派周志远到沪东开展工运工作。他先派夜校学员孟培英、陈志馨、叶敏到沪东日商经营的同兴纺织二厂做工,在工人中搞工运,并发展孟、陈、叶3人入党。不久,周本人也到该厂工作,深入工人群众,与工人交朋友,启发工人的阶级和民族觉悟,宣传抗日救国,让工人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把一大批工人团结到党组织周围。同年6月,他发起组建了上海工人救亡协会同兴二厂分会,发展了50多个工人积极分子加入救亡组织,开展了劝募寒衣援助江南抗日义勇军和赈济收容所难民的捐献活动。后又陆续

发展张妙根、朱秀英、朱伟倩、朱秀娟等入党。至年底,同兴二厂已有中共党员 10 名。1939 年元旦,成立了中共同兴二厂支部。同年春,组建了 3 个党支部。3 月,周志远又参与组建沪东敌厂(敌纱)委员会(简称敌纱委)和沪西中国纱厂委员会,他是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接着又派党员打入裕丰、申新六厂、公大等纺织厂和华中都市公共汽车公司、武田药厂开辟党的工作,并先后在这些厂建立了党的支部或小组,这些厂的党组织归沪东敌纱委领导。

周志远在上海从事抗日革命活动期间,虽身患肺病,仍坚持工作。他平时经济亦不宽裕,可他常常把做编辑得到的微薄工资去周济有困难的女工难友,因而得到他联系的所有工人的尊敬和热爱。当他奉命调离上海去苏南敌后抗日时,送行的党员、工人,一个个流下热泪,反映了他与工人间真挚深厚的情谊。

1939 年,周志远来到无锡地区,先在梅村一带发动群众抗日,继到无锡城南清明桥和济磨坊以做生意为掩护,任中共无锡城区区委书记,不久任中共无锡县委委员兼组织部长。

在太湖地区工作期间,他重视民运工作。1940 年秋,他与县委其他领导一起,动员组织当地一批爱国青年,进行为期 3 个月的培训。他亲自授课,讲解抗日方针政策、民运工作的内容和方式方法,结业后把这些青年派到锡南做民运工作,使多数同志走上抗日革命道路。

他重视武装建设工作。在建立锡南办事处常备队基础上,同其他领导人一起,动员青年入伍,扩大抗日武装,参与组建了新四军太湖抗日游击支队,配合新四军十八旅主力部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击敌伪军,创建敌后抗日民主政权。他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为太湖游击支队谱曲填词写成《太湖支队进行曲》,并亲自到部队教唱。用“我们是英勇的太湖支队,是苏南抗日的尖兵!是狂风中的英雄!……打进天目山,驱逐亲日派,讨还皖南事变的血债!渡过惊涛恶浪,争取八百里太湖的解放!”的歌词,从思想上武装战士,激励抗日健儿们在太湖地区英勇奋战。

他关心干部成长,经常组织办事处干部学习《论持久战》,帮助大家提高认识,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学习“党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认真执行统战政策。经常召开地方士绅及乡保长座谈会,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听取他们建议意见,改进工作,鼓励士绅们与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





御侮,为抗战作贡献。

他重视团结知识分子。办事处设立文教科,配备专职干部,联系中小学教师,对学生进行抗日教育,对群众进行抗日宣传鼓动。

他遇事冷静,办事果断,身临险境毫不畏惧。在锡南工作时,忠救军的一特务分子以诈降手法混入新四军内部刺探军情,窃取情报。身为办事处主任的周志远,沉着冷静,不露声色,暗地派员予以监视。发现该特务分子密送情报时,一举人赃俱获,给予惩处。

1941年2月,他又任中共太湖县委组织部长和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锡南办事处主任,领导锡南新安、开化、扬名3乡党政军工作。

1941年夏,日伪军提出与太湖游击支队谈判,周志远作为新四军代表之一,陪同顾复兴司令去石塘镇与日伪军代表谈判。他明知身处逆境,有生命之虞,可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在谈判席上慷慨陈词,侃侃而谈。由于他的机智勇敢,终于挫败了敌人企图压服、吞并和消灭太湖游击支队的阴谋。10月,锡南办事处奉令撤销,周志远离开锡南到达茅山地区。

1942年年初,周志远被分配到溧水工作,前任中共溧水县委组织部长,后任溧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副县长。他任组织部长期间,深入新桥、白马、韩胡等区地下党员家中联系党员,做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党员为抗日出力。

1942年春,他在方家边村举办党员骨干训练班,讲国际国内形势、党员义务,启发党员政治觉悟,了解党员的职责与使命。党训班上,教党员唱自己作词谱曲的歌,唱到“青的山、绿的水、锦绣的山河”时,他讲解祖国的大好河山决不让野兽侵占,中国人民一定能赶走日本侵略者;唱到“美的衣、鲜的食、谁的功来谁的力”时,他说这是工农大众之功,劳苦大众之力,应该推翻剥削制度,实现无阶级、无压迫剥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就是这样来教育启发党员,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使命,要求每个党员为实现党的革命目标,完成党的历史使命而战斗。当年亲耳聆听他讲课的党员,称赞周部长讲话易懂,深刻感人,至令记忆犹新。

他任副县长后,一度兼管新桥区的行政工作。处理民事纠纷中,为受压迫妇女撑腰。开会时,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不得歧视妇女,虐待童养媳。妇救会员说,周副县长是替我们妇女讲话的。



他到白马区协助开展工作,认真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他摸清上层人士的政治态度后,团结坚定的、教育争取中间的,即使顽固的也决不放松做工作,使其能保持中立。开明士绅张宗亨,春节缺钱用,粮食不能到敌占区出售。周志远知道后,到县财经科取来购军粮款 20 担米钱亲自送到张家,解决了他的困难,使其进一步向新四军靠拢。

他关心同志,切实帮助解决困难。县财经科干部周凯声去白马区催征秋季公粮,要到伪化区去催征,因人地生疏颇感为难。周志远得知后,亲自陪同他到该地,将其安排在前巷村尹乡长家中食宿。周志远一面对其鼓励,一面要求尹乡长协助催征并保护其安全,自己还常到前巷村看望指导,使周凯声较好地完成了征粮任务。

1943 年 4 月,在溧水地区发生新四军十六旅抗击国民党顽军军事进攻的反摩擦战斗。战后十六旅撤出溧水新桥中心区,周志远随同县府机关人员撤到溧武公路南侧白马区浮山一带坚持,负责保护十六旅后方医院伤病员的安全。他带领县武装一部会同白马区大队出没在袁巷、天王寺、方边日伪据点旁的村庄,监视敌情,保护后方医院和县政府机关的安全。6 月中旬的一天,十六旅特务营 2 个连队到白马区行动,夜宿张巷村。周志远为了保护主力部队宿营安全,由白马区区长带几名战士到白马桥一带监视顽军行动,他亲自带县大队一部深入浮山山里慈恩寺宿营,防范天王寺敌伪军偷袭。他同指战员四处侦察,一夜未曾合眼。

6 月 14 日上午,正在慈恩寺休息,突然发现日军从西面沿山沟过来。周志远立即命令县大队长李琪、军事科长许治带领战士向东北方撤退,自己带几名战士向西去阻击敌军,掩护部队转移。指战员翻过山峰安全转移后,他又命阻击战士全部后撤,独自持枪阻击,与敌周旋。直到战士们全部走后,自己一边阻击,一边撤退。刚撤到山顶时,不幸被敌军机枪击中,腰部连中数弹而倒地被捕。敌人知其不凡,抓来两个民伕,用门板抬着他向袁巷走去。行至窦家港村旁的小溪边,周志远苏醒过来了。他见自己躺卧在门板上,前后都是敌军,知道自己被俘。他使尽全身力气,从门板上滚入水中。敌人又命民伕将他捞起,继续抬着走。周志远终因流血过多而壮烈殉国,年仅 28 岁。

烈士周志远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常为异族入侵、国土沦丧、民不聊生而忧愁、痛苦、落泪,为抗日救国而奔走、呼号、战斗! 他有高



度的革命责任感和事业心。他抱病工作,置生死于度外;公而忘私甘愿与女友分在两地,把自己全部身心扑在抗日革命事业上。他诲人不倦,把青工、学生团结组织在党的周围,教育、启发、引导他们走上抗日革命大道。他关心别人胜过自己。不仅节衣缩食用积攒的钱去周济难友,且在生死抉择面前,把生让给战友,把死留给自己,终于献出年轻的生命。烈士的一生,是为民族复兴、祖国独立、阶级解放勤奋工作的一生,是英勇战斗的一生!他的光辉事迹、革命精神、高尚情操永远为人们记忆、敬仰和颂扬!

戴国光 1915年出生在宜兴县新建乡江谷瞿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戴国光祖籍泰州。光绪年间,由于家乡遭受灾荒,其祖父携家逃荒来到江南宜兴落户,以出卖劳力度日。戴国光7岁入学读书,因祖为客籍,举目无亲,饱受地方封建宗族势力的歧视,给戴国光幼小的心灵以强烈的影响。

1932年9月,戴国光由官林高级小学毕业考入洛社乡村师范。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追求进步,爱读《生活周报》《礼拜天》等进步刊物,观察剖析社会。

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洛社师范学生冲破“读书救国论”的思想束缚,走向社会宣传抗日救国。戴国光和同学一起到群众中演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带领班级同学去上海、南通、泰州、扬州等地宣传抗日救国,募捐筹款,支援前线浴血抗战的爱国将士;主动参加学生请愿团,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派兵北上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他们的爱国举动得到爱国志士的支持。

1936年7月,戴国光师范毕业后在家乡储巷小学教书。他忘我工作,认真教学,积极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

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加上几年抗日救国斗争的实践,戴国光成熟起来,对现实开始思索。“国难当头,领土丧失,中央政府为什么不积极抗战?”“劳苦大众成年累月的辛劳,为什么终不得一饱?”等一连串现实问题在他脑际萦绕着,要求改变现状的革命思想开始萌发。

戴国光擅长美术。在学校工作期间,曾画了一幅画贴在家里,画面上是一面红旗和火炬,旁边写着“光明”两个大字。这是他思想追求的真实

写照,意味着他对新生活的渴求。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祖国大片领土沦陷,汉奸恶霸横行乡里,生灵涂炭。忧国忧民的戴国光目睹疮痍的现状,十分愤慨。

1938年6月,陈毅司令率领新四军一支队东进抗日,来到茅山地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同年8月,支队司令部派战地服务团第六兵站站长艾焕章到臧林地区招募新兵。接着,新四军老二团派三营教导员刘玉林率三营一部也来到臧林地区开展抗日宣传,号召人民组织起来抗日。戴国光和储顺尧、储经纬、薛瑞福等爱国青年,看到新四军虽然武器陈旧,但杀敌英勇,纪律严明,毅然报名参加了新四军。参军后,就在当地搞民运工作,发动组织群众,进行锄奸反霸。当地闸上储福康为追求个人的荣华,想当维持会长,认敌为父,要日军到闸上设立据点。戴国光、薛瑞福、储经纬等获悉,就将储福康抓获送交三营处罪。这一举动博得人民群众的拥护,誉称新四军是真正的抗日军队。支队司令部为培养苏南敌后地方抗日干部,戴国光、储顺尧、储经纬等一批爱国青年奉调去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学习。

1939年2月,戴国光满怀激情地奔赴军部,被编入政治队(第五队)学习。在受训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明确了党的性质、任务和革命目标,政治觉悟有了迅速提高。不久,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9月,学习结业后回到溧阳县水西村一支队司令部。年底,分配到臧林地区李复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担任税务总主任。他积极热情地工作,经过调查,在刘家舍、河头桥、坝头上等地设立了5个水陆税卡,筹集抗日经费,解决部队给养。时近隆冬季节,李复传达了陈毅司令关于劝募寒衣、解决部队战士越冬棉衣的指示。戴国光视任务为天职,协助李复多方筹集,在短期内出色地完成第一批寒衣款的筹集,交给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得到陈司令的赞扬。他还主动配合游击队开展锄奸斗争,打击日寇。是年冬的一个夜晚,风雨交加,据报臧村汉奸储××去湟里日军据点开会。戴国光带领7名战士顶着狂风,冒着大雨,埋伏在湟里据点的一侧,将汉奸抓获就地处决,振奋了群众的抗日情绪。

1940年春,戴国光依照组织上多交朋友的指示,在东安日军据点周围收了10多个徒弟,作为自己的耳目,对及时了解敌情,开展对敌斗争,起了很好的作用。





1940年上半年,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组织力量进入太滬地区。麦收后,戴国光调往太滬地区工作。他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投入抗日。

1940年10月,他以“不良分子”的嫌疑,被伪军抓捕入狱,囚禁在常州市清凉寺伪军监狱。敌人多次审讯,他未吐一字真情。后经多方设法营救,于1941年4月3日被释放出狱。

1941年6月,他被调往溧阳县西唐区工作,担任民政助理。同年10月,西唐区划为唐王和西岗两个区,戴国光任唐王区长。

这时,经过艰苦斗争磨炼的戴国光,革命意志更坚决,立场更坚定,更有胆略了。西唐地区处于敌伪据点梅花桩之间,日伪军经常来唐王抢粮、征税、抓人。戴国光带着区大队在西唐北面日伪据点周围活动,监视敌人,保护群众。为调动基本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巩固抗日游击根据地,遵照上级指示,组织农救会,实行“二五”减租。他认真做好上层工作,召开地方士绅和乡保长会议,宣传减租政策,讲清减租的意义,要士绅们从抗战大局出发带头减租,支持抗日。唐王街上大地主刘斌,威胁佃户,明减暗抗。戴国光在士绅会上表扬了开明地主,揭露刘斌破坏减租的花招,发动群众同他开展说理斗争,拔除了“钉子”,使唐王地区减租运动得以顺利开展,取得了胜利。

正当西唐地区革命斗争形势深入发展的时候,家里来信称:汉奸储福祥带着伪军来抄家,母亲惨遭吊打,大哥被带进官林据点,以此要挟交出戴国光。戴不仅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革命斗志,而是满腔怒火更加仇恨敌人。敌人的这一着,早在他预料中。他写信安慰父母说:“家里遭到不幸,儿表同情,我在外面干革命,就是为了消灭汉奸鬼子,为了国家民族不受苦、不受难……”。

1942年春,戴国光奉命调苏皖区党委党训班学习。五、六月间分配至溧水县担任白马区区长。白马区是当年新开辟的,区政权刚建立。该区四周敌据点林立,南临抗日中心区,北接伪化区,敌情严重。戴国光任职后,他在全局中认识到白马区的战略地位,经常对区里干部说:“白马区是我首脑机关驻地的东北门户,它是联结茅山、江句,甚至是通往苏中、淮南根据地的重要走廊。白马区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全局。”他经常深入方边、官塘、天王寺、袁巷附近的新四军敌工站和情报站了解情况,要求他们加强情报工作和敌工工作,使之有个较好的斗争环境。戴国光对两面政权的乡保

长,经常晓以民族大义,争取为抗日服务。在争取工作中,他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在士绅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乡保长对民主政府应征的税款、公粮和提供的敌伪情报,不敢推诿和敷衍。根据上级指示,积极开展减租减息斗争,调动基本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巩固根据地。通过运动,壮大了区大队、乡中队,发展了抗日群众组织,巩固了农村抗日统一战线。

1942年12月,因斗争需要,戴国光任溧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民政科长。他在任职期间,积极协助领导做好统战工作。经常深入统战对象家里,了解情况,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抗日统一战线。

1943年年初,在白马区梅家召集全县地方士绅会议,应邀到会的有100余人。戴国光主持了这次士绅会议,区党委书记江渭清、县长曹明梁到会讲话。这次会议以后,溧水统战工作有了新的起色,促进了溧水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

1943年4月,国民党顽固派在苏南敌后加紧反共,对我武装挑衅,溧水形势发生逆转。

4月中旬,国民党调遣12个团的兵力,大举进攻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新四军主力部队驻地溧水地区。新四军冲破了顽军的重重包围,主力部队转移到敌后。新桥中心区被顽军占领,溧水革命斗争进入最险恶的时期。县区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奉令坚持原地斗争。戴国光随着县政府在白马地区坚持。

7月10日,韩胡区区长邹毅、蒲塘区区长任重韩胡区老虎庄遭到国民党顽军的袭击,双双壮烈牺牲。

8月,戴国光接任韩胡区区长。当时,韩胡区南有顽军“清剿”,北临县城,日伪军经常下乡“扫荡”,并派有特务潜伏在韩胡村侦探情报。戴国光就是在日伪和顽军夹击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十分艰苦。经过5月和6月国民党顽军两次大“清剿”,原倾向于抗日的两面政权组织,有的靠顽,有的投敌。他身处逆境,面对残酷的现实,冷静地分析当前的形势,首先稳定区乡干部思想,增强斗争信心;重新组建区大队,发展武装力量;锄奸肃特,打击敌人。他查封了老虎庄流血事件的预谋策划者之一、伪乡长殷万铭的家产,打击了日伪嚣张气焰。

当年10月,溧水形势开始好转,戴国光立即进行各项恢复工作,调整干部,抓好乡保政权的建设;组建乡中队,扩充区大队,发展地方武装;贯彻合理负担政策,抓好税收,发动群众交纳公粮,支持抗日。





1943年11月27日下午,戴国光带着区大队10余人,由尹家边侦察敌情后,到凉篷下检查粮食禁运和收交公粮情况。这天下午,县城伪自卫团遣其班长李德宝带着县城日军警备队便衣队长陈天送(翻译兼)和特务高排长(叛徒)、赵忠兴等10多人到韩胡村,探知戴国光在凉篷下活动,便衣队随即追捕,戴国光遭到突然袭击,相击一阵,终于与通讯员小秦一道被捕。

戴国光被抓到溧水县城后,囚于日军警备队。在狱中,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想到的是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正是由于这种坚定的信念,支配他的言行,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当他走进敌监看到有些新四军伤员、医生和护士也被关在这里,他在狱中对同志们讲对敌斗争的策略,嘱咐“党员身份不能暴露,就是牺牲自己,也要保守组织秘密,要保持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应有的气节。”入狱第3天,敌人特意设宴“招待”戴国光,企图软化其斗志,要他说出地下党的组织和情报网联络点。戴国光同志以他对党无限忠诚和坚定的革命立场,怒斥敌人:“你们已经知道我是区长还要我说什么。我要说的是怎样为共产党工作,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要我把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情况告诉你们那是梦想。你们想要知道的,我是绝对不会说的!”敌人诱降失败了。戴国光又被押回监狱,他对同志们说:“敌人知道我的区长身份是不会放过我的,想从我口中摸清我党的地下组织和情报网。我已做好准备,只有牺牲自己才能保全组织。”戴国光的铮铮之词,给狱中战友很大教育。

1943年12月10日晚,敌人又一次传讯戴国光。他意识到为党献身的时刻已经来到,他告别了难友,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出牢房。就在这个黑夜,敌人在大西门外的荒地上将其杀害。戴国光为抗日英勇就义,壮烈殉国。

强 博 原名蒋文林,1918年出生在江苏省金坛县指前标乡庙圩村(现属江苏省金坛市指前标镇庙圩村)一户贫农家庭。家中有6个兄弟、3个姐姐,他在男孩中排行第二。强博从小天资聪颖,求知欲旺盛,9岁读小学堂,刻苦勤奋,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深得其师丁文中(兰芝)的器重。但他家境日益艰难,难以继续供他读书。丁文中亲自上门跟他父亲商量,自愿扶持强博继续求学,还决定日后将女儿丁押弟嫁给他。此后,在丁老师的扶持下(公堂也出些钱资助),强博在金坛指前街上读完小学,又升

入王母观村一所私立中学堂。

1936年,强博考入吴江县乡村师范就读。该校是当时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进步学校,陶行知等一些知名教育家常去学校讲演,学生的政治思想活跃,常在周末举行时政辩论会,对当时国民党的腐败政治、糜烂的社会风气进行激烈抨击。强博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从一个沉默寡言、埋头读书的乡村少年,逐渐转变为一个关心政治、追求进步的青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正在吴江县师范二年级读书的强博停学回乡,先后在家乡庙圩村、城头村等小学教书,并经常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1938年春,强博和许瑞生、方海鳌等青年奔赴南昌新四军办事处,要求参加抗日救国的队伍,经组织批准后介绍到皖南军部参加战地服务团,不久,他们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年夏天,他们随新四军东进回到金坛家乡开展斗争。强博等人发动当地20多位爱国青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他在金坛县西岗社头间的一座庙里,参加了(叫庙头)第一次会议,研究当地抗日活动的开展情况。7月,在社头北的孙家村参加了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正式成立“金坛县西南区抗敌委员会”,主任钱震宇、副主任李钊,设宣传、军事、总务3个股,强博任宣传股长。为有力打击日本侵略者,不久又建立了一个武装部队。初期,委员会少枪缺钱,一切得靠自己筹集,强博等人积极奔走,筹募活动经费,动员青年参军。在他的宣传教育下,武装队伍由小到大,很快发展到100多人,成为对敌斗争的重要力量。

1939年2月的一天下午,武装队埋伏在东浦村以北的九里湾,激战4小时,将15名从下新河据点来扫荡的日军击溃。强博等在打扫战场时,还俘虏1名日本兵,受到上级表扬。这年,强博和未婚妻丁押弟结婚,但只在家停留了两三天,就匆忙返回战斗岗位。

1939年9月,强博被调到新四军军部学习半年,期间他改用强博为化名。1940年春至1941年年底,他在苏皖区党委训练班学习后,调丹阳工作,先后任中共丹阳县二区区委书记、丹阳延陵十乡办事处主任、丹南行政办事处主任等职。其间,他组织发动群众,打击活动猖獗的日伪军,让其不敢为所欲为。强博的父亲担心他在外面冒风险,赶到丹阳探望他,想劝他回家。到了丹阳,见他和战友们风餐露宿打游击,既高兴又担心地说:“文小(强博的小名),日军这么多,这么凶,靠你们这样东跑跑,西打打,能打下





个天下来吗？”强博笑笑打比方说：“有三间房子，老鼠在里面闹得很凶，要是我们把门窗全关起来捉，能捉得尽吗？”父亲道：“咋捉不尽呢？捉一个少一个！”“打日军也是这个道理呀！”父亲被儿子的言行打动了，对他说：“文小，你干你的主任吧，我以后再不来找你回家了。”

1941年年底，上级决定调强博任江宁县县长。江宁县地处日军重兵盘踞的南京城郊，是连接大江南北抗日根据地的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特别是皖南事变后，日伪顽暗中加紧勾结，企图把新四军一网打尽，斗争形势复杂艰险。江宁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夏定才已壮烈牺牲，第二任县长张波又被调回部队。有人劝强博对调江宁任职要“考虑考虑”，强博坚定地说：“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要去，共产党员没有见困难就退缩的道理。”

1942年1月，强博到江宁县接任县长，立即着手整顿县、区级行政机构、地方武装，同时依靠、发动群众，配合新四军主力部队，在敌人心脏地区开展游击战，出奇制胜地打击日伪军。

1942年3月28日，强博和县军事科长兼警卫连长许治、指导员蔡子荣、县政府秘书焦恭士、民政科长庞家义、龙都区区长王齐贤等人，率领县警卫连和区大队战士约50人，在龙都地区开会，夜宿朱家村。3月29日继续开会，移宿孙家桥。3月30日傍晚，在研究当晚移宿地点时，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人主张就近在龙都邹家村宿营，认为邹家地点适中，对第2天召开乡、保长会议方便。有的担心连续几天在这一带活动，易被敌人掌握行踪，主张移宿龙都境外的高阳桥为妥。强博决定在龙都附近邹家边宿营。由于被特务告密，3月31日拂晓，秣陵关汪伪自卫团30多人及日军70多人，趁拂晓浓雾包围了三面环水的邹家边。待哨兵发觉鸣枪报警时已措手不及，于是大家夺路突围。强博游过村南面的水沟“板凳跳”时，被埋伏在沟北面坟堆后的匪徒曹大松开枪击中背部，他立即倒在血泊中。但他仍强忍着剧痛，用最后的力气，把随身文件、钱包等重要物件，塞进身旁泥堆里。随后又向前爬行了一段距离，离开隐藏文件等东西的地方，终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年仅24岁。

在此次“邹家边事件”中牺牲的还有秘书焦恭士、区长王齐贤等12人，他们的遗体被葬在邹家边东面土坟内，新中国成立后迁葬至龙都烈士陵园。1956年，强博的遗骨由父亲拾回，葬于金坛县青龙山烈士墓地。

周建平 原名周正贵,1918 年生于江苏省金坛县西岗朱家村(现属江苏省金坛市西岗镇)。父亲周福林是清末秀才。家中种有 8 亩田,生活勉强自给。

周建平读小学时,父亲去世,由兄嫂支持他继续读书。1936 年,周建平从金坛县中初中毕业,成绩名列全校前三。按照当时规定,他可报考空军学校,但因病未考成。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家乡沦陷,周建平结束了学校生活。

1938 年夏天,新四军东进,先遣支队的随军战地服务团到金坛农村组织抗日力量,把周建平、李剑、钱震宇、强博等 20 多位爱国知识青年组织起来,建立地方抗日组织和抗日武装骨干力量。周建平在党的教育下,工作积极,学习努力,思想觉悟提高得很快,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村上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他任支部书记。当时,地方上尚未搞二五减租,但周建平同情农民疾苦,每逢地主收租,他就支持佃户少交租多留口粮,积极引导农民同地主斗争,成为当地农民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带头人。是年下半年,村上成立了乡中队,开始是国共合作性质,名义上属国民党,实际骨干成员多数是共产党员,周建平任队长。

1939 年 3 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周建平、丁克中、王杰、谢国富、谢国仁 5 人脱离乡中队,携枪参加新四军。接着又随李剑、朱春苑等人回乡成立新二中队,周建平仍任队长,丁克中任指导员。此时,新二中队只有 1 个班的实力。在周建平等人的率领下,一边战斗,一边扩充人员,不断从日伪和国民党散兵游勇手上缴获武器,到 8 月发展到 70 多人,同时拥有了相当于 1 个连的武器装备。

周建平个儿高高的,白白净净的,看上去像个书生,但打起仗来却勇猛顽强。1939 年 8 月,日军开汽艇袭击朱家村,当时敌众我寡,但新二中队在周建平的指挥下,顽强战斗,在给敌人以杀伤后,胜利突出了包围圈。突围后要过沟,他见一只满载群众的小船,由于人太多,船要翻,就不顾一切跳下船,踩水背纤,冒着敌人的枪弹把小船拉过河,使一船大人、小孩幸免于难。这种共产党员关心群众的崇高品德和精神,至今还在当地人民中传颂。

1940 年年底,周建平调苏北的新四军教导队学习 1 年,又调溧水继续学习 6 个月。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在句容县任军事科长、区长等职。1945 年 1 月,周建平再调苏浙公学学习。4 月,周建平被调派至江宁县工





作,任中共江宁县青龙区区委书记、抗日民主政府青龙区区长。当时,青龙区包括鹤龄、青龙、淳化、索墅4个乡,是沟通大江南北的要道,敌人力图卡死这条通道,在所属集镇筑有据点和附近的汤山等地驻有重兵,并经常下乡“扫荡”,搞突然袭击。周建平到青龙区后,短短3个月就打了几次恶仗。5月8日,周建平带领区大队在上峰寺后和日伪军交战,双方都有伤亡,敌人见他们打得勇猛,不明虚实,急忙撤退。5月12日,日伪军集结300多人,从汤山、作厂、黄梅桥、小楼等地分9路进攻青龙区政府。由于情报及时,周建平指挥区大队,作战机动灵活,在周建平的指挥下,迅速转移。拖了整整一天,把敌人拖得团团转,敌人到处扑空,却落得个一无所获。

1945年7月初,区委副书记张荃去县里参加整风会议。周建平分工留在区里抓征收钱粮工作,他亲自带领区大队在各乡检查督促。当时,区大队班长张玉和被敌人收买,于7月9日深夜,趁周建平和区财经股长王金秋、通讯员小郭等人在上戴塘村熊顺富家睡觉,突然闯进屋去喊道:“快起来,外面有情况!”周建平刚一起身,就被这个叛徒开枪击倒,壮烈牺牲,年仅27岁。

周建平的遗骸被安葬在土桥乡柏墅村郑家边水库,由他同乡、生前挚友康健同志亲自立了墓碑。新中国成立后移葬至土桥革命烈士墓。

庄子中 1919年出生。他于1937年12月从马来西亚回国参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年的秋天,庄子中在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八团三营任副营长。

1944年春,庄子中被调任该团特务营任营长。他是瘦高个子,黑黑的脸,平时虽不大讲话,却对人十分热情,处事也很老练。

庄子中会做裁缝生活,自己会裁剪衬衣,自己缝制,战友们问他:“你怎么还有这套手艺?”他说:“我过去就是干这个行当的,如果你要裁剪,我可以帮助。”战友说:“我没有布料。”他笑笑说:“那等有了布料再说吧。”庄子中喜欢讲故事,他尤其喜欢讲古代打仗的故事,有时他一面烤火,一面就讲故事。有一次,他谈到牵牛鼻子时说:“牛只有牵住鼻子才能听你使唤,其他地方都不行,我们军事上打仗也像牵牛鼻子,牛鼻子就是敌人的要害,抓住了要害,我们就主动了。”他说,敌人出来

“扫荡”，我们就逼近敌人的主要据点，袭击它，捣毁它，把敌人牵过来；当敌人回来的时候，我们又跳出外围去打击它。敌人跟着你跑来跑去，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我们手里，牵着敌人走，这就是牵牛鼻子。牵牛鼻子就是抓住要害，抓住了要害就能主动。他常常用简易生动的比喻，来叙述一个战略观点。

1944年春，四十八团成立了特务营，组织上挑来选去，觉得庄子中最合宜，庄子中被调到特务营任营长，领导全营战士战斗和训练，较好的完成组织上交给他的带兵战斗和训练任务。

1945年1月6日，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率第一师部队到达浙江长兴仰峰脊、槐花坎地区，与十六旅会合。1月13日成立苏浙军区，原新四军六师十六旅四十八团特务营改称为苏浙军区第一纵队一支队特务营。庄子中仍在该营任营长。

1945年8月中旬，庄子中所在的一支队向南京挺进，在途经溧水白马地区时，遇到向溧水县白马桥、经巷等地进犯的日军1个中队和伪军第三师第八团1个营及伪保安大队200余人的阻挠。他们诱敌深入，将敌围于张家岗，发生了张家岗战斗。当时，原四十八团一营一连担任正面出击，特务营沿着东面山坡迂回敌人侧面，准备全歼敌寇。当特务营迂回到村子东侧的时候，日军已经溃退到村子里，据守着村边阵地，作垂死的抵抗。庄子中与特务营政治指导员须壮带着部队占据村子东南侧的一个土岗子。岗子上有个坟包，当他和须壮二人用坟包作掩护，在前沿阵地观察地形，研究敌人动态，寻机组织强攻时，不幸被敌弹射中而同时牺牲。这次战斗虽然庄子中营长和须壮政治指导员为抗日壮烈殉国付出了代价，但战斗却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歼灭日军大半个中队和600多个伪军，使溧水地区出现了空前的大好形势，为溧水县城的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张家岗战斗正值抗战胜利前夕，胜利的曙光即将来临之际，庄子中却为国捐躯，长眠在溧水的大地上，但他的革命精神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更坚定了战友们抗战必胜的信心。不久，日军全部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恢复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的光辉。



李秉初 原名李生寅，河南省镇平县人，1919年出生。1935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37年1月参加鄂豫皖边区红军游击队任宣传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政治处干事、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副科长。1943年任新四军第二师第五旅第十三团政治处副主任。

李秉初少年时,就读于石佛寺县立第二小学,在学校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不畏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决心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于1935年春,向地下党组织提出入党要求,年仅16岁的李秉初被破例吸收为中共党员。

1937年1月,中共皖南工委遭到敌人破坏,很多同志被捕牺牲。2月,李秉初经地下党员张明河介绍,参加了鄂豫皖边区红军。抗日战争爆发后,李秉初随新四军第五支队第八团东进,到淮南地区开展抗日斗争,后调任新四军第二师第五旅第十三团政治处副主任。

1943年8月,日军第6师团小田大队及六合伪军600余人侵犯八百桥,企图大肆抢掠群众在田成熟的秋粮。为保卫秋收,进驻四合、东王庙一带的第五旅第十三团决定给日伪军迎头痛击。17日,第十三团在桂子山与日伪军展开激战。由于第一营营长、政治教导员发疟疾病,不能指挥战斗,李秉初与副团长陈宗胜奉命到第一营分别代理政治教导员和营长共同指挥一营英勇抗击日伪军进攻,在反复争夺山头阵地战斗中,李秉初带领突击队冲入敌阵,击毙伤数名敌人,击溃了敌人多次进攻。在反复争夺山头阵地战斗中,李秉初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24岁。烈士遗体当时先安葬在四合观音山,1956年3月移葬于桂子山烈士陵园。

1982年10月,江苏省民政厅公布烈士名录中,李秉初名列六合县烈士名录。

周喆 女,1921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现属湖南省醴陵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学生时代,她就满腔热血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39年,周喆参加革命后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随新四军挺进皖南,在皖南南陵县的三星、童村街一带搞民运工作,后任南陵县委妇女部部长。1940年,她被调至苏南抗日根据地长溇地区工作。1941年6月,周喆被调到江宁地区,先后任江句县委妇女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和组织部部长等职。

周喆初到江宁时,日伪在江宁重兵盘踞,并到处设立据点,频繁扫荡。为了开展工作,她经常与敌人周旋,如履薄冰,但她机警勇敢,常化险为夷。她主要在淳化以东,索墅以北的赤山、青龙山等斗争尖锐复杂的地区活动。她留一头短发,身着便装、布鞋,扮得像村姑一样,出入农民家中。有时和群众一起劳动,兼做群众工作,有时找妇女开会,宣传抗日救国、组织起来的道理,提高群众觉悟。她也积极参与区乡组织农会、妇救会、递步哨、民兵等组织的工作,并在斗争中发展党员。她在赤山区发展起来的党员,建有4个党支部。

周喆熟悉农村生活,关心群众疾苦,能与群众打成一片。她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很快地成为群众的知心人。不管环境如何恶劣,工作如何艰苦,她都甘之如饴。在江宁地区的对敌斗争十分紧张,经常在山区转移,常常一夜要换几个地方,要跋山涉水,连续行军,但她再劳累,从不叫一声苦,总是沉着、坚定地工作。群众见她年轻能吃苦,革命决心大,都乐意听她的话,和她情同家人,还亲切地叫她“周姐”。

1942年1月初,周喆与县委干部黄敏在插花庙西山区的一个石灰窑附近举办党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在一间草棚里开班的,周喆和黄敏向参加培训的党员们认真传授党的知识,使党员们迅速提高了思想觉悟,坚定了斗争信心。1月17日党训班结束后,参加培训的农村党员都赶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上,周喆和黄敏仍留在那个地方。正巧当天晚上县委书记陆纲和原新四军十六旅侦查参谋王晓培、县政府民政科科长庞家义等,连同短枪队20多人,也在那里宿营。青龙山地区土桥慈山台伪自卫团第四直辖分团团长徐茂隆和第五直辖分团团长包士元率兵100余人,并纠合黄梅桥、汤山等地的伪军,进入青龙山地区进行大“清剿”。第2天早上,他们发现被敌人包围,陆纲当即指挥大家突围转移,王晓培率短枪队,以坟包为掩体,指挥阻击敌人。激战中王晓培用双枪击毙了几个伪军,以取得时间让其他同志突围。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为保存力量,陆纲下令分散转移,待到晚上再从淳化转到方山集中。庞家义、王齐贤、王振帮从天宝山向西北窰村方向移动,陆纲、许治则向西边转移,李全宝、周喆向东北方突围。周喆因眼睛近视,身体不适,在崎岖的山路上行动不快,紧急关头,她催同志们快走,不要管她。最后,在敌人搜索中,她不幸被捕。

周喆被关进土桥敌牢,伪自卫团团长徐茂隆想从她口中掏到口供,对她进行百般利诱,以丰盛的宴席招待她。但她以严词斥责和用绝食来对付





敌人。敌人又用严刑拷打和烧红的铁棍烙她,逼她说出党组织的情况,但她志坚如钢,决不吐实。因此,敌人是不可能从她口中了解到任何党组织情况的。当敌人问她是否共产党员时,她说:“我还不够资格做共产党员,可是将来会成为共产党员的。”在关押中,她对难友及看守她的伪军讲抗战必胜的道理,使这个伪军有了觉悟,供给她纸、笔写信,并辗转将书信送到县委。她在信中报告被捕后和敌人对她软硬兼施的情况,表明自己宁死不屈的决心。信中说:“请县委放心,至今我没有做任何损害党利益的事。敌人也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东西。”县委书记陆纲和其他同志读到这封信时,都忍不住哭泣起来。但正当县委设法与她联系,准备实施营救时,她却被押送到句容县伪县政府。她在回答伪县长提审时,正气凛然地说:“我在上学时就信仰共产主义,至死不会改变,叫我反共,决办不到。”她义正词严,使伪县长无言以对,审讯中,周喆镇定自若,侃侃而谈,并且大骂汉奸、走狗、卖国贼。敌人只好说她“言多不逊”“执迷不悟”。

紧接着,周喆又被日本宪兵队提去审问。日本宪兵对她施行种种酷刑。她痛斥敌人,坚贞不屈,并放声歌唱:“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支光芒在前头。”她的歌声表达了对敌人的高度蔑视,对革命胜利的坚信和对同志们的坚强鼓励。日军宪兵要翻译传话不许她唱歌,她斥责汉奸翻译是寡廉鲜耻的民族败类。最后,灭绝人性的日本宪兵,割掉了她的双乳,用棉絮裹住她血肉模糊的身体,然后用刺刀乱捅,她壮烈牺牲,年仅 21 岁。

新中国成立后,江宁县人民政府在土桥修建革命烈士陵园,并在此为周喆立了墓碑。

李贯一 1923 年生于广东省,中共党员。14 岁时他就告别父母,离开家乡参加革命。后被派往皖南大学读书,其间受到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阶级觉悟不断提高。

1939 年 1 月,李贯一被派到江宁县土北地区做党的地下工作。1943 年 2 月,他担任青龙区副区长,直接负责土北地区工作。土北地区辖土桥、石狮、阜东、上峰、青林、汤山等乡镇,面广量大,工作艰苦复杂。李贯一到土北地区后,不顾个人艰险,积极组织扩大武装,发动群众抗租、抗税,打击日伪军,巩固和加强抗日民主的政权。他经常走村串户,宣传只有团结起来跟敌人斗争,才有自由的革命道理,深受群众的拥护。他住上

峰乡张府仓村时,每天替房东刘大爷担水、扫地,时刻不忘劳动人民本色。在青龙山一带打游击时,他经常深入汤山敌人据点探情报、摸底细,张府仓村的群众牵肠挂肚,对他的安全都很担心。

1943年冬,青龙乡联络员陈永兴,外号“陈四麻子”,多次撬旧炮台的钢筋,准备卖给伪乡政府。江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发现后,及时派人把钢筋拖走。陈永兴怀恨在心,便把这事密报给汤山日军,让日军不断下乡“扫荡”,扰乱民众生活。群众把陈四麻子和日伪勾结的情况告诉李贯一,建议处理陈。李贯一对陈进行口头教育批评,并未严肃处理。是年,群众在汤山附近拆掉日伪军四五座堡垒,敲下约2.7万斤钢筋。区里向县委汇报,县委书记陆纲听到消息,立即派警卫连100多人,发动270多名民工连夜运到青龙区。在搬运过程中,陆纲听到下面同志反映对陈麻子的怀疑,回县后,几次调陈到县委学习,实际上是隔离审查,但都被李贯一包揽下来,没让他去。

1944年,陈永兴又伪装成进步分子,混入土北地区从事交通工作,伺机破坏革命。是年10月,李贯一在张府仓村召开5乡1镇乡保长会议,研究布置征粮收款问题。陈四麻子暗中将会议时间、地点告诉汤山日伪自卫队队长王明诚,又一次叛变了革命。当天下午,由陈四麻子带路,后面30多个敌人化装成和尚、老百姓的模样,到张府仓村偷袭。出发后,伪大队长徐康隆在下曹村抢了一副卖糖的担子,装成卖糖的。还有一部分敌人抬着担架,装成送病人去看病,实际上,担架上被子里藏着机枪和步枪,装和尚的敌人个个身上藏有短枪,分几路直扑张府仓村。

李贯一召集的会议在刘志成家召开,因为刘家3间两厢瓦房四面有门,进出方便。陈四麻子从北门闯入,对着李贯一就开枪,没料到这一枪是瞎火,因敌人防他假叛变,装了哑弹。此时徐康隆从南门冲入,开枪打中参加会议的乡长邵有厚、保长葛元平、张德生3人。李贯一偏避一旁,向徐康隆开枪,将徐击毙。参加会议的一些乡、保长乘机逃离。李贯一从东门冲出,朝东南土山坡跑出一二百米远,即被迎面水深坡陡的大桥河拦住,他随即跳入水中浮水过河。当他到达对岸爬坡时,不幸被敌人乱枪打中,壮烈牺牲,年仅22岁。

李贯一的遗体被安葬在插花乡下戴家塘村边山上。1979年3月,江宁县上峰乡人民政府将其遗骸用棺木移葬到他生前常驻的李岗头村北。县民政局用水泥浇铸了烈士墓,墓前竖着白矾石大墓碑,墓地周围植有苍



松翠柏,四季常青。

1977年,江宁县民政部门为纪念在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李贯一、邵贤聚、周建平、周喆(女)、程水泉、周志明、纪耀会和新四军龚绪祥排长、李延井班长9名烈士,修建了土桥烈士墓。1978年,又将在抗战时期牺牲的邵贤金、孙志金以及新四军杨班长(姓名不详)等5名烈士移至该处,合葬在一起,并修建了抗日烈士纪念碑。该纪念碑用红色大理石镶嵌,高10米,上面镌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烈士墓占地面积8950平方米。四周有围墙,全长588米,高3米以上;院内栽有冬青、柏树等树木,青松翠柏,郁郁葱葱,象征着烈士们的精神万古长青。

土桥烈士墓于1979年4月1日被江宁县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83年6月被江宁县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22

英魂谱·圣地祭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南京市地方志

圣地祭

SHENG DI JI

dfz.nanjing.gov.cn

南京敵後抗日烈士陵園手繪地圖

新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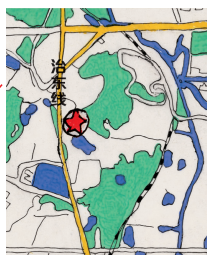


安葬有敌后抗日烈士的综合烈士陵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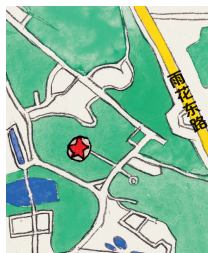
竹镇革命烈士陵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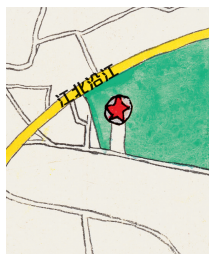
桂子山烈士陵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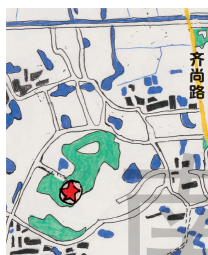
雨花台烈士陵园



东沟烈士陵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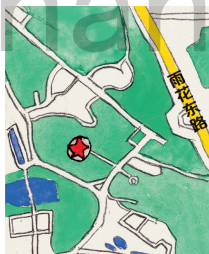
周岗革命烈士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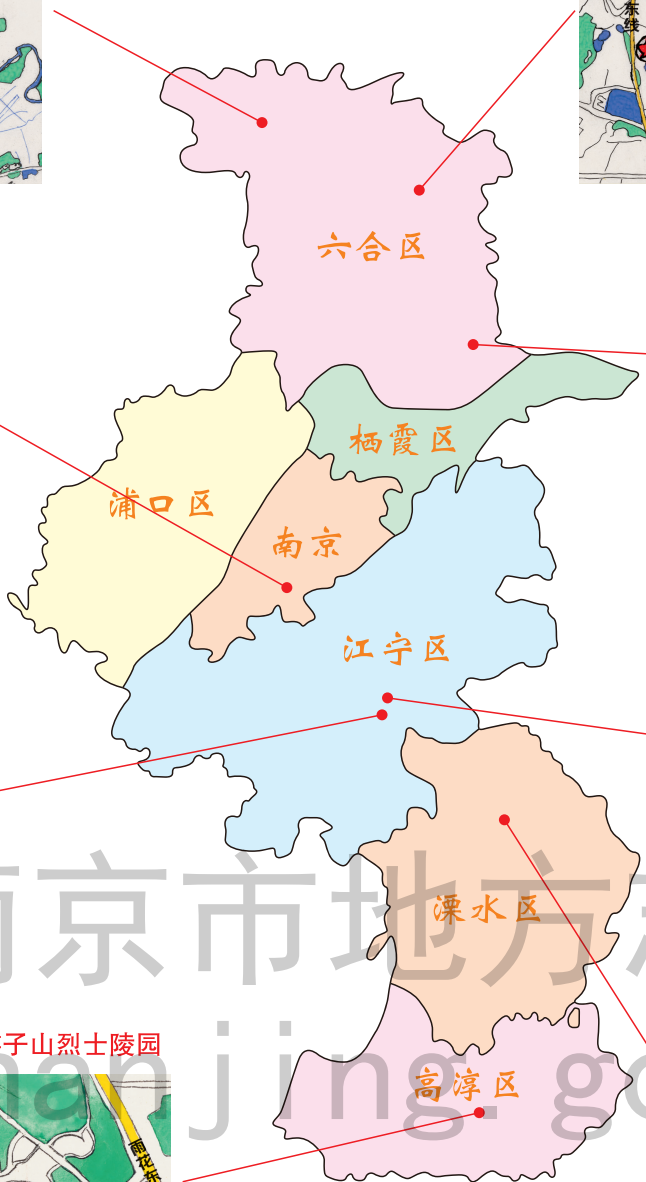
龙都烈士陵园



游子山烈士陵园



中山烈士陵园



雨花台烈士陵园

雨花台烈士陵园知名烈士墓区安葬着1943年8月3日牺牲的中共苏皖区委书记、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邓振询烈士。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内另陈列有南京地区诸多抗日烈士遗物。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雨花台烈士群雕



雨花台烈士陵园烈士纪念碑



127

圣地祭
Sheng Di Ji



128

英魂谱·圣地祭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1988年,雨花台烈士陵园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抗日烈士邓振询墓



129

圣地祭
Sheng Di Ji



雨花台烈士陵园知名烈士墓区

竹镇革命烈士陵园

原位于六合区竹镇八里社区赵营组,2014年迁建新址于大泉湖畔,安葬着竹镇镇域牺牲的敌后抗日烈士。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竹镇革命烈士陵园



竹镇革命烈士陵园烈士纪念碑





132

英魂谱·圣地祭



竹镇革命烈士陵园烈士墓区



133

圣地祭
Sheng Di 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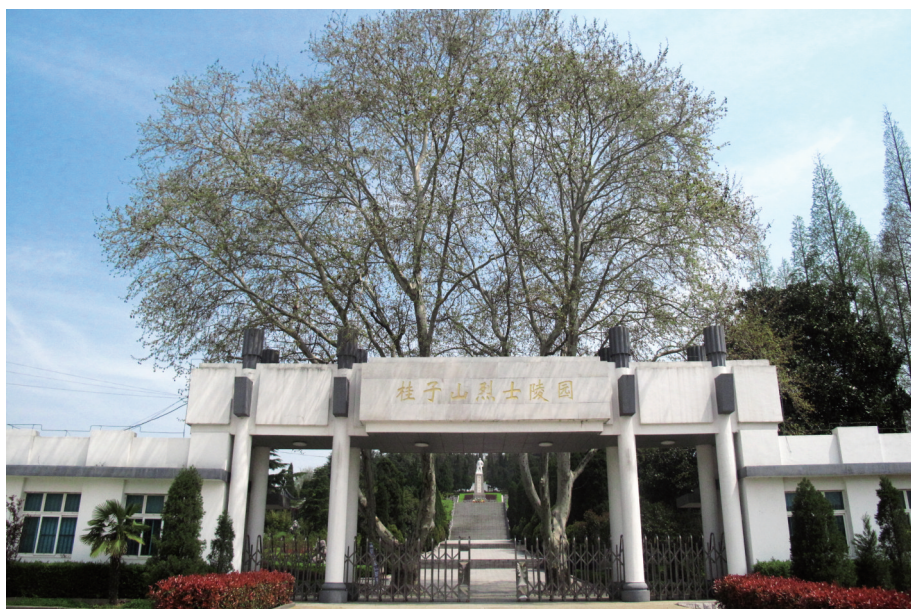
竹镇革命烈士陵园内部分抗日烈士墓碑

桂子山烈士陵园

位于六合区桂子山西侧，最初安葬着 1943 年新四军二师五旅十三团桂子山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后来金牛山战斗等六合区各地抗击日伪牺牲的新四军烈士也迁葬于此。墓区有写着“死难烈士万岁”六个大字的纪念塔，塔顶端矗立着一位手持步枪、腰挎手榴弹、脚穿草鞋、身背斗笠的新四军战士的塑像。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桂子山烈士陵园



135

圣地祭
Sheng Di Ji



桂子山烈士陵园烈士纪念塔



桂子山战斗纪念碑碑文



136

英魂谱·圣地祭



桂子山战斗烈士墓



137

圣地祭
Sheng Di Ji

桂子山烈士陵园内部分知名抗日烈士墓碑



桂子山烈士陵园董山抗日无名烈士墓墓碑



桂子山烈士陵园抗日无名烈士墓



桂子山战斗中牺牲的抗日烈士李秉初墓



139

圣地祭
Sheng Di Ji



桂子山战斗中牺牲的抗日烈士陈宗胜墓

东沟烈士陵园

位于六合区白马山，安葬着 1944 年阻击日军渡河进犯东沟而牺牲的新四军烈士。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东沟烈士陵园烈士纪念碑



141

圣地祭
Sheng Di Ji



东沟烈士陵园墓道

龙都烈士陵园

位于江宁区湖熟街道龙都中心小学对面,安葬着1942年“邹家边事件”牺牲的烈士和李义志、高之桂等在江宁各地抗日牺牲的烈士,墓碑也刻着牺牲时年仅24岁的江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强博烈士的名字,作为永久的留念。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龙都烈士陵园



143

圣地祭
Sheng Di Ji



抗日烈士高之桂墓



抗日烈士李义志墓

周岗革命烈士墓

位于江宁区湖熟街道周岗社区，
安葬着赵德义和王志顺两位烈士。两
人 均是江宁县周岗乡尚义村人，分别
于 1941 年 8 月和 10 月入伍，被编入
江宁县抗日民主政府下属的秦淮区大
队，于 1942 年 3 月在江宁县龙都对敌
作战中光荣牺牲。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周岗革命烈士墓烈士纪念碑



145

圣地祭
Sheng Di Ji



抗日烈士王志顺墓



抗日烈士赵德义墓

中山烈士陵园

位于溧水区中山(又名独山),集中安葬着 25 位与日伪军斗争而牺牲的新四军烈士,以及张一郎等原葬于溧水各地的抗日烈士。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中山烈士陵园



中山烈士陵园烈士纪念塔



147

圣地祭
Sheng Di Ji



148

英魂谱·圣地祭



中山烈士陵园烈士碑亭



抗日烈士张一郎墓墓碑



中山烈士陵园烈士墓简介



149

圣地祭
Sheng Di Ji



中山烈士陵园新四军抗日烈士墓群

游子山烈士陵园

位于高淳区游子山，安葬着 1943 年溧高战役漆桥战斗中牺牲的十六旅作战参谋（正营职）陈进太、四十六团突击排长徐照辉和爆破班长李桂生等 12 位新四军烈士。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游子山烈士陵园烈士纪念碑



151

Sheng Di Ji
圣地祭



游子山烈士陵园新四军抗日烈士墓

南京敌后抗日烈士陵园手绘地图

杨嘉书



南京市地方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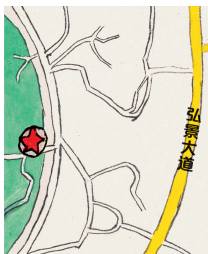
dfz.nanjing.gov.cn





敌后抗日烈士陵园

方山烈士公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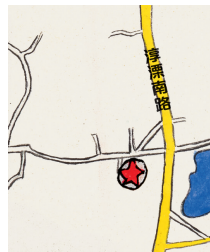
土桥烈士陵园



后阳烈士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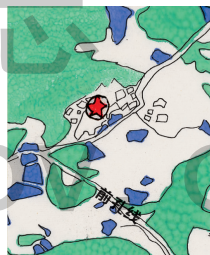
群力烈士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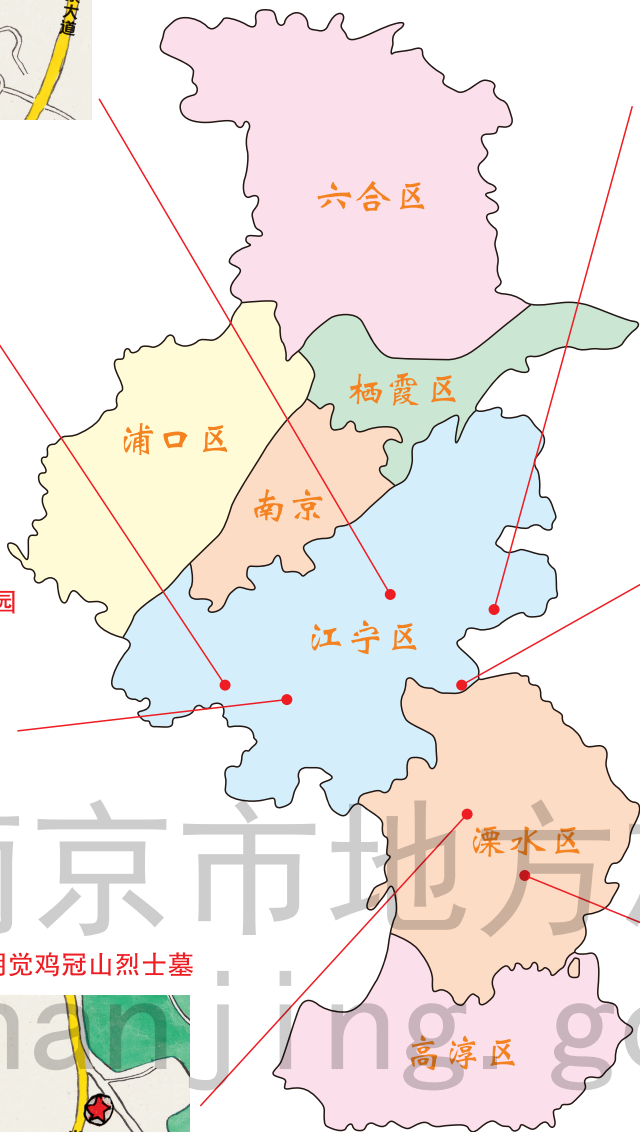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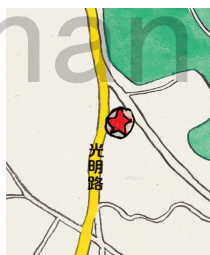
云台山抗日烈士陵园



仙坛烈士墓



明觉鸡冠山烈士墓



方山烈士公墓

位于江宁区方山东南山腰(义务植树基地前方200米),安葬着在1943年、1944年抗日战斗中牺牲的马金牛和郑德胜两位烈士。马金牛牺牲时年仅19岁,时任江宁县抗日民主政府警卫连“小鬼班”班长,郑德胜牺牲时28岁,时任江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方山区区大队副大队长。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方山烈士公墓



155

圣地祭
Sheng Di Ji



抗日烈士郑德胜墓



抗日烈士马金牛墓

土桥烈士陵园

位于江宁区淳化街道柏墅社区，
安葬着周喆、周建平、李贯一、程水泉、
龚绪祥、孙志金、邵贤聚、“杨班长等三
烈士”、李延井等烈士。他们都是八年
抗战期间在土桥、上峰等地和日军、伪
军殊死斗争而壮烈牺牲的烈士。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土桥烈士陵园烈士纪念碑



157

圣地祭
Sheng Di Ji



土桥烈士陵园烈士事迹陈列馆



158

英魂谱·圣地祭



土桥烈士陵园抗日烈士墓群



抗日烈士周建平墓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抗日烈士周喆墓



159

圣地祭
Sheng Di Ji



抗日烈士杨班长等三同志墓

后阳烈士墓

位于江宁区江宁街道朱门社区后阳自然村，安葬着抗日战争中为剿灭汉奸夏孝义而牺牲的7位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二营的烈士。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后阳烈士墓纪念碑



161

圣地祭
Sheng Di Ji

南京市江宁区不可移动文物

后阳烈士墓

南京市江宁区文化广电局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公布

2014年,江宁区将后阳烈士墓列为区级不可移动文物

云台山抗日烈士陵园

位于江宁区横溪街道云台山下，
安葬着 1939 年云台山战斗中牺牲的
新四军第二支队政治部民运科长王荣
春(新四军对日作战牺牲的首位团科
级烈士)、第二支队第三团一营营长邱
立生等 60 余位新四军烈士。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云台山抗日烈士陵园



163

圣地祭
Sheng Di Ji



云台山抗日烈士陵园雕塑



云台山抗日烈士陵园烈士合葬墓



云台山抗日烈士陵园烈士合葬墓墓碑碑文



云台山抗日烈士陵园三名无名烈士墓



抗日烈士陶少卿墓



群力烈士墓

位于溧水区群力社区东屏镇敬老院斜对面,安葬着1939年突围战斗中牺牲的11位新四军二支队三营八连烈士。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群力烈士墓纪念碑



167

圣地祭
Sheng Di Ji



群力烈士墓纪念碑简介

明觉鸡冠山烈士墓

位于溧水区石湫镇明觉村村北的鸡冠山下,安葬着1943年南岗战斗中牺牲的13位新四军十六旅烈士。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明觉鸡冠山烈士墓纪念碑



169

圣地祭
Sheng Di Ji



明觉鸡冠山抗日烈士合葬墓

仙坛烈士墓

位于溧水区晶桥镇仙坛村，安葬着1942年为掩护军民安全转移而英勇牺牲的两位新四军哨兵——张冬青、范贤贵。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仙坛烈士墓纪念碑



171

Sheng Di Ji
圣地祭



仙坛烈士墓简介

后 记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1937年12月初,日本侵略军进攻南京,激烈的南京保卫战失利后,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也随之发生。然而,日寇的暴行并没有让南京这座城市屈服。新四军东进抗日,唤起南京人民起来继续反抗。至抗日战争胜利时,南京周边的郊区分别处于新四军建立的淮南、苏南和皖江3块敌后根据地范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从四面八方直接威胁日伪政权的统治中心。



172

英魂谱·圣地祭

无论是南京保卫战的正面战场,还是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南京地区敌后战场,都涌现出一件又一件可歌可泣的英烈事迹。这些事迹是展现南京不只是惨遭日军屠城的“悲情之城”,更是一座英雄的“不屈之城”的最好明证。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纂了这本《英魂谱·圣地祭》。这本书是南京地区抗日英烈地情资料普查的一个阶段成果,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组织专家挖掘史料,以简传的形式介绍南京地区抗击日伪而牺牲的知名英烈生平;第二部分依托大学生地方志志愿者的寻访活动,以图文的形式全面展示南京地区的抗日英烈的陵园。

在烽火硝烟散尽70年后的今天,重看这段血火岁月,令人不禁慨叹的是,南京沦陷长达7年9个月之久,这片土地上的抗日战事激烈、斗争环境残酷等因素,让诸多英烈事迹当年即湮没在历史长河里。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留下的抗日时期英烈墓也是较为少见了。今天,通过普

查寻访还原这些知名英烈事迹,仅仅是南京地区抗日英烈斗争历程的一个剪影,从这些事迹里可以窥见这片土地上有过怎样的不屈抵抗。而寻访到的纪念地安葬的英烈,则是众多身躯已融入南京土地的英烈们的代表。为夺取抗战胜利建立不朽功勋的人们,南京的山山水水都是他们的丰碑。

本书编纂之中,胡博、卞新宏、高鹏和朱振堂等同志分别撰写和修改了传记内容,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和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张衡审读了全部稿件,南京市大学生地方志志愿者服务队开展了寻访活动和有关史料收集工作。本书的编写工作还得到了江宁区、六合区、溧水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本书的编者水平有限,存在的不足与错误之处,望不吝批评指正。



书 名 英魂谱·圣地祭——南京抗日英烈地情资料实录

编 者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制 印 江苏省地质测绘院

类 别 社科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1.5

印 数 1500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准印证号 苏出准印(2015)字JSE-0006212